

新年献词

● 本刊编辑部

《炎黄春秋》杂志已经发行 13 年了。13 年，150 多期，3000 多篇文章，2000 多万字，缺点和遗憾自然有，但力求真实表述历史则是一贯的；宣扬爱国大团结，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特别在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方面，态度始终是鲜明的，科学地、与时俱进地拥护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是从来没有摇摆过的。

遥想我们创刊的 1991 年，正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实践十年后的大背景下。这个大背景，是党、国家、人民对待一切事物的评价比较客观了，求实了，杂志和作者对史对人的研究，获得了更多的自由空间，有了更多的科学态度。13 年来，尽管非科学的框框还有，作者和编者在叙事写人时，仍有敢不敢、要不要讲真话的犹豫，但我们毕竟前进了。这前进的步履，也和我们党、国家探索发展的轨迹重叠在一起。

在举世瞩目的十六大上，党中央对民主的重视和强调是显而易见的。十六大报告篇幅很长的第五部分，引人注目地专讲“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第一、三、十部分也反复强调了民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2002 年 12 月，胡锦涛同志在宪法二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概括地指出：“党的十六大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同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一起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这是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取得的新的重大认识，也是我们继续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须完成好的重大任务。”在刚结束不久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党中央继续强调“坚持科学发展观”的主导思想，把“不断提高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贯

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作为党的重要任务显明地提了出来。

科学化和民主化，不仅仅是加强执政党建设的要务，也是所有思想领域和探讨一切问题的基本前提。以科学和民主的态度来大力宣扬“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取得的新的重大认识”，应该成为每一个真诚的共产党员的责任，也是我们杂志的使命。新的一年的办刊思路，就是要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继续兢兢业业地完成这一使命。

恩格斯说：“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习来得快。”我们党今天的治国方略，正是建立在对以往的成功经验，包括错误和教训认真总结的基础上的。要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就要让人民如实而全面地了解历史的本来面目。而这正是以中国历史尤其近现代历史重要人物和事件为主要关注内容的《炎黄春秋》的任务。司马迁作《史记》，目的是“述过去，思来者”。13 年来我们领受这一任务，应该说大体上没有辜负读者的期望，目前，科学化与民主化琅琅上口，我们更没有理由让读者失望。

过去的一年里，在党和政府有关部门、作者和社会各方面的爱护支持下，这个刊物社会影响越来越大，和读者的关系更加密切。读者每一封来信，无论批评还是表扬，我们都感受到一份滚烫的赤诚；在家人搀扶下耄耋之年的老读者，时不时坐到我们面前娓娓倾谈，每一次都使我们感受到一种心灵的共鸣。“谁念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一元复始，照例是送上祝福的季节，请接受我们深深的祝福和谢意！

牢记对老会长的承诺

● 费孝通

我们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1991 年 5 月正式成立,7 月 1 日这份杂志就出版了。这是我们的门面,也是我们的招牌和骨干。

这份杂志是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老会长萧克将军一手创办的。创办之初,即正式列为研究会三大任务之一。老会长对这个杂志的领导是非常具体的,倾注了许多心血,直到二三年前病重后,仍嘱托我们将这个刊物办下去,办得更好。我作为继任的中华炎黄文化会会长是郑重地承诺了的。

杂志创办十三年来,在坚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宣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方面,始终旗帜鲜明,从来不曾摇摆过。在宣传思路上,如“百家争鸣”,做了可贵的探索。既然是探

索就有创新也就难免产生失误。总体来看,这个杂志较好地体现了政治上爱国大团结、对人做事

实事求是、不增美不溢恶、以史为鉴的办刊宗旨。对于已出版的一百五十多期杂志,国内外的反映是好的,老干部和高层次知识分子的反映更好些。尤其是最近一两年,订阅数量一直稳中有升。

寒冬岁阑,新年将至。我说几句希望的话:希望《炎黄春秋》照这个样子办下去,取得更大的成绩;希望广大读者和党政有关领导同志继续关注这份杂志,经常地给予批评建议。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
全国人大常委会前副委员长



原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
策研究室主任

我们在前进途中

● 杜润生

建国以前,黄炎培在延安请教毛泽东,如何避免“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规律,毛泽东说要搞民主,让人民监督政府。这是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世界历史的潮流。我们要朝这个方向走下去。

从改革开放到现在,我们已经取得了许多历史性的进步。除了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外,邓小平同志废除了终身制,这两年又完成了党与国家的领导集体的平稳交接。这是一项政治层面的成就。深入研究当代的各种经济和社会问题,研究各种问题的来龙去脉,研究解决这些问题的历史经验,我们还可以发现,彻底解决问题的办法,还要依靠进一步的改革。其中重要的,是将政治体制改革提上议程,加快步伐。当然这需要时间,需要摸索经验,稳步前进。

新年伊始,希望《炎黄春秋》继续努力,为我们的读者提供历史知识,帮助我们的每个读者提高认识能力,做出正确的选择。

现在我们处于经济转型时期。改革进行了 20 多年,但是并没有完成。前途已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体道路正在

探索,还存在种种变数,这是一个伟大的变动的时代,也是人才辈出的时代。面临民族复兴、社会发展、认识互异、思想活跃,预示知识社会的发育,显示出时代活力。

《炎黄春秋》以史为鉴,立足当代,回顾走过的道路,了解前人和外人的成败得失,这种历史知识可以拨开眼前的迷雾,帮助我们确认方向。看《炎黄春秋》的人很多,就是因为杂志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方针,澄清了许多问题的真相,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高透明度,可以避免摔跟头、走错路。

乘风破浪又一年

● 李 锐

在《炎黄春秋》创刊十周年的时候,我曾写过几句话:“澄清史实明辨是非,学术道义勇挑双肩,此为国本精神资源。”时间又过了四年,《炎黄春秋》比过去办得更好,发行量大幅度上升,社会影响越来越大。

《炎黄春秋》其所以得到这么多读者的喜爱,是因为这本杂志坚持科学的态度,不断匡正过去史书上的谬误,不断披露过去某些被掩盖的历史真相,努力还历史本来面目,给读者以深深的启发。

自然界的存在变化有其自然规律,人类历史的发展也有其普世规律。从近代到现当代的几百年,尤其经过20世纪的大动荡大变革,凡遵循自由、民主、科学、法治和市场经济的轨道的国家,就能逐渐消灭一切专制,现在仍在这个普世规律中发展前进。我国从清末进入民国,也出现过变法维新,三民主义,五四运动,直到延安时期,追求新民主主义,要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独立和富强的新中国,而且提出“没有民主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可是,1949年后,却遗憾地走过了一段大弯路,那时面对一系列严重明显的错误,无人敢于站出来反对,找不到规则和办法予以遏止。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党接受“走到崩溃边缘”的教训,才逐渐走上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大道。但同旧习惯有关的政治、文化等体制的改革,未能与经济同步,以致贪污腐败、实利犬儒之风盛

行,使人感到我们还没有从过去历史的种种迷误中彻底清醒过来,还未能对历史进行全面反思。

不久前召开的四中全会提出:“必须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断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这使我们看到要进行全面改革的希望了。1999年底,我在《炎黄春秋》上刊载的《迎接新世纪要四讲》一文中说过:“总结人类社会进步的经验教训,21世纪就要来临之际,我认为民主、科学、法治和市场经济,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我还在一篇文章中说过:“人类历史发展的遗憾太多了。历史学家的责任就是要将历史及有关人物和事实,尤其是长期不为人知的事实,一一清理出来,公之于世。从而使后代人彻底清醒过来,接受教训,以史为鉴,更理性地前进。”近年来,继经济学成为热点之后,历史学又成为一个新的热点,各种反思历史的杂志应运而生。在这些众多反思历史杂志当中,《炎黄春秋》无疑引领着潮头。

在新的一年里,我希望《炎黄春秋》站在历史的潮头,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中共中央组织部前常务副部长、前中顾委委员

从两大口号到三大口号

● 龚育之

新的一年到了。《炎黄春秋》编辑部要我给杂志写一篇新年祝词。于是,写下这样一个题目。

两大口号,就是科学和民主。这两大口号,是《新青年》提出来的。这个杂志原名《青年》,1915年创办,到现在正好90年。它的创刊,是新

文化运动的标志。

创刊号上陈独秀写了一篇《敬告青年》,就提出了这两个口号。不过当时叫科学和人权。1919年段祺瑞主政时期,陈独秀发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说《新青年》本来无罪,只

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 Democracy 和赛因斯 Science 两位先生，才被认定为犯了滔天大罪。“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这是当年中国掷地有声的一篇战斗宣言。旋即发生了轰轰烈烈的、波及全国的群众性五四爱国运动。从此，德、赛两先生在中国声名大振。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准备。陈独秀成了早期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中国共产党提倡民主和科学，于是，德先生和赛先生成了德同志和赛同志。

从五四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为科学和民主奋斗了三十年，取得了历史性的辉煌胜利。

五十五年中处于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科学和民主奋斗得如何呢？

概而言之，一方面有很大的成绩，另一方面又有若干的不足，还需要新的觉醒。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常务副主任、中共党史学会会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迎来了新的觉醒。

这新的觉醒，是伟大的，也是艰难的。

人权入宪，法治入宪，是新的觉醒，是重大进展。入宪，不是万事大吉。作为有重大意义的新的开始，是万事开头难，万事落实难。

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又是新的觉醒。

三大口号：科学执政、民主执

政、依法执政。这是四中全会决定提出来的。科学、民主、法治，要体现在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方面，要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中。人们有理由期望，在这三大口号下，在研究和贯彻四中全会决定的过程中，科学、民主、法治在中国会有新的扎扎实实的发展，而不会停留在口头上、虚文中。

人们有理由期望《炎黄春秋》和中国所有的叙史论时的杂志，都继承《新青年》的优良传统，在推进中国的科学、民主、法治中办得更加活跃、精彩。

君子多识前言往行

● 范敬宜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
《人民日报》前总编辑

《周易》有一句话：“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大意是要求人们多了解前人的言论和行为，以积累为人处世之道。用现代的语言说，就是要认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使自己今后变得更加聪明。

《炎黄春秋》就是这样一本帮助人们“多识前言往行”的刊物。随着“年龄”的增长，它正在发挥越来越明显的“治史经世”的作用，因而理所当然地获得越来越多读者的欢迎。

在鸡年即将来临之际，作为一名老新闻工作者，我衷心祝愿它在新的一年里越办越出色，做到：

秉笔直书论炎黄，
引吭高唱迎春秋。

贵在一个真字

一元复始。我挑出一首南宋理学大师朱熹老夫子的七言诗,作为我献给《炎黄春秋》和广大读者跨进新一年的贺岁礼。诗曰:“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何也?我对这个比喻做一点解释:在我国报刊园地里《炎黄春秋》像一面镜开的半亩方塘,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林林总总在这里展示,宛如在塘面上徘徊摇曳的天光云影。《炎黄春秋》逐步被广大读者认可,在读者中扎根,其源头在哪里?一言以蔽之,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炎黄春秋》是一本以记述历史和人物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性纪实杂志。评说历史事件与人物,贵在一个真字。所谓真,就是秉笔直书,不做曲笔;就是对历史事件和人物客观、公正,是则是,非则非,不歪曲,不捏造;就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这是我国历代良史所遵循、传承的一种精神。一直被奉为圭臬的,当属被鲁迅推崇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了。博极群书如西汉的刘向、杨雄这两位大家,也称服司马迁“有良史之才”“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炎黄春秋》力求承继这个优良传统,制订了自己的办刊宗旨:求实存真,秉笔直书,以史为鉴,与时俱进,以弘扬中华文化,增进爱国大团结。

不堪回首的“文革”十年,最大的遗憾之一,是讲假话、不讲真话成为一种社会流行病。经历

● 冯 健

过这是非混淆、善恶颠倒,说假话飞黄腾达、说真话遭罪受过的十年,又面对近年浮躁之风



新华社前副社长

日盛,如今讲真话几乎成了一种艰难,不说假话仿佛也不那么容易了。惟其如此,讲真话在今天更显其难能可贵,特别值得倡导,值得嘉勉。

一个真字,使历史具备了对后世鉴戒和警示的价值,这就是所谓“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司马迁在《自序》中说,他写《史记》的目的,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即探究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关系,通晓古今嬗变的因果;是要“述往事,思来者”,即追述过去,思考明天,就是这个意思。历史是一面镜子,是一本教科书,一个人如果善于总结历史的经验,面对今天,思考未来,他就会变得聪明些。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是如此。

党中央倡导求真务实。我盼望新的一年将是一个求真务实年,举国上下能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多一些真话实话,少一些假话空话;多一些真抓实干,少一些虚夸浮华;多一些人民群众翘首期盼的久旱降雨、雪中送炭,少一些口惠而实不至的空头支票和麻袋上绣花的“政绩”工程。祈愿人民公仆们都来安民爱民,而不要去扰民坑民。

进入新天地



张文彬 国家文物局前局长 曲润海 文化部艺术局前局长

在甲申之年即将过去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向杂志社全体同志致以新春的问候!

甲申总是一个大开大合、令人难忘的年头。它往往和社会的前进,思想的解放,事业的新兴联系在一起。这一年,我们的《炎黄春秋》杂志在上下左右、领导和同志、专家和读者、朋友和诤友从不同角度给与的支持和帮助下,经过自(下接第7页)

邹韬奋为民主理想拼搏终生

● 郑连根

1944年7月24日,邹韬奋先生因耳癌去世。半个多世纪的时光并没有将邹韬奋的光辉业绩湮没,相反,当回顾这位杰出的新闻记者、出版家、政论家的生平时,我们发现,他给今人留下的是一笔笔丰厚的精神遗产。

—

邹韬奋,原名邹恩润,1895年11月出生于福建永安,少年时代在福州求学,1912年赴上海,考入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先读小学,1913年升入中学,1917年升入大学,学的专业是机电。机电与新闻可谓风马牛不相及,可是,邹韬奋这个学理科的人却偏偏爱上了文史,一心想做新闻记者。他一有空就往图书馆跑,每次都要找当时上海有名的报纸《时事新报》。当

时,著名记者黄远生在《时事新报》上开了一个专栏“北京通讯”,这个专栏深深地吸引着邹韬奋,他十分佩服黄远生,希望自己将来也能成为黄远生那样的记者。

可是,由于家境贫寒,邹韬奋的大学还没有读完,就被迫休学了,他不得不一面干杂活,一面求学,1919年2月,他到江苏宜兴蜀山镇给人家当起了家庭教师,干了半年,又带着挣来的钱返回了大学课堂。由于缺课太多,他的机电专业索性不上了,改学了文科,9月转入上海圣约翰大学,主修西洋文学,副修教育学。

1921年7月,邹韬奋大学毕业,先在上海厚生纱厂、上海纱布公司任英文秘书,还兼任中学英文教师,但都为期不长。1922年,经黄炎培介绍,邹韬奋参加了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工作,担任编辑股主任,主编《教育与职业》月刊,从此走上

(上接第6页)已齐心协力的拼搏,又进到了一片柳暗花明的新天地。杂志继续坚持了求实存真,秉笔直书,以史为鉴,与时俱进的办刊方针,稿源在扩大,质量在提高,园地巩固,订户在增加,在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增进爱国团结,加强交流联络,推动研究切磋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继续办出了个性和特色。我们在共同分享愉快和欣慰的时候,特别要对为杂志付出了艰辛劳苦的同志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我们《炎黄春秋》是社团办的刊物,它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它从一开始就遵循着文化市场运作的规律,尊重作者,尊重读者。秉笔直书,不溢美,不溢恶;面对文化市场不媚俗,不取巧;明辨是非,不求组织论争;尊重事实,允许各抒己见;建言倡议,拾遗补缺,总是为党,为国,为民,为文。因而纵有一些工作失误,总是竭诚欢迎批评

指出,努力改进完善,力避因小失大。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作为《炎黄春秋》的主管和主办单位,始终同杂志荣辱与共。

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要继续坚持办刊方针,尽心竭力,务使杂志办得更好。为此要继续把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要加强法制观念、政策观念,更自觉地把我们的所有工作,规范在法律法规政策允许的范围内。要广泛地依靠社会各界,为我们出谋划策,增强我们的知识后劲。

让我们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努力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为我们的炎黄事业,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我们的力量。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张文彬 曲润海

(2004年12月)

了编辑出版的道路。

1925年,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上海创办《生活》周刊,作为职业教育的园地。《生活》周刊出刊一周年的时候,主编王志莘辞去职务,到银行任职,邹韬奋接编了这份在当时看来十分不起眼的周刊。当时,《生活》周刊每期只印2000份左右,邹韬奋还得兼任《时事新报》的秘书主任,这样才能维持自己的生活。但是,经过邹韬奋的努力工作,《生活》周刊的销量迅速上升,1927年底就达到了2万多份,邹韬奋不得不于1928年辞去兼职,专心主编《生活》周刊。

原来《生活》周刊的宗旨是:“揭出社会上困苦和快乐的生活实况,并加以批评建议”;“揭出人类正当生活的途径”;“揭出各种职业之性质与青年择业安业乐业的准则”等。邹韬奋接编之后,将《生活》周刊的宗旨改为:“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

这个宗旨切中了当时一些底层民众的“心脉”,同时,邹韬奋又特别注重刊物和民众之间的“互动”,所以《生活》周刊很快就在青年中有了极大的影响。

从第二卷第一期起,邹韬奋就开辟了《读者信箱》专栏,发表读者的意见、希望和编者的答复,这大大地拉近了编读之间的关系;以后邹韬奋每主编一种刊物,都保持这一专栏,这在我国报刊史上属首创。邹韬奋用全部精神处理读者来信,“以极诚恳、极真挚的情感待他们,简直随他们的歌泣而歌泣,随他们的喜怒而喜怒。”与读者的悲欢离合、酸甜苦辣打成一片。“为读者竭我智能,尽忠代谋”。读者来信一小部分在报刊上公开发表和解答,大部分信给予回复。后来读者来信多了,他确定四个人专门负责处理来信,复信立卡存档,每封复信邹韬奋都要亲自过目,签名后寄出。他为读者提供信息,交流思想,代读者



邹韬奋

者办事、购物;组织读者参加社会活动。他成为读者的“好朋友”,读者也成了他的良师益友,编者和读者由此形成了良性互动。

从第二卷第四十七期起,邹韬奋又在《生活》周刊上开辟《小言论》专栏,每期一篇,用“最生动、最经济的笔法”议论。与此同时,邹韬奋在办刊理念上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形成了自己的个性和特色。在编辑方针方面,邹韬奋认为:“最主要的是要有创造精神。尾巴主义是成功的仇

敌。”“在内容上是讲人民大众想讲的话;在文字方面,力避‘佶屈聱牙’的贵族式文字,用明显畅快的平民式文字。”

他强调《生活》周刊要用“生动的文字”,要用“有价值有兴趣的材料”来同读者见面;“其注意之点不但在‘报有价值’,尤在‘报有趣味’”。他既不赞成老生常谈,也反对“滑头面孔”,而提倡寓教育于趣味之中。邹韬奋这样创办报刊在当时是少有的。他还说:“不管是老前辈来的(稿件),或是后辈来的(稿件),不管是名人来的,或是‘无名英雄’来的,只须是好的我都要竭诚欢迎,不好的我也不顾一切地不用。在这方面我只知道周刊的内容应该怎样精彩,不知道什么叫做情面,不知道什么叫做恩怨,不知道其他的一切!”有了这样的办刊作风,《生活》后来的成功就不值得吃惊了。如何反映底层最广大民众的呼声并和他们形成良性互动,这始终是新闻传媒必须面对的一项课题。邹韬奋先生在这方面的作为实在值得今天的传媒借鉴,可以说,这是他给今人留下的第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

二

在邹韬奋的主持下《生活》周刊的内容逐

渐地由探讨个人职业与生计问题为主变为评述时事政治与社会问题为主,最终走出了“职业教育”的圈子,走向了更广阔的社会生活。它的读者也随即由最初的职业青年和失业青年扩展到了社会的各个阶层。随着时局的变化,邹韬奋多次撰文说明刊物的性质和宗旨。1927年,他说:“本刊的动机完全以民众的福利为前提”。1928年,他强调办报要以读者的利益为中心,以社会的改进为鹄的。”1930年他表明,创办报刊“不以赢利为目的”,“全靠自己的正当收入来维持自己的生存与力求自己的发展。”同年,他还宣布:“依最近的趋势,材料内容尤以时事为中心,希望用新同学的眼光,为中国造成一种言论公正评述精当的周刊。”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生活》周刊更是及时调整,迅速走在了民族解放斗争的前沿,1932年,邹韬奋先生宣布:“本刊最近已经成为新闻述评性质的周报。”可以说,随着时局的变化相应地调整自己的办刊思路和办刊宗旨,以紧跟时代步伐,这是邹韬奋先生留下的又一笔精神遗产。

在上海淞沪抗战中《生活》周刊每日编发“紧急号外”,组织读者支援前线、发动捐款、征集物资、开办伤员医院等。在大声疾呼抗日救亡的同时《生活》周刊还勇敢地揭露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现象,抨击国民党在抗战问题上的错误政策。1931年8月,读者来信要求披露国民党政府交通部长王伯群贪污交通建筑款、造房纳妾的丑行。邹韬奋亲自调查了此事,并给王伯群新建的花园洋房拍了照片。王伯群得到风声后,派人携巨款找邹韬奋,企图资助“邹韬奋和《生活》周刊,目的当然要免登相关报道。邹韬奋断然拒绝了这笔交易,于8月15日在《生活》周刊上发表了读者来信、记者调查和照片,并斥责王伯群为“作贼心虚而自己丧尽人格者”。这一报道,得到了广大读者的支持和称赞。同年的11月28日,《生活》周刊第六卷第四十九期上发表了邹韬奋的文章《政府广播革命种子!》,指出国民党政府压制抗日言行就是“广播革命种子”,并警告说:“民众为自卫及卫护民族计,随时有爆发的机会,起来革命!”

当《生活》周刊以提倡个人修养和职业道德为基本内容时,国民党上海市政府教育局称赞它

“取材丰富,理论新颖”,而在它宣告以时事为中心后,就日益为国民党当局所不满。1931年底,就从南京传出国民党中央党部将勒令《生活》周刊停刊的消息,1932年,国民党政府下令停止《生活》周刊的邮寄。但是,这些手段仍然不能遏制《生活》周刊影响的扩大。1932年《生活》周刊的发行量超过了15万份,成为当时销售量最大的杂志。也就是在这一年,它公开宣称拥护社会主义的主张,发表了一系列宣传社会主义的文章。

鉴于《生活》周刊随时可能被扼杀,邹韬奋和同事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减少损失。1932年成立生活书店,是作为刊物的《生活》周刊和作为出版机构的生活书店相分离。同年10月,邹韬奋写了《与读者诸君告别》的文章备用。可以说,邹韬奋对《生活》周刊的被查封是有思想准备和行动准备的。在这篇“告别”文章中,邹韬奋重申了自梁启超、邵飘萍等先辈所倡导的新闻自由的原则,表示要坚决捍卫“报格”,他说:“绝对不容侵犯的是本刊在言论上的独立精神,也就是所谓报格”,“定为保全人格报格而绝不为不义屈”。希望读者“把对本刊言论的同情移到实际方面的努力上,共同奋斗,共谋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

1933年12月8日,国民党政府以“言论反动、思想激进、毁谤党国”的罪名下令查封《生活》周刊。12月13日《生活》周刊在上海一些报纸上刊登公告:“本刊迫于环境,无法出版,结束办法可另行通知”。16日《生活》周刊出版最后一期——第八卷第五十期,在这期上发表了署名“同人”的文章《最后的几句话》,其中说:“统治者的利剑可以断绝民众文字上的联系,而不能断绝精神意识上的联系。人类的全部历史记载着,民众利益永远战胜了一切。”当然,这一期上还刊载了邹韬奋一年前就写好的告别文章。

三

当邹韬奋的《与读者诸君告别》在最后一期《生活》周刊上发表的时候,邹韬奋本人已经身在欧洲了。事情是这样的:1933年6月18日,中国国民同盟总干事杨杏佛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此

事震动很大。邹韬奋当时也被特务列入了暗杀名单,情况非常紧急。为了躲避暗杀,邹韬奋于7月14日出国流亡,而《生活》周刊的编务则交由胡愈之、艾寒松等人打理。

从1933年7月至1935年8月,邹韬奋一直在国外流亡。他先后到过意大利、瑞士、法国、英国、比利时、荷兰、德国、苏联和美国。在出国之前,他就打算把在国外的见闻和感想写出来,寄回《生活》周刊发表。整装待发之时便写下了第一篇稿件《开端》,此后每到一处都细心采访,深入调查,两年时间便写下了159篇国外通讯,计50万字,后来汇编成了《萍踪寄语》和《萍踪忆语》两部书,前者在他回国前已编成集子出版,后者则是他回国后整理成篇的。

邹韬奋曾说,自己在国外采访写作时,心目中常常涌现着两个问题:第一是世界的大势怎样?第二是中国民族的出路怎样?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我们要研究中华民族的出路怎样,不得不在意中国所在的这个世界的大势怎样,这两方面显然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邹韬奋的“大局观”。我觉得,这是邹韬奋先生给今天的新闻工作者留下的又一笔精神遗产。读近现代名人的著作,我明显地感到与今人的文章有差异,这其中最大的差异还不在于行文习惯上,而在文字所展示的气魄上。前辈们的文字——从梁启超、章太炎到陈独秀、鲁迅,从蔡和森、毛泽东到范长江、邹韬奋——都有一种叫做“伟人气象”的东西充盈其间。这些人尽管思想性格各异,文风也各不相同,但他们的文章都体现出了一种极宝贵的人生品格:注重对世界和人生本源的追问,面对纷繁的社会,有“舍我其谁”的自信和救民众于水火的责任感。这些文字反映出了这些人的胸襟,他们的心里装着民族的苦难与希望,而绝不仅仅是一己的利害得失。或许正因为他们有这份自信,有这样的责任感,所以他们才能从容地应对艰难的事世和坎坷的人生。

四

1935年8月,邹韬奋回到了上海,一方面整理材料,撰写《萍踪忆语》一书,另一方面着手创办刊物。努力之下,11月16日《大众生活》在

上海创刊了。邹韬奋在发刊词《我们的灯塔》中宣布办刊宗旨:“力求民族解放的实现,封建残余的铲除,个人主义的克服”。当时日本正在策划“华北自治”,而国民党政府却在高唱“敦睦邦交”。《大众生活》及时揭露日本侵略者的阴谋,猛烈抨击国民党政府以“赤化”、“妨碍邦交”为借口镇压人民大众的抗日运动。北平爆发“一二·九”运动后,《大众生活》立即响应,发表了十多篇文章,称颂学生的救亡运动,认为“这是中国民族斗争的序幕,这是中国大众为民族争生存不怕任何牺牲的先声!”这之后,又陆续报道了上海、南京、武汉、杭州等地的学生运动,号召学生和中国大众结成全国救亡的联合战线。《大众生活》成了救亡运动的舆论机关,它还报道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北平文化界救国会等社会团体的活动。1936年2月11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表《告国人书》,给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加上了“反对中央”、“颠覆政府”的罪名。2月14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发表了《对中宣部告国人书之辩证》,指出救国会不是“一纸污蔑文书所能恫吓得了的”,同时还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大众生活》刊登了这个文件。这再次惹恼了国民党中央政府。他们先是找邹韬奋“谈话”,后下令停邮《大众生活》,最后于2月29日查封了《大众生活》。

《大众生活》被查封后,邹韬奋面临着被国民党逮捕的危险,为了避祸,他化名离开上海去香港,再次流亡。到香港后,于1933年6月7日创刊了《生活日报》。《生活日报》继承了《大众生活》的衣钵,继续宣传团结抗日。邹韬奋在《发刊词》中写道:“本报的两大目的是努力促进民族解放,积极推广大众文化。”同时还表示:“同人愿以自勉的第一义,便是以全国民众的利益为一切记述评判和建议的中心标准。”邹韬奋主持《生活日报》,除了负责制定报道方针外,还着重抓言论和读者来信。头版每天都有社论,由邹韬奋执笔,每篇500字左右,针对读者关心的各类问题发表评论。

《生活日报》创刊的前几天,爆发了“六一事变”,广东和广西的军阀联合起来,声称“抗日反蒋”。当时香港有不少报纸支持这次事变。而《生活日报》则力排众议,宣传“枪口对外,团结

御侮”，并提出了“全国一致对外的口号”，呼吁“必须发动整个中华民族的大抗战”，显示了邹韬奋高远的政治见解。

《生活日报》的创办，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关怀和支持。当时在天津主持中共中央华北局工作的刘少奇，于1933年5月24日、6月19日两次署名“莫文华”给邹韬奋写信，对于出版《生活日报》表示欢迎，并就该刊的性质、任务与宣传方针提出建议。邹韬奋在《生活日报星期增刊》上发表了这两封信，并加上编者的话，表示完全接受。中共在南方的党组织同邹韬奋建立了联系，共产党员胡愈之、恽逸群等参加了《生活日报》的工作。

《生活日报》是一家在贫民窟出版的报纸，困难极大。稿件要经过香港英国殖民地政府的审查，“帝国主义”只能写成“□□主义”；纸张昂贵，印刷条件差，铅字不全，常常要在大标题里镶小号字。例如，缺少“铲”字，就印一个“产”，下面加括弧注“加金旁”。另外就是华南地区交通不便，严重地影响了《生活日报》的发行。鉴于这种情况，中共在南方的党组织建议《生活日报》迁往上海，以扩大它在全国的影响。邹韬奋接受了这个建议。1936年7月31日《生活日报》在香港自动停刊，《生活日报星期增刊》改为《生活日报周刊》继续在香港出版。但是，由于国民党政府不予登记，《生活日报》没能在上海出版。于是《生活日报周刊》宣布迁往上海，并改名为《生活星期刊》，邹韬奋依然任主编兼发行人。可惜，出版不久，邹韬奋就被捕入狱了——1936年11月23日，邹韬奋与沈钧儒、李公朴、章乃器、沙千里、史良、王造时一起因主张抗战被捕，这便是有名的“七君子”事件。在狱中，邹韬奋也没有停止著述，他写道：“我要掬着这枝秃笔，挥洒我的热血，倾献我的精诚，追随为民族解放和大众自由而冲锋陷阵的战士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七君子”被关243天后出狱。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后，邹韬奋又出版了《抗战》三日刊，上海沦陷后，邹韬奋取道香港、广东、广西抵达武汉。到武汉后，邹韬奋到八路军办事处访问了周恩来，主动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此时的邹韬奋在民众中享有极

高的声望，他主持的书店和出版物遍及全国，甚至在海外华侨中也有许多读者。国民党当局也企图控制邹韬奋，遂对他软硬兼施：一面威胁说“杀一个邹韬奋绝对不会发生什么问题”，另一面又拉他参加国民党。1938年初，蒋介石亲自找邹韬奋、杜重远谈话，要他们“特别注重组织的重要”。但邹韬奋不为所动，反倒一再表示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周恩来劝他留在党外，发挥民主人士的作用。

1938年3月，邹韬奋参加了中国青年记者学会，被推为名誉理事。7月6日，被国民党政府聘为参政员，出席在汉口举行的国民参政大会。同年10月28日，国民参政会在重庆举行第二次大会，会上，邹韬奋提出了《请撤销图书杂志原告审查办法，以充分反映舆论及保障出版自由案》，经过激烈辩论，此提案获得了通过。不过，国民党当局依然我行我素，根本不受这个提案的约束。



邹韬奋夫妇与三个子女（1933年）

抗日战争进入到相持阶段之后,国民党借《战时新闻检查办法》、《战时新闻违检惩罚办法》、《抗战时期报纸通讯社申请及变更登记暂行办法》等法令压制进步新闻出版和文化事业。邹韬奋主持的书店多次被封,主编的刊物也多次受到刁难,他的文章屡次被检扣。为了争取书店和刊物的生存权利,他多次给国民党当局写信表示抗议。他还亲自找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叶楚傖、副部长潘公展交涉,争取和捍卫新闻自由。国民党特务机构中央调查统计局局长徐恩曾是邹韬奋在南洋公学的同班同学,邹韬奋也找他“晤谈”,争取“自由空间”。徐恩曾直率地对邹韬奋说:“到了现在的时候,不做国民党就是共产党,其间没有中立的余地,无所谓民众的立场!你们这班文化人不加入国民党就是替共产党工作!”徐恩曾还承认“跟”了邹韬奋达七年之久,未能证明他加入了共产党,希望他加入国民党。这一要求被邹韬奋当场拒绝了,徐恩曾十分恼怒。

为了理想,为了“主义”,“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这是邹韬奋先生留给后人的又一笔精神遗产。

五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举国为之震惊,邹韬奋针对此事写了一篇社论,但全文被扣。愤怒之下,邹韬奋决定在报上“开天窗”以示抗议。这之后,他再次陷入危险的处境中,他在秘密拜访了周恩来、沈钧儒、黄炎培等人后,于2月25日凌晨4时只身一人化装出走,取道湖南、广西,最后抵达香港。

邹韬奋抵港时,范长江等人正在筹办《华商报》。他们用预付稿费的方式在经济上资助邹韬奋,随后又在报上连载了邹韬奋的《抗战以来》。与此同时,邹韬奋自己也在积极地筹办刊物,经过努力《大众生活》于5月17日复刊出版。邹韬奋在复刊辞中写道:“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紧急问题,就是如何使分裂的危机根本消灭,巩固团结统一,建立民主政治,由此使抗战坚持到底,以达到最后的胜利。”至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在香港的《大众生活》不得不再次停刊。至12月25日,香港沦陷,邹韬奋躲在“贫民窟”中

避难。后来,中共中央指示华南工作委员会将邹韬奋、沈雁冰等20多位文化界人士由香港转移到内地,他们一行在东江纵队的护送下,于1942年1月15日抵达东江游击队的机关报《东江民报》编辑部,此后又经过多次辗转,至9月下旬才抵达苏中抗日根据地。邹韬奋在苏中抗日根据地会见了粟裕、黄克诚、陈丕显等领导人。对抗日根据地的考察给了邹韬奋极大的信心,他在给陈毅的信中说:“过去十来年从事民主运动,只是隔靴搔痒,今天才在实际中看到了真正的民主政治。”

1943年2月,邹韬奋被确诊为耳癌。陈毅军长主持紧急会议,研究治疗问题。病中的邹韬奋也表示:“希望病愈之后再和大家一起努力二三十年”,还说要办一家日报。1944年初,病情稍好,他就又提笔撰写《患难余生记》,计划写五章,可是只写到第三章就因病情恶化而写不下去了。6月2日,邹韬奋召集亲友,口述遗嘱,最后一次呼吁全国坚持团结抗战,早日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建设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同时他还请求中共中央审查他的历史,如其合格,请追认入党。遗嘱还勉励眷属、子女,努力工作、学习,为革命事业做贡献。

1944年7月24日上午7时20分,邹韬奋与世长辞,遗体以“季晋卿”假名入殓。在邹韬奋病逝之后,刘少奇与陈毅书写挽联:“噩耗传来,忆抗敌冤狱,民主文章,革命气骨,涕泪洒襟哭贤哲;胜利在望,看欧西革故,敌后鼎新,人民抬头,光芒到处慰英灵。”9月2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电邹韬奋家属,高度评价了邹韬奋先生的一生,电称:“韬奋先生二十余年为救国运动,为民主政治,为文化事业,奋斗不息,虽坐监流亡,决不屈于强暴,决不改变主张,直至最后一息,犹殷殷以祖国人民为念,其精神将长在人间,其著作将永垂不朽。先生遗嘱,要求追认入党,骨灰移葬延安,我们谨以严肃而沉痛的心情,接受先生的临终请求,并以此引为吾党的光荣。”毛泽东也为邹韬奋题词:“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作为杰出的新闻记者、政论家和出版家,邹韬奋先生是无愧于这些评价的。(责任编辑 吴思)

《江声日报》事件与记者节

● 刘晓滇 刘小清

(一)

上世纪30年代在镇江曾经有一份报纸叫《江声日报》，该报创办人刘煜生为江西人，大革命时期曾接受反帝、反封建思想的熏陶。抵镇江后，刘煜生立志以报纸唤起民众，遂创办《江声日报》，自任经理与总编。取报名“江声”是喻指镇江百姓代言人。刘因其在报界的影响，被推为镇江报界公会主席。

民国时期，虽然政府规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而且强调“保障人民的自由权”，但这一纸空文丝毫未能约束政府官员对舆论的钳制。1932年，刘煜生抱着“犁尽天下不平事”的愿望，在《江声日报》开辟《铁犁》副刊，并称该副刊“需要新的记述，爱的素描，是大众的呼声，是不平的呐喊”。之后，《铁犁》陆续刊登了一些具有时代特征的进步文章。其中，在《时代不是时代》的文章中有这样的描写：“时代已飞卷起狂涛，一切旧的马上就被冲倒，时代已撞起丧钟，一切旧的眼看就要葬送，奴隶们斗争吧！”这是对新时代即将到来的一种呼唤和期盼。

不料，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顾祝同以“显有阶级斗争之用意，察其文字，含有共党口吻”为借口，称刘“意图颠覆政府，实属罪不可逭”，亲自下令省公安局逮捕刘煜生，查封《江声日报》。

一介报人何以令省主席亲自出马并如此大动干戈呢？原来其中另有隐情。此前，江苏省民政厅长赵启霖吸食鸦片成瘾而不思政业，为百姓所痛恨。刘煜生闻讯后即在《江声日报》揭露其丑闻，同时披露了省政府官员

参与买卖鸦片的内情，由此触犯当局。赵启霖长期为顾祝同部下，两人过往甚密，私谊笃厚。北伐时，顾祝同任第九军军长，济南惨案后，蒋介石收缩编制将第九军改编为陆军第二师，顾祝同任师长，参谋长即为赵启霖。以后顾、赵又发展为儿女亲家。顾祝同任江苏省政府主席后，拥有实权的民政厅长一职自然非赵启霖莫属。由于关系非同一般，有时赵启霖甚至能当顾祝同的家。顾、赵如此亲密，如此默契，刘煜生揭露赵启霖，顾祝同自然不会袖手旁观。

(二)

刘煜生被捕及《江声日报》被封，立刻在全省引起强烈反响。镇江新闻公会率先而起，向全国新闻界及南京国民政府发出呼吁，要求保障新闻自由。无锡、南京等地新闻界随之形成呼应之势，抗议顾祝同滥用职权，封禁民声，要求立刻放人。南京新闻公会同时派员赴镇江详细了解事件真相，并当面向顾祝同递交抗议书。继之，上海、北京等地新闻记者在全国各大报纸发表文章，以为声援。在民众强大的压力下，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不得不干预此案。经过调查，省党部形成结论性意见，认定《江声日报》“无反动文字”，望顾祝同准许该报复刊，并将刘煜生交



宋庆龄和民权保障同盟委员 左起：鲁迅、胡愈之、黎沛华）

保释放。

然而，顾祝同根本不把省党部放在眼里，依然我行我素，拒不释放刘煜生。

顾祝同藐视法律的行为震惊了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院长于右任拍案而起。他随即派两名监察委员赴镇江调查。顾祝同自恃有蒋介石撑腰，对监察院调查不予配合，甚至处处掣肘，拒不交案卷。面对顾祝同的傲慢和嚣张气焰，于右任要求监察院依据《国民政府弹劾法》，呈请国民政府将顾祝同“交付惩戒”，“以维法纪”。

然而，就在监察院呈请弹劾之际，顾祝同置民怨和法纪于不顾，诬刘煜生违反《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于1933年1月21日将刘煜生秘密枪毙。在给行政院的呈文中称：“刘实系共党”，以为掩盖。

顾祝同的有恃无恐、变本加厉以及对监察院的蔑视激起了众怒，特别是监察院的威信受到了挑战。为此，监察院对新闻界发表谈话称：“中国为法制国家，监察院是属总理手订五权之一，凡属公务人员理应遵守。今顾对党纪国法一再破坏，且蹂躏人权，监察院职司所在，当然不能漠视。”于是，列举顾祝同五项罪状在《申报》上公布，其中包括拘押刘煜生未移交法院；拒绝监察院调卷；非法逮捕，逾越职权；意图陷害；妨碍言论自由，破坏法制精神等。并且再次提出弹劾，以“彻底根究，而清吏治”。

刘煜生无端丧命，顾祝同逍遥法外，新闻界亦为之大哗。上海新闻记者公会成立了“刘煜生案专门委员会”，并派代表赴南京吁请国民政府查办顾祝同。同时发出《上海市新闻记者公会呈请中央撤惩顾祝同通电》，其中称：“如此摧残人权，草菅民命，在军阀时代已属罕见，而顾祝同竟敢悍然为之。”强烈要求将顾祝同撤职归案，依法惩办。南京新闻记者公会在《宣言》中称：“似此任加人罪，何殊军阀暴行，若不加声讨，严惩重罚，不特新闻记者人人自危，即全国人民亦时时恐怖，国家纪纲破坏无余，社会秩序岂有宁日。”之后，发出振聋发聩之呼声：“全国各界，一致奋起，共作不平之鸣，籍尽护法之责！”抗议并要求严惩顾祝同的浪潮迅速蔓延到全国，无锡、常州、镇江、北京、天津、武汉、广州、青岛、太原、杭州等地新闻界均举行集会，发表

通电，抗议顾祝同破坏法纪之暴行，呼吁保障新闻自由。其时较有影响的《申报》、《生活周刊》、《新闻记者》等也载文谴责顾祝同，争新闻记者之权利。

（三）

刘煜生及《江声日报》事件同时也得到社会知名人士的极大关注。身为中国民权保障大同盟主席的宋庆龄闻知顾祝同如此践踏民权，非常震惊。她随即召集同盟紧急会议，并通知驻沪各新闻单位派记者参加旁听。既是同盟成员又是社会知名人士的蔡元培、林语堂、邹韬奋、史量才等均到会。

面对同盟成员和新闻记者，宋庆龄女士不无激动地说：“中国民权保障大同盟以保障民权为己任，对镇江新闻记者刘煜生这样连生命权都得不到保障的事件，我们岂能旁观。”蔡元培在会上宣读了谴责江苏省政府顾祝同、赵启霖蹂躏人权的宣言。宣言称《江声日报》事件“实与北洋军阀在北京枪毙邵飘萍、林白水如出一辙，全国人民应予以严重之注意。”邵飘萍、林白水均为著名报人，他们针砭时弊的犀利笔锋透骨见血，为军阀忌恨，1926年先后遭张宗昌枪杀，成为中国新闻界骇人听闻的惨案。《宣言》将顾祝同与北洋军阀视为同类，并称“顾祝同任意滥用其权利，蹂躏人权，破坏法纪之黑暗暴行，已明白证明顾祝同实质与北洋军阀毫无二式，亦即为我国人民之公敌。”宋庆龄随后倡议由上海新闻界发动罢市一日，以示态度之坚决。此倡议得到参会者的一致响应。

翌日，上海滩著名的《新闻报》公布国民党元老李烈钧专门致当局电：“欲集人民智能共决国事，首当以诚意示天下，人民所渴望者在此，政府所当努力者亦在此，则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经屡次所宣示者，当不致再托言。”李烈钧虽没有明确抨击顾祝同，但此时此地呼吁保障言论自由，其寓意十分显然。史量才任总经理的《申报》亦发表时评《顾祝同枪毙刘煜生案》，矛头直指国民党当局，认为对此案“政府有彻底根究以昭示于全国民众之必要”。著名报人邹韬奋在《新闻记者》一文中慷慨陈辞，不要“以为只须新闻记者能受操纵，能驯服如绵羊，便可水波不兴，清风徐来”，而“水波不



顾祝同

兴的下面必将有狂澜怒涛奔临,清风徐来的后面必将有暴风疾雨的到来!”

刘煜生案与《江声日报》停刊事件引起如此大的社会

反响是顾祝同所始料不及的,更何况此案的发展已给国民政府造成巨大压力。为平息众怒,国民党中常委蒋介石、汪精卫、居正、冯玉祥等于1933年8月联署发出《保障正当舆论》的通令,其中称“扶植民众运动,保障正当舆论,为本党一贯政策”。9月,国民政府又发布《切实保障新闻从业人员》的通令,称“各地方政府对于新闻事业人员常多不知爱护,甚至有任意摧

残情事”,“应由内政部通令各省市机关,对于新闻事业人员一体切实保护。”尽管当局在这些通令中作出了一些姿态,但对于刘煜生案的责任人顾祝同如果没有丝毫触动,既不能取信于民,亦不能平息党内怨言。迫于无奈,蒋介石最后还是撤销了顾祝同的江苏省政府主席,调任它用,以搪塞民愤。

《江声日报》事件给新闻界留下的印象是深刻难忘的。1934年,在刘煜生遇害一周年之际,新闻界纷纷发起纪念活动。杭州新闻记者公会有感于《江声日报》事件,倍觉新闻自由必须得到保障,遂倡议每年9月1日为记者节,以争取新闻记者的社会地位和保障记者之人身安全,同时促进全国新闻界团结一致,共同争取民主自由。这一倡议随之得到全国各地新闻界的响应。当年9月1日,北京、杭州、太原、青岛等地的新闻记者均举行了欢庆记者节活动。以后,活动影响逐步扩大,进而延及全国。

(责任编辑 吴 思)

128枚传世邮票揭示姓氏秘密 具有极高收藏价值机不可失

《寻根中国——中华百家姓》邮票珍藏册限量发行

经国家邮政局审核批准,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炎黄春秋》杂志社共同推出的大型邮票珍藏册《寻根中国——中华百家姓》2004年11月18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全球首发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掀起了全国性的“姓氏寻根热”。

这部珍藏册以“数典认祖、追宗寻根、中华子孙、万姓一家”为主题,按照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的抽样数据,将占目前国内人口总数90%左右的128个姓氏,以全新发行的8个整版暨128枚个性化姓氏邮票为主要载体,结集成上、下两册,并配有采集自炎帝陵、黄帝陵的圣土,中华人文始祖大型立体浮雕包金铜章1枚,通用型空白家谱1册,圣土采集暨限量发行钢印公证书1份。

珍藏册内收入的“中华百家姓”邮票由著名邮票设计师王虎鸣设计。该套邮票的发行,填补了世界邮票史上大型姓氏主题邮票的空白,具有极高的收藏价值。

全套珍藏邮册全球限量发行5万套,国内限量发行8000套,每套价格人民币3800元。

需要购买或邮购者,请将款汇至:

北京炎黄春秋杂志发行部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电话:(010)68522852 68532048

邮政编码:100045

传真:(010)68532569

日据台湾的真实历史

● 王也扬

自 1894 年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战败，次年日本割占我领土台湾，到 1945 年日本投降，台湾曾有过半个世纪的日据历史。不久前，黄静嘉著《春帆楼下晚涛急——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及其影响》一书在海峡两岸先后出版。作者早年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46 年赴台参加接收工作，即着手研究日据台湾历史，积数十年之材料与功力，锻造一书，揭橥历史真实，论辩大是大非，读了令人既受益又感动。

黄著指出，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除具一般殖民主义特征外，尚有其自己的特点，那就是以严刑峻罚的高压控制与深文周纳的自私政策相结合，对台湾人民实行政治压迫、经济掠夺和民族歧视。经过血腥镇压当地民众早期的反抗斗争，日本在台湾建立起由总督专制，配合警察和保甲制度的殖民统治秩序。50 年中，三分之二的驻台总督是军事首领，总督的命令即为法律。警察则是总督令的主要执行者，其员额超过文官数倍。台湾居民被编入保甲，十户为甲（设一甲长），十甲为保（设一保正），负治安连坐责任，使之互相监督；而在台日本居民不入保甲。保正虽为地方上有头有脸的人，但日籍警察震怒时，可随时令其当众下跪。

一些专门针对台湾人民的法令反映出日本殖民主义者极端残暴和用心歹毒，如为镇压抗日行为制定的“匪徒刑罚令”，除藏匿及“图免”匪徒者，为有期徒刑外，其他均为死刑，最轻亦为无期徒刑，且效力溯及既往。用该法令以一审终结的临时法院曾一次判处死刑犯近千。根据警察法，当局对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均得以干涉，只要被认定为“浮浪者”，不必构成犯罪，即可送往强制定居地火烧岛（今称绿岛）。又如

“台湾鸦片令”，该法令允许台湾人吸食鸦片，但又规定以鸦片或其吸食器具交予军人、军属或其他来台之帝国臣民者处死刑，严厉保护日本人防止其染毒。台人吸食的鸦片为政府专卖，当局从中牟取巨额收入。被日人所称道的第四任总督儿玉太郎及民政长官后藤新平治台的“功绩”，就是用向台民卖鸦片的钱一举使台湾变成了“帝国”之“宝库”。在其当政的 1903 年，总督府的岁入为 2170 万元，鸦片专卖收入即达 420 万元，而台湾当时人口仅 270 万！上述这些罪恶的法令一直实行到日据末期。

日本对台湾的经济掠夺更以强权加独占为能事，把宝岛当作大块肥肉全部吞入腹中（《马关条约》签订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语）。据台不久，日人即开始对台湾全岛进行详细的山林原野调查，凡无证明所有权之地契或其他确证之山林原野，皆归官有，结果民有地不及官有十分之一。当局把这些掠夺来的土地交予日本财阀和移民经营，从而控制了台湾经济最基本的资源。

为了抑制本岛民族资本，在日据台湾的前 30 年，曾禁止台民独立成立公司，台民如欲组织公司，必须把资本交给日本人支配（与日本人合组）或以日人为人头，这样日本资本在台湾建立起绝对的独占地位。以 1941 年为例，实收资本在 500 万日元以上的大企业中，日人资本占 96.9%，台人资本占 2.8%；而在台湾各业别投资总额的绝对数字上，日人资本约占 3/4；那些大规模的现代公司企业，则几乎整个为日人资本。一些台人资本的公司，经营权也操日人之手。

按照殖民统治者的意志，台湾长期被作为日本农产品（主要为糖米）的取给地，及其本土工业品市场。在对日输出的最高年份，台米约占日

本输入米量的四分之一(余由朝鲜供应),糖则几占日本国内消费量的90%。为了增加台湾的糖米产量并将其牢牢控制,殖民当局建设了嘉南大圳水利设施,并把给水量及给水期严加管制,对农民强行采取三年轮作制度,使每年灌区内必须有三分之一



《马关条约》的签字仪式(左)及春帆楼外景(右)

的土地种甘蔗,以保证日本在台独占制糖企业的原料供应。蔗农们因不满于甘蔗的垄断收购价格过低而多次抗争,均遭野蛮弹压。

不了解日据台湾史的人,一般会想当然地以为,台湾今日的现代化工业基础是当年日人留下的,其实这很有限。包括二战时期为支持战争兴建的工业,日据末期的台湾经济结构中,农业及农产品加工合计仍达各业总产额的70%以上。黄著以事实说明:台湾今日所取得的现代化建设成就,主要是光复后半个或多个世纪的发展,应归功于华人之素质及努力。日人在台遗留之基础建设及若干工业化设施,尚非其主导及决定性因素。

黄著还告诉读者,连日本学者也承认,台湾日据时代的民族压迫与歧视问题,较当时同为日本殖民地的朝鲜要甚得多。那时,台湾人被侮称为“清国奴”,没有任何基本的政治权利。台湾的较高级官吏和公吏,几乎完全为日人所独占。直至1945年,全台167位敕任官,本岛人只有1人,且为与行政无关的医学博士。日本人不仅独占了绝大部分公职,还“依法”享受特别加俸(较同级职本岛人高50—60%),退休后则继续任同业组合、公共埤圳、农会、水利组合、街庄长等职,仍享受优厚待遇,这些社会性职位也全部为日人所独占。

日本是靠普及教育而实现近代化的,因此深知教育对一个民族的重要性,其推行的民族压迫与歧视政策于此也颇为用心。根据殖民当局的教育法规,在台日本人子弟入“小学校”,本岛人子弟入“公学校”,前者经费由地方税支办,后者则

由街庄居民筹款自负,两种学校的设备、课程、师资均有差别,台人子弟上的公学校要逊色许多,这样到中学考试时就不能与日人子弟处于平等的竞争地位,至高等教育阶段,台人子弟便尽遭淘汰。事实上,当时用台湾人民脂膏作经费办的大学,长期是以自日本本土招生为其主要学生来源的。在1944年台北帝国大学学生357人中,本岛人仅85人,其中80人为医学部学生,文政学部只有2人,理农学部1人,工学部2人。可见殖民统治者如何殚智竭虑以限制本岛人接受高等教育,尤其是文法方面的教育。

在据台后期,日本殖民统治者开始标榜一种所谓“内地延长主义”,企图使台湾民众产生正逐步取得与日本本土人平等待遇之错觉;至侵华战争发动,为了将台湾人民绑上战车,更是掀起“皇民化运动”。学校中禁止学生说汉语,否则将受处罚;车站中若不以日语购票,则将无法购得车票;所有报纸的汉文版皆停止印行;执行公务不说日语将马上遭到解职。凡家中悬挂“国语(日语)家庭”牌子者,可以得到较多的配给及警察较好的对待。同时,当局还强迫本岛人改用日本姓名、参拜靖国神社,不肯配合者,会受到领不到配给品或撤职的处分……

黄著的书名,取自梁启超的诗句。1912年梁启超应台湾爱国人士林献堂之邀访台,夜泊马关,当地春帆楼为中国甲午战败媾和缔约之所,梁氏故有“春帆楼下晚涛哀”的诗句。黄静嘉先生有感于历史巨变,将梁诗中的“哀”字改为“急”字,可谓点睛之笔。(责任编辑 吴思)

胡耀邦向我们三鞠躬

● 陈 模

我是 1936 年参加革命的。1945 年 8 月日寇投降后 , 跟随中央青委常委蒋南翔率领的五四青年干部工作队挺进东北做青年工作 , 担任青年团哈尔滨市委书记、团黑龙江省委副书记 , 建国后任《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

我们《中国青年报》是团中央的机关报 , 报社人员都是从团内外挑选的好干部 , 报社里热气腾腾 , 绝大多数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 , 工作热情、肯干 , 他们富有朝气 , 敢想敢干 , 是一个颇有革命活力的先进集体单位。

《关于出版《中国青年报》的决定》是团中央副书记、组织部长蒋南翔同志起草的。南翔同志在创刊的筹备、调配干部、培训人员方面 , 付出了大量的心血。继他领导《中国青年报》的 , 有胡克实、刘导生同志。他们都以思想锐敏见长。领导《中国青年报》时间最长、抓得最具体的是胡耀邦同志 , 可以这样说 , 他是《中国青年报》的灵魂。

耀邦同志常常来报社参加编委会 , 向编辑部干部讲话。讲到报纸的战斗性问题 , 耀邦同志从座位上站起来 , 口里讲着手比划着说 : “ 报纸是个号角 , 要吹着人前进的 , 因此声音必须洪亮。力量微弱、战斗性不强 , 就不能很好地起引导与鼓舞大家前进的作用。今后《中国青年报》应当加强战斗性 , 也就是加强指导性、鼓舞性 , 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报纸应当有声音 , 有言论 , 争取每期有一篇社论…… ” 他要我们拿出好榜样 , 让青年学习 ; 又要把坏人坏事公布出来 , 让青年不要学 , 并鞭策有这样、那样错误和缺点的人改正。

反右派斗争开始后 , 胡耀邦同志率领中国青年代表团访问伊朗等中东国家。团中央机关党委书记在家主持工作 , 并领导团中央机关及所属各单位的反右派斗争。

《中国青年报》的社长、总编辑 , 开始由团中央宣传部正副部长杨述、韦君宜兼任着 , 以后专

职社长是陈绪宗 , 他是上海复旦大学文学系毕业、团华东工委宣传部长 , 文笔过硬 , 工作稳健。继任者是张黎群 , 他勇于开拓创新 , 放手使用干部 , 坚定地执行耀邦同志的办报方针 , 要求大家做一个思想解放、朝气蓬勃的青年报人。主持日常编务的副总编辑 , 一个是我 , 主管青年运动和团的工作的报道 , 包括青工部、青农部、团的生活及《团支部副刊》。另一位是钟沛璋 , 主管文教和思想理论宣传。在《接班人》副刊上 , 发表过冯定、周扬、乔木、丁浩川、田家英等著名理论家的文章 , “ 思想三日谈 ” 栏目虽小 , 颇受青年欢迎。《辣椒》副刊号召青年在做好自身工作的同时 , 要勇敢揭露社会生活中的丑恶现象和刚刚露头的干部中的腐败作风。《辣椒》一创刊 , 就在社会上产生很大的影响。各省、市、自治区的团报、团刊 , 也办起了类似的副刊 , 敢于讲真话 , 说心里话 , 形成了一股社会舆论监督力量。

《中国青年报》不仅办成了深受青年喜爱的报纸 , 也成为成年人爱读的报纸。发行量平时每天 200 多万份 , 最高时七八百万份 , 受过毛主席的几次表扬。

1957 年反右派斗争开始后 , 张黎群同志由于在首都新闻工作座谈会上 , 有个称报纸成了 “ 布告牌 ”、“ 传声筒 ”、“ 留声机 ” 的发言 , 团中央工作组要把他打成右派 , 几经折腾 , 邓小平同志说了话 , 保护他过了关 , 但被撤职下放。前社长、总编辑陈绪宗 , 由于保护他爱人 , 为她开脱 “ 胡风分子 ” 的罪名 , 被开除党籍 , 列为右派。副总编辑钟沛璋主办《辣椒》, 鼓吹反官僚主义 , 《星期天》副刊宣传穿花衣服 , 提倡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 在团中央召开的会议上 , 还发表团的 “ 独立性 ” 言论 , 被打成右派。

我入党后受党的教育 , 组织观念比较强。团中央机关党委号召 , 党员要帮助整风、提意见时 , 我在座谈会上就积极发言 , 讲了三点 : 1、团的学

校工作,不如解放初期 2、团的基层工作薄弱 3、团中央对团报的领导,有官僚主义的情形。我在报社负责团的三大宣传,登了几篇发扬民主,对团的工作提意见的文章。

没过几天,社内和团中央大会就批判我和社会上的右派配合,猖狂地向党进攻,说我散布“今不如昔”、“青运倒退论”、“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火烧三大”,将我兼的反右派领导小组组长撤职,以团中央派来的工作组取代,要把我列入“敌我矛盾”,将我打成反党分子(也就是右派分子)。

所有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人,都要经过团中央常委会的讨论。张黎群同志是常委之一,他在常委会上说:“陈模从小参加革命,历史清楚,扛过枪、吃过小米、爬过大山,把他打成右派,他想不通,会自杀的。”主持会议的××,打断他的话,严厉地说:“你这是温情主义,就让他去自杀吧!”于是,我被打成反党分子,开除党籍,降五级,下放农村劳动。对我来说,有如跌进了无底的深渊。党组织对党员也要讲诚信,自己号召党员对党提意见,而且意见也是善意的,怎么能“引蛇出洞”,翻脸不认人,把人打成右派呢?

原来我并不知道我被定为“反党分子”的决定。1957年末,我向党支部交党费时,党支部书记说:“你已经被开除党籍,不用交党费了。”这是晴天一声霹雳!我受到极大的震撼,人的精神似乎整个地垮了。我回家连哭了三天,爱人、亲友和孩子,谁也劝阻不了我。饭也吃不下一口,只喝了一些开水。

我想,哭没有用,也不是办法。团中央的书记们一个个我都熟,有的还是我的老上级。应该说,他们是了解我的为人和过去的表现的。我去找了章泽、路金栋、胡克实、王伟等人。我说,我没有反过党,我对党是有认识、有感情的。我有工作中的错误,念我入党二十年第一次犯这种错误,请不要开除我的党籍。我可以辞去党内外一切职务,带着老婆孩子,下放农村,不拿国家一分钱,自食其力,在业余帮助党支部、生产队做些工作。书记们说,不行啊,你的错误性质是敌我矛盾,党籍是不能保留的。平时,他们一个个是和善的领导人,这时候都变成“铁面无私”的人。我陷入无比的痛苦之中。

在中国青年报社,除整了张黎群、钟沛璋和我之外,青工部、文艺部、记者部、思想修养部四个部主任都被打成右派。编委会九个编委打了五个。《辣椒》组长及几乎所有评论好手都打成右派。有一位编辑在院子里贴了一张《人事科用人唯亲》的大字报,被打成右派。一位同志不服气,说了句“这也成为右派?!”照样被打成右派。党中央明文规定,在一个单位内打的右派,不得超过单位人数的1.5-2%。《中国青年报》编辑部人员不到100人,被打了17名右派,主要领导和业务骨干都倒了。

1957年9月末,胡耀邦同志率领中国青年代表团结束访问中东几个国家,回到新疆的乌鲁木齐市。一下飞机,他就打长途电话,问团中央主管反右派斗争的书记处书记××:“家里的运动搞得怎么样啦?”

答:“已经结束了。”

耀邦问:“这么快呀,打了多少人?”

答:“七十一人。”

耀邦问:“《中国青年报》呢?”

答:“十七人。”

耀邦说:“损失惨重呀!”

耀邦同志回到北京,详细地了解了团中央机关和各直属单位反右派斗争的情形,认为有不少人只是思想认识问题,并无反党的行动,是不应该打成右派分子的。他想为《中国青年报》的两位副总编辑——钟沛璋和我平反。在团中央的各省、市、自治区团委书记会议上,他提出为钟沛璋平反,出席会议的书记们,因受反右派斗争“左”的影响,没有一个人同意,我的平反也只好作罢。

1958年2月,团中央系统71名挨整的右派,要下放到山西省平顺县去劳动改造。出发前一天上午,耀邦同志在团中央大会议室接见大家。他说:“你们人很多,我来不及一个个找你们谈话。今天和大家见见面,谈一谈,也算给你们送行吧。我今天要讲的,集中起来是‘两个十分’的问题。”

大家听了不甚明了,这“两个十分”是什么意思。他慢慢地说,这“两个十分”,一个“十分”是,你们所犯错误的性质是十分严重的,你们应该有足够的认识;第二个“十分”是,你们的前途是十分光明的。第一个“十分”,他只讲了两句

话,再没有多讲。第二个“十分”,讲了一个多小时。他的大意说,人的一生,不可能一点不摔跤子,只是摔得多,摔得少而已。他还问大家,摔了跤子怎么办?一句话,摔了跤就爬起来,在哪里摔的,就在哪里爬起来。摔跤子是坏事,也不完全是坏事。可以吸取教训,以后不再摔跤子。为什么说你们的前途是十分光明呢?第一,因为你们年轻。如果是老年人,摔了跤子爬起来,来日也不多了。你们不同,才二三十岁,还有几十年好过。给你们改正错误的时间很长,改正了,还能为党为人民工作嘛。第二,你们有文化知识,有一定专长,可以用你们的本领为国家做事,为人民服务。第三,你们受过党的长期的教育,不少人还是党员,对党都有一定的认识。有了好的表现,将来还可以入党,党的大门对你们会敞开的。

耀邦同志的讲话,给我们很大的鼓舞。他没有摆训人的架子,更多地是亲切的关怀。在我们面前,他不是什么大首长,倒像个慈祥的长者。

临走时,我送他下楼。从他1952年秋来团中央以后,我和他接触很多,每个星期天的晚上,各报刊和团中央宣传部的负责人,都要到他家中去开“神仙会”,汇报青少年情况,议论可写的社论、文章。他出题目的社论,我就写过十二篇,写好要送给他看、修改,交心的时候也很多。他拉着我的手说:“陈模,下乡劳动习惯吗?”我说:“我是贫农出身,从小干过农活。”他说:“你摔了跟头,要想得开,我等着你的好消息。”我谢了他,说:“我会努力的。”他点了点头。

时间过得真快,“四人帮”垮台之后,我被借调到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担任《儿童文学》杂志编辑室主任。1977年的7月,我给胡耀邦同志写了一封信,要求为我1957年的冤案平反。不久,团中央机关党委派人找我说,你给耀邦同志写的信他收到了,他给我们写了一封很长的信。信上说,他完全同意为你的冤案平反。只是中央组织部、宣传部、公安部、民委、统战部正在起草为右派改正的87号文件,不久会发下这个文件。在文件发下来以前,你是否可以先重新入党?我说:“我是1938年5月入党的党员,为什么还要重新入党呢?”来说:“这是权宜之计,耀邦的一份用心嘛。”我没有同意,来人走了。

过了几天,来人又找我,劝我先重新入党,便

于为党工作。我说:“那样,我要保留恢复党籍的权利。”来人表示同意,我就在入党志愿书上注明了恢复党籍的要求。当天夜里,中国少儿出版社召开党支部全体党员会,一致通过我重新入党。团中央代表宣布任命我担任中国青少年出版社党组书记兼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总编辑。我二十一年没有工作,如今走上工作岗位,感慨与兴奋之情不言而喻。我狠抓了拨乱反正的工作,无非是给挨整的人平反,重建编辑队伍,不断扩大出书品种,恢复原有杂志,增加新的杂志等等,这就不啰嗦了。

1978年12月间,党中央发布了87号为右派改正的文件,我是团中央平反的第一名。

1979年2月间,团中央召开一年一度的各省、市、自治区团委书记会议。过去我是团中央委员,都要出席,现在让我列席。会议地点在西苑饭店,我去晚了点,坐在最后排。胡耀邦同志这时任党中央的秘书长兼中宣部部长。他是团中央的老书记,会议请他来讲话。他一进门就看见我,笑着说:“陈模同志,你好啊!”我答:“您好!”他又问:“工作了吗?”我答:“感谢您的关心,已经工作了。”他高兴地说:“那就好。身体呢?”我说:“身体好。”他拉着我的手,让我在第一排坐下,自己走到主席台前,不等会议主持人宣布开会,自己站在麦克风前讲起话来。他指着我对与会者说:“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陈模同志,团的高级干部。1957年反右派斗争,他挨了整,吃的苦头最多。这件事我也有责任,我在最后的裁定书上也签了名嘛。现在我向陈模同志赔礼道歉!”说着他走到我的面前,行了三鞠躬。他并没有直接整我,先把整人的责任担当起来,他的大度、坦诚、谦逊的作风,感动得我热泪盈眶。耀邦同志接着说:“我不但向陈模同志道歉,还要向团中央机关及所属单位所有挨整的,被打成右派的同志道歉。”说罢,走到主席台前向全场同志三鞠躬,赢得了与会同志热烈的掌声,也赢得全团同志的尊敬。

耀邦同志又说:“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看,这件事对陈模同志也是一次锻炼,一次学习。我还要强调的是,今后这种整人的事,不要再发生了!”台下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

(责任编辑 吴 思)

“扫盲大跃进” 亲历记

● 孟祥才



上海沪东造船厂工人报喜

1958年7月下旬,我正在山东临沂北老屯村家中度暑假,每天同社员一起下地干活。有一天刚吃过早饭,大队长找到我说:“今天上午公社召开扫盲誓师大会,你就不要下地干活了,带几个学生去开会,回来咱们商量怎么扫盲。”当时我这个高二的学生在全村是最高学历,参加扫除文盲的活动是责无旁贷。于是我急忙找了四五个中学生,一起赶到五里之外的公社驻地付庄。

进入公社大院,只见刚刚搭建的主席台上红旗招展,旁边几个年轻人起劲地敲打锣鼓。院内墙壁上贴着大字标语:“工业大跃进!农业大跃进!扫盲也要大跃进!”“苦战三个月,扫除全公社文盲!”大约九时,誓师大会开始,公社书记作动员报告,大讲了一通扫除文盲的意义,号召全公社敢想敢干,一定在三个月内将文盲扫光,每人都能识字三千,达到熟练的读书看报的水平。接着文教助理将扫盲的组织领导、工作步骤、检查验收等有关事宜做了布置,最后是几个大队代表表决心,调子出奇地一致,都是保证超前完成任务。

散会后回村的路上,我心里直打鼓:小孩子6年小学毕业,还不一定能顺顺当当地读书看报。现在正值夏季,农活挺多,组织文盲识字一无时间,二无教材,要求三个月扫光文盲,简直是开玩笑。我回村就找大队长汇报,讲了许多困难,表示三个月无法完成扫盲任务。大队长是我的同姓长辈,他苦笑着说:“现在什么都跃进,上面怎么布置,咱就怎么干。反正别人能完成,咱也能完成。”他要我立即向全村广播,要求全村50岁以下的青壮年文盲,不分男女,从明天起,以小队为单位,利用午饭后时间,各自找一片树荫,学识字一小时,然后再干活。当天下午,我就召集全村八九个初中生开会,要求每人包一个小队,以小学语文课本作教材,以一块小黑板作教具,自找场地,从明天起,利用午休时间,开展扫盲教学活动。

第二天中午,我“巡视”了全村八九个树荫下的教学点。这些点上,多则二三十人,少则十几人,都在老师的带领下认真地看着黑板学识字。当时我很高兴,心想,虽然三个月完成扫盲任务有困难,但只要这样坚持下去,让文盲识些字还是不成问题。识字教学进行到第四天中午,我正在一个教学点上教社员识字,大队长心急火燎地找到我,说:“坏了!咱们大队的扫盲落后了。人家付庄大队,上午开完誓师大会,下午就向公社报捷,说他们已经完成了扫盲任务。你快去大队办公室,用红纸写一份报捷的喜报,就说我们大队经过苦干加巧干,也超前完成了扫盲任务。然后找几个年轻人,敲锣打鼓将喜报送到公社。”他看我吃惊的样子,不容置疑地说:“快去办!再不快点,咱就更落后了。”

我只得按照他的要求写了“喜报”,于当日下午四时左右敲锣打鼓送到公社大院,受到公社副社长、文教助理、团委书记的接待。他们接受了我们送去的“喜报”,说了些“继续努力,巩固成绩”之类的话。回过身来,我环视公社大院,看到四面墙上贴满了报捷的“喜报”,全公社的大多数生产大队都在我们之前报了捷,我们真是有点落后了。

回村后我向队长汇报了报捷情况,谈到怕公社检查露馅时,队长说:“不用担心。我估计十之八九不会检查。为防万一,你把全村上过小学和初中的人列个名单,让他们随时准备应付检查。”以后,我们又组织了几次识字教学活动。由于已经报捷,组织者和参加者都没了积极性,“扫盲大跃进”也就结束了。

平心而论,“扫盲大跃进”不过是整个“大跃进”中微不足道的一出小小的闹剧,但它却具备“大跃进”中荒唐事件的基本特征:上面下面一齐吹牛、造假,彼此心照不宣而又装得煞有介事。(责任编辑 吴思)

我与日军空战

● 吴鼎臣 口述 张学锋 整理

1937年9月19日的沪宁保卫战中，由于日军的96式战斗机性能优越于我们当时使用的霍克Ⅲ战斗机，战斗中，我的飞机中弹十多处，一粒达姆弹击穿飞机的玻璃风挡后炸成无数只芝麻大的碎片穿进我的右小腿内，忍着剧疼，我驾驶着受伤的战机好不容易才降落到扬州机场。紧接着就被紧急送到扬州医院进行手术。

当时我们空军的情况并不好，军事力量上敌优我劣，尽管中国空军已连续击落日机60多架，但我们损失更大，由于没有技术力量制造也购买不到飞机，国民党军方只能“拆东墙补西墙”，临时组装一些飞机，根本压制不住敌机的强大攻势。照这样下去，中国空军将全军覆没。

就在我为下一步如何空战焦急万分的时候，接到了我所在的空军四大队发来的电报，让我在伤好之后赶到兰州接收苏联援助的新型飞机。要知道，能驾驶战机重返蓝天战斗，那是一件多么让人振奋的事情啊！当时别提我有多么激动了。顾不得腿伤还没有痊愈，我坚持要求出院，当天奔赴兰州。

这里有必要提及《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由于空军损失殆尽，国民党政府开始寻求外援，当时太平洋战争还未爆发，美国无心介入，蒋介石只好把目光投向苏联，经过一番磋商，于1937年



吴鼎臣

8月21日签订条约，苏联不但为中国输送了飞机，还派来了志愿航空队参加中国的对日作战。

当我风尘仆仆地赶到兰州，战友们在与我热烈地拥抱后，就急着向我介绍苏联新式战机的优越性能。我们四大队接收的是E-15和E-16两种型号的战斗机，这两种战斗机最大的优势就是速度快，转弯灵活，配备的火力猛。先是在湖北襄城机场完成熟悉飞机性能的训练任务后，我们四大队就接到上级命令，驻防到武汉王家墩机场，保卫武汉领空。武汉作为当时国民党的政

治、军事指挥中心和抗战物资的集散地，战略地位极其重要，自然也是日军进行军事打击的重要目标。我们个个摩拳擦掌，发誓要驾驶新型战机给日本人一点颜色看看。

第一次空战，我们击落敌机十二架

1938年2月18日，武汉地区晴空少云，江面上风平浪静，舟楫稀疏。地处中原地区的武汉，虽然离当时的抗日前线还有几百公里，但在中国传统的春节期间里，人们根本没有心思过年，日军飞机空袭的警报不绝于耳，战争的阴云笼罩着武汉三镇。

当天，我和其他担任警戒任务的飞行员寸步

不离各自的战机,就连中午吃饭,我们都是在各自的机翼下面蹲着吃,就在我吃完饭准备进入机舱休息会儿的时候,突然间空袭警报长鸣,我们立即登上战机做好起飞的准备。这次日军来势凶猛,在26架战斗机的掩护下,12架96式轰炸机满载着炸弹,排着长蛇阵向武汉方向饿扑过来。

随着三颗红色信号弹的升空,在代大队长李桂丹的率领下,我们四大队所属的21、22、23中队立即全部起飞,迎战敌机。当我们升高到2000米高度时,就发现大批日机已逼近武汉东南部上空。李桂丹当机立断,指挥大家投入战斗。第22、23中队担任主攻,第21中队负责掩护。顷刻之间,一场激烈的空战打响了。就在我的飞机升高到3000米的高度时,一架96式战斗机居高临下向我俯冲下来,想咬住我的飞机尾部实施攻击。由于手中驾驶着性能优越的E-15战斗机,我心里一点也不慌张,开始慢慢地在空中兜圈子,并故意做出躲避敌机射击的样子,引诱敌机上当,敌机果真以为我的战机害怕了,也跟着我的战机转起了弯子。突然,我以最小半径的急速转弯,猛地转到日机的尾巴后面。惊慌失措的敌机发觉上了当,猛升、猛降、急转弯……使出吃奶的本领想挽回劣势局面。上钩的鱼儿可不能让他白白溜掉,当距离三十多米远的敌机锁进了我的瞄准镜时,说时迟那时快,我的四挺机关枪同时开火,眼看着敌机飞行员的脑袋蔫在一边,刚才还嚣张不可一世的日机此刻拖着长长的浓烟,翻转着向前

下方坠落下去。那年我未满23周岁。

“二·一八”空战,从战斗打响到结束,只进行了12分钟,共击落敌机12架。四大队损失飞机5架。代大队长李桂丹、中队长吕基淳、队员巴清正、王怡和李鹏翔5人,为掩护战友血撒碧空。

2月21日,武汉市各界在汉口总商会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中共中央和第十八集团军代表周恩来、陈绍禹、秦邦宪、董必武等领导人送来了挽联,上写:“为五千年祖国英勇牺牲,功名不朽;有四万万同胞艰辛奋斗,胜利可期。”

“二·一八”空战的中国空军的胜利,大长了中国军民抗击日寇的士气。过了几天,那些被我们击落的敌机残骸被堆放在汉口中山公园大门外,武汉百姓扶老携幼争相前来观看,照相留念。我们这些飞行员自然也成了武汉姑娘追求的偶像,我的妻子也就是在那时经朋友介绍认识并结为眷属的。

第二次空战,钢板椅背救了我的命

没有了敌机的骚扰,武汉又暂时恢复了往日的繁荣,商店照常开门营业,学校也恢复了上课,就连电影院也开始热闹起来……但我们空军时刻没有放松,时不时地飞到前方战场为陆军加油助威,并在空中向日军阵地投掷炸弹。为打击日军空军基地,我们奉命调到南昌机场,准备与苏联空军志愿队一道,奔赴广州外海的三灶岛的日



1938年2月18日,在武汉上空一举击落12架日机的中国空军将士

军基地实施空中打击。但天公不作美,正逢梅雨季节,天天小雨下个不停。

那时中国空军有三个不飞:天气不好不能飞,飞机不好不能飞,飞行员身体不好不能飞。没有办法,我们只有在南昌待命。

4月29日,是日本天长节,即日本昭和天皇的生日。日军企图在一天之内一举消灭驻武汉的中国空军主力,以实际行动向天皇祝寿。为此,日海军航空兵团经过两周苦心筹划和精心准备,决定由佐式保指挥的第2联合航空队负责执行这一“神圣使命”。

殊不知,日军的意图早已被中国空军所获悉。中国空军在4月20日击落一架前来武汉上空进行侦察的日机,在死去的飞行员身上搜出了一个笔记本,上面披露了日军29日空袭武汉的重要情报。在与苏联志愿航空队研究部署后,我们做好了充分的战斗准备。

日军对他的秘密被泄露并不知晓。当天下午1点多钟,日本棚町少佐率18架轰炸机,在小园少佐指挥的27架战斗机的护航下,从安徽和江西边界大举进袭武汉。

下午2时30分,日空军编队进入武汉空防警戒范围,三镇空袭警报同时响起。早有准备的中国空军第3、4、5大队的19架和苏联志愿航空队的45架E-15、E-16战斗机此刻已占据有利高度,正准备歼灭进入他们预先设下的空中口袋的日机。

这一仗历时30分钟,在中苏飞行员的密切协同作战下,共击落敌机21架,余下的狼狈逃窜。中国飞行员陈怀民和苏联志愿队飞行员舒斯捷尔与日机格斗中,临危不惧,在战机受伤的情况下,先后与敌机相撞而英勇牺牲。他们为中国抗战而死,功垂千史。

在那天的空战中,我和陈怀民担任总领队刘宗武副大队长的僚机,突出在大队的最前端。战斗一打响,我就遭遇三架敌机对我进行包围攻击,我照顾了这一架,就顾不上另外两架。突然间,一阵子弹打得我的座椅背叮当响。这下我反倒镇静了许多,真没想到我刚刚安装的自制钢板椅背救了我一命。“二·一八”空战,我们吸取了阵亡战友的教训,将原先战机上的铝皮椅背改换成防弹钢板)。我沉住气准备寻找机会先击落其

中一架再说。不料,又一阵子弹从我的侧面进行扫射。立刻我的战机被打中起火,由于惯性,大火烧在了我的面部和颈部,情况十分危急,我只得弃机跳伞,降落在武昌徐家棚附近的水田里,落地后才感觉到脸上身上一阵阵灼疼。

当地的老百姓得知我是中国空军飞行员后,立即取来扁担、绳子和门板做了副临时担架,抬着我准备护送我过江。行走了约一里路,遇到了开车前来巡查路况的粤汉铁路的一位段长,当听说我是负伤的中国空军人员,急忙将我扶上车,将我送到粤汉铁路医院进行急救包扎,然后又护送我过江,就这样我又转入了当时由外国人开设的万国医院(位于中山大道黎黄陂路的交叉口)。经过外国医生的复查,重新消毒后整个头部包了起来,由于伤势严重,必须住院治疗。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就在我住院的当天,我正迷迷糊糊地躺在病床上,突然听到有人对我说:“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先生来看望你了。”我想揭开包扎在眼睛上的纱布,亲眼看看共产党的领导人,周恩来轻轻地握住我的手,用我们苏北口音亲切地对我说:“希望你好好养伤,伤好后再重上蓝天杀敌,我们后会有期。”尽管当时我没有看到周恩来先生的面容,但他温暖的双手、亲切的问候,至今让我终生难忘。两天后,我面部的纱布拆除了,看到病房摆满了慰问的鲜花,床前的桌子上放满了各种食品,床头上放有社会各界人士慰问时留下的名片。还有抗敌后援会赠送的一块阿美加手表和一只派克钢笔。

陪护我的小通信员将我身上换下来的衣物还给我,我的飞行服被敌人燃烧弹引燃烧成了碗口大的洞,身上穿的衬衣背后有6个洞,那是被敌人子弹从侧面射穿的。那子弹距离我的腰部至多也只有0.5—1毫米。我右脚大脚趾上被子弹射穿了两个洞,但未伤到脚趾骨。我真的好幸运,也多亏了那块钢板椅背,是它救了我的命。

由于我的面部伤势较重,还需要进一步治疗。就这样,我失去了“5·31”武汉第三次空战的机会。三个月出院后我奉命调离空军四大队,到昆明航校一面疗养一面工作,并开始了培养飞行员的教官生涯。

(责任编辑 吴思)

不从乱命引祸端

● 王生明

《东周列国志》从“周宣王闻谣轻杀”到“号始皇建立郡县”全书共写了108回(章),对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的兴亡盛衰,作了或粗或细、或深或浅的剖析,成为后人(包括共产党人)的资政明鉴;然而,在上个世纪70年代,时任中共雁北地委副书记的李惠春同志,在借用《东周列国志》第五十五回“从治命,不从乱命”的古训,回答其部下提出的:“‘四人帮’倒台了,为什么还要继续批邓”时,却因此而招来被捕入狱之祸。



李惠春

分管地委组织、宣传系统,是我
的高层领导,我的思想遇到疑
惑,他有义务给我做思想工作。
当我坐下来聆听他的开导指点
时,他却没有直截了当解答我的
问题,而是慢声细语地像个说书
人一样,讲起了邓小平同志的经
历:从少年留学法国,到百色武
装起义;从中央苏区任县委书记
到带领八路军一二九师开进山
西;特别是在讲到解放战争初
期,小平同志怎样组织策反国民
党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高树勋
起义反蒋时,讲得十分详细,对
邓小平充满敬佩之意。接着又讲
刘邓大军南下大别山;参加指挥
淮海大决战;全国解放后调回中
央帮助毛主席和周总理执掌党

和国家军政大局;“文革”中怎样经历磨难;毛主席又怎样器重难舍;复出后在整顿“文革”混乱局面时多么英勇果断等等。

1976年秋天,十月里响春雷,八亿神州举金杯”(施光南的祝酒歌)。直接受到过“四人帮”之苦的人,更是心花怒放、扬眉吐气。可是高兴了没几天,从北京和省城太原,相继传来“继续批邓”的号令。时任《雁北报》副总编的我,心一下子凉了半截,三思而不得其解。

一日夜晚,因失眠症不敢按时上床休息,在夜深人静时走出楼门去散步,望到地委办公楼李惠春同志的办公室内灯还亮着,我即推门而入,当着他的秘书直问:“‘四人帮’都垮台了,为什么还要继续批邓?”

李书记见我思想郁闷、情绪烦躁,先让我坐下,让他的秘书给我倒一杯开水,在秘书还没有从写字台前站起来的时候,就被我谢绝了。我再次单刀直入,请书记对“继续批邓”的必要性做出明确的解答。我之所以敢如此固执是因为,他虽然是个“三八”式的12级老干部,但我和他平时交往多,在“四人帮”疯狂肆虐的时候,他就敢在我面前抨击江青,我了解他的政治底牌。而且他在我面前从不摆架子,所以我们之间不讲客套。再者,他

我与他的秘书聚精会神地听完他讲的故事,等他正面回答我提出的问题时,却哼哼唧唧,欲言又止。见他有难言之苦,我先说话:“按书记所言,更不该批邓。书记对我的提问不做正面回答,我能理解。我们的报纸宣传贯彻‘继续批邓’很可能跟不上形势,也希望书记能够理解。”说罢起身就走。在我将要跨出门槛时,又被书记喊回来,我问:“还有什么指示?”他笑而不答,随即从他的书架上寻出一本书,就是《东周列国志》,他翻到第五十五回,给我和他的秘书宣读并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晋国名将魏 每次出征前都要给他的两个儿子留下遗言:我若战死沙场,你们给我的爱妾祖姬找个好人家,把她嫁出去,免得我死后让她流离失所。到他年老病

重临终之前,却又留下遗嘱:我死后让祖母给我陪葬,免得我在黄泉之下孤身无伴。言毕而卒。他的长子魏颢为他办理丧事时,未让祖母陪葬,而是让她改嫁远走他乡。小儿子指责其兄长不按父亲的临终遗嘱办事为不孝。魏颢说:“孝子从治命,不从乱命”,父亲年迈病笃,脑子已不管用,殉葬之命,与他一向关爱祖母的本意是背道而驰的,故不殉葬。这位“从治命,不从乱命”的魏颢,后来成为晋国功德显赫的大将。

这个故事讲完后,李书记无比遗憾地说:“两千多年前的人尚能正确对待先人的遗愿,更何况毛主席并未留下过继续批邓的遗嘱,我个人认为继续批邓是没有道理的。”我长叹一声接着说:“古人比我们高明,我们不如古人!”李书记则说:“不能这么讲,认识一条真理并不容易,要有一个过程,办任何事太急了反而办不好。”

告别出来,已是满天星光。可我心中并无豁然开朗之感。谁能料到什么时候才能从“治命”而不从“乱命”?

大约在半个月后,一位领导同志在地直机关干部参加的大会上宣布:“李惠春犯有严重的政治错误,停职反省。”并说,有人在深更半夜到他家通风报信,因此勒令切断其家中的电话。此时,我已经感到自身不妙,在未对我下手前,在朋友的指点和帮助下,我离开了雁北,没过多时,听说有人检举揭发他借古讽今,用《东周列国志》的故事,恶毒污蔑毛主席,攻击党中央“继续批邓”的政策,因此而被逮捕送往大同县看守所关押。事后弄明,检举揭发他的人不是李惠春的秘书,而是一位具有高等学历、能说会道的有识之士。

1978年12月,中共山西省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我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驻晋首席记者身份驻会采访。一日,在参加分组讨论中,省委副书记王大任、常委贾俊、省军区司令员王夫之(省常委)三位领导走进小会议室,听取大家发言讨论时,遇到短暂的冷场。会议临时主持人指着坐在最后一圈椅子上的我说:“年轻人发言。”是的,他们大都是“三七”、“三八”式的老字辈,就我是个“小不点”。我说:“我只是个记者,有记的权利,没有发言权。”他说:“党的会议,你是党员就有发言权。”我当机立断,把椅子往前一推,挤到大圆桌前的第一圈坐下后说:“说实话,我有事早想给省委领导汇报、今天我要当面向大任同志、贾俊同志、王司令员报告一件事……”

我一口气讲了雁北地区在清查“四人帮”的帮派体系时,有人夹杂私心,对李惠春同志“从治命,不从乱

命”的本意恶意曲解,颠倒黑白,把他错误地定为“现反”,是个冤案,希望省委重新审查李惠春一案。在我发言中间,曾被一位身穿黄色军服的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厉声打断,他质问我:“你是不是说雁北的‘清查’搞错了?”我以同样的语气回敬他:“我是在向省委三位领导同志汇报,不关你的事!”

分组讨论结束后,我立即回到大会为我提供的住房面壁发呆,真没想到自己会在这么重要的会上放这么一炮,我的发言会不会给尚在看守所的李惠春同志帮倒忙?第二天早饭后,大会简报被送进我住的房间,在厚厚的一叠简报中看到一份,上面印的全是我昨天在分组讨论会上的发言摘要。还没有来得及高兴之前,我想到了另一种后果:“王某人系李惠春的同党、漏网分子,逐出大会,撤职查办!”又想,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一切都印在简报上了,只好听天由命去吧!

出我意外的是,一出喜剧的帷幕突然拉开。会后没几天,我接到李惠春同志一个电话,他说自己已被释放,正在迎泽宾馆东楼某房间等待省委书记王谦同志接见。

我立即到宾馆去看望他,路上还琢磨下几句安慰他的话,可是一见面却派不上用场,因为老李在看守所蹲了一年半,却全然没有一丝一毫变化,还是那样和声细语,还是那么乐观幽默。他说:“我在看守所自学了高中化学,针对雁北耕作粗放、肥料短缺的弊病写好两篇论文。正准备写第三篇论文,地委薛书记驱车赶来,亲自走进监所对我说,12月28日接到省委‘立马放人’的电话,他马上赶来请我出监,出监后直接把我拉到大同县招待所设宴款待,我从阶下囚到座上客,不到两小时,你有什么感想?”

我说:“你的思想解放得比别人早,古今中外,凡是先知先觉者难免扮演悲剧角色。你演的不是悲剧,而是悲喜剧。值得庆幸。”

不久,李惠春同志到中共太原市委担任副书记。又不久,他被调往中共长治市委荣任第一把手。最后一岗是省顾委委员。

20多年过去了,搬了几次家《东周列国志》始终没有离开过我的书橱,工作生活中遇到疑难事便去翻阅它。我的悟性不好,可也悟出一句话:认识一条真理,不仅需要智慧,更需要有一颗公正无私的心,还不可缺少勇气。

李惠春同志是个爱学习、有智慧、有道德,又不缺少勇气的老共产党员,我们党有这样优秀的党员,理当引以自豪!

(责任编辑 杜晋)

张闻天出任总书记的前因后果

● 曹春荣

杨尚昆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就在莫斯科与张闻天有同窗关系,30 年代前期又在中央苏区与张闻天有上下级关系,他生前曾经对都是所谓“教条宗派”里人的博古、洛甫(即张闻天)和王稼祥,作过一番比较。说他们的共性是都相信共产国际,学了不少本本,但没有实际工作经验。他们的区别则在于“张闻天喜欢学习,喜欢研究问题,平易近人,不大愿意做整人的事”;博古很有才气,锋芒毕露,比较喜欢整人;王稼祥比较灵活。寥寥数语,张闻天的书生意气便跃然纸上。

事实也的确如此。张闻天在未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职业革命家之前,是个饱读诗书、学贯中西的书生。他受过高等教育,留过洋,评介过外国文学,写过长篇小说,还当过英文、国文教员。1925年6月入党后,又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红色教授学院学习马列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学,尤其是经济学作过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回国后,主要从事党的宣传教育工作,在1931年2月至1932年12月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他在上海撰写发表了大量文章。在这些文章中,虽然有不少承袭共产国际和中共党内“左”倾教条主义、关门主义的东西,但应当指出确有一些表现他个人独立思考的理论成果。这些理论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对中国社会经济和中国革命性质、任务的正确认识,对“左”倾错误的批评与觉察。而这也正是他能较早从“左”倾错误中走出来,转到正确路线一边的重要原因之一。

1933年1月中旬,张闻天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到达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此后到中央红军撤离瑞金进行长征前的一年多里,他担任过中共中央局常委、宣传部长、中央党报编辑委员会书记、中革军委委员,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等职务。期间,他虽然不能不“从战争学习战争”,学习政权建设、经济管理和群众工作,但依然在党的宣传教育和理论研究工作上投入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保持了“喜欢学习,喜欢研究问题,平易近人,不大愿意做整人的事”的秉性。这又是使他能同“左”倾错误决裂,而同正确路线的代表人物毛泽东走到一起的重要原因之一。

说到这里,我们不能不考察一下张闻天到底整过人没有,具体地说就是整过毛泽东没有。毋庸讳言,在上海和在中央苏区最初的一段日子里,张闻天曾因自觉不自觉地执行“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对毛泽东有过不正确的批评压制。如在批评中央苏区“诱敌深入”的反“围剿”战略方针是“浓厚的等待主义”,中央苏区领导人“右倾”、“狭隘经验论”的时候,显然矛头就是指向毛泽东。在1932年10月6日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张闻天附和博古对毛泽东的批评,提出“泽东可调回后方做苏维埃的工作”。来到中央苏区后,张闻天又积极参与了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客观上也起了打击毛泽东的作用。但所有这些都与张毛之间的个人恩怨无关,绝非张闻天刻意整人。其理由是:

第一,张闻天与毛泽东虽然早在1919年12月和次年1月先后加

入中国少年学会,但他们的头次见面却迟到1933年初。这之前,两人并不相识,更未共事,既无正面冲突,也未打过笔墨官司,谈不上有何成见恩怨。

第二,诚如张闻天所言,他当时反对“罗明路线”时,主观上并未想到这是为了要反对毛泽东同志。当时我觉得毛泽东同志已经不在其位,再去反已经没有什么意义。这从我写的文章中也可看出。”我一进中央苏区,不重视毛同志是事实。但并无特别仇视或有意要打击他的心理,也是事实。”

第三,更重要的是,当实践证明自己错了的时候,张闻天勇于承认错误,服膺真理和代表真理的同志,站到正确路线一边。在不断的实际接触,尤其是在一些原则问题上与博古们交锋之后,张闻天扭转了对毛泽东的看法,主动亲近他,尊重并接受他对政府工作、经济工作、查田运动、福建事变,以及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战略策略的意见。长征前夕,张闻天更把毛泽东视同知己,向他倾吐了对博古的“左”的一套的不满,表达了与“左”倾错误分道扬镳的意向。唯其如此,才有长征路上的“中央队三人团”,才有遵义会议。

这里有必要简要说明一下张闻天与博古的关系。两人同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又在上海中共临时中央共事过。进入中央苏区之前,两人在政治上,在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方面,并无二致。到中央苏区后,由于张闻天在中国革命的策略、政策和军事问题上的观点有所转变,两人逐渐产生分歧。突出表现在对“共同抗日三原则”的理解,对十九路军发动的福建事变的策应,对广昌战役失败的评价等重大问题上,张闻天越来越激烈尖锐地批评博古奉行的“左”倾错误路线。而博古不但不接受张的正确意见,反而寻机排斥打击张。事情到了这一步,张闻天只能



张闻天

义无反顾,与博古即与“左”倾错误路线代表决裂。

以上史实,无论从何种角度看,都充分反映了张闻天的书生本色——独立思考,认真做事,不随人俯仰,不随波逐流,不争名争利,不文过饰非,坦荡为人,唯理是从。

二

1931年至1934年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使得土地革命战争受到了极端严重的损失,得到了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不能战胜敌人反而丧失了根据地削弱了红军的

结果”。

1935年1月15日—17日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在以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为代表的多数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以及红军高级将领的共同努力下,顺利召开并取得成功的。张闻天在其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被会议“比较一致的意见”推举为取代博古、担任党的总书记的人。由于张闻天“非常谦虚、再三推辞”,此事“拖了20来天,不能再拖了,中央常委作出决定,闻天同志这才挑起这副担子。张闻天当时当总书记,是得到大家拥护的”。至此,张闻天在政治舞台上的角色,由书生变为领导全党的领袖。

当然,张闻天的这一角色转换并非一朝一夕间的突变,而是日积月累的渐变。促成这一渐变的,有外因,亦有内因。

先说外因,或曰客观情势。博古等人在中央苏区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给党内关系、统战工作、苏维埃政府工作、苏区经济活动,尤其是军事斗争和红军建设,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和恶果,致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只剩下放弃经略五六年的中央苏区突围转移一条路。这已经引起

党和红军中许多人的不满。大搬家式的长途行军,人马疲于奔命,作战部队形同保姆顾此失彼。更恼人的是如此奔突,竟然不知道要到哪里才是个了结。1934年11月下旬的湘江之战,使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为3万余人。党和红军中对“左”倾错误领导的怀疑、不满情绪达于顶点,可谓天怒人怨。战前博古、李德拒绝了毛泽东和彭德怀关于积极寻找战机歼敌,变被动为主动的正确建议,事后面对惨败,他们又一筹莫展,只有唉声叹气和诿过于人。

由此红军指战员们开始思考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屡屡失利,眼下更是濒临绝境的原因。渐渐意识到这是排斥了毛泽东代表的正确路线,执行了“左”倾错误路线所致。要求改变党中央和红军领导的呼声也就日益高涨。

在湘、桂、黔交界地行军途中,张闻天和毛泽东、王稼祥一起同博古、李德一路争论,除了批评军事路线和军事指挥错误外,特别着重于当时亟待解决的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问题。通道会议上,他们否定了李德、博古落脚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盘算,提出转向敌人薄弱的贵州进军,建立川黔边根据地的建议。这个建议得到了“最高三人团”成员之一的周恩来的支持,并为与会的多数人赞成而通过。黎平会议继续就红军何处去这个战略方针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会议作出的《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肯定并巩固了通道会议的成果,还决定到遵义地区后开会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1935年元旦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猴场会议),再次批评了博古、李德不过乌江而要回头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在以后的行军路上,干脆停止了李德对红军的指挥。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通过会议形式变换党中央和红军领导的问题,也就如同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在遵义会议上,博古所作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被会议认为“基本上是不正确的”。他对军事领导上的严重错误“应负主要的责任”。鉴于博古既不能承认错误,又不能接受正确的批评,且实践证明他不配领导全党,他的下台也就无可避免。

再说内因,即张闻天的自身条件和表现。前面说过,张闻天有深厚的马列主义功底和历史文

化素养,有很强的党性,加上他注重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特别是“敢于独立思考,敢于独立地系统提出和坚持自己的政治见解和理论见解,这是他的品质高尚之处”。他还有不争名夺利、不文过饰非、平易近人、善于团结同志的美德。这些长处使他具有成为党的领袖的基本素质。

张闻天虽然也宣传、贯彻、执行过“左”倾错误路线,但他在上海时就曾对“左”倾有过批评与觉察。进入中央苏区后,又较早地从“左”倾营垒中分化出来。他写文章或在会上多次公开同博古等人的“左”倾错误作斗争,而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1934年9月29日的《红色中华》报发表的他的署名文章——《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就是一篇批评和否定“左”倾军事战略方针的檄文,一篇从战略上深刻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教训的宏论。因而它被誉为“关于红军战略的社论”,当时红军部队“进行公开动员公开准备总的根据”,被红军总政治部规定为红军转移进行思想准备的一份重要文件。

长征路上,张闻天和王稼祥一道,最早接受了毛泽东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的分析。而早在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不久,张闻天就对“左”倾军事路线、军事指挥产生了怀疑:“这样打下去,我们能有胜利的前途吗?”广昌战役后,他又提出“不该同敌人死拼”,结果同博古闹翻。这表明张闻天赞同毛泽东的分析并非偶然,或者出于一时的利益权衡。

黎平会议后,在红军西进路上,李德和博古仍然不甘心放弃他们的错误战略方针。张闻天对此深为焦虑,开始考虑变换军事领导问题。1934年12月20日,在黄平的一片橘林里,张闻天与王稼祥边休息边议论眼前形势。谈到红军此行尚无确定的最后目标时,张说这仗这样打看起来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张闻天这番话,第一次在中共高层挑明了变换军事领导的问题,非同小可。王稼祥自然由衷赞同,当天晚上就将张的想法打电话告诉彭德怀,然后又告诉毛泽东。这消息在刘伯承等几位将领中一传,大家都赞成要开个会,让毛泽东出来指挥。后来的事实证明,张闻天的这个提议符合党心军心,它为遵义会议恢复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并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核心,起

了打招呼、定调子的作用。

遵义会议的一个主要目的是：“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在博古作主报告和周恩来作副报告之后，张闻天首先起来作反对中央领导单纯防御军事路线的“反报告”。“反报告”提纲出自“中央队三人团”集体，而由党内第二把手张闻天讲出来，分量之重，作用之强、影响之深，自非他人可比。因此，“反报告”为遵义会议彻底否定单纯防御军事路线定下了基调，启动了变换军事领导的程序。与此同时，也就完成了党内对于选择张闻天为新的最高领导人的审查。

当时有可能接替博古担任新的党中央总书记的，除了张闻天以外，还有毛泽东、周恩来。为什么最终没有选择毛、周呢？依据种种史料史实来看，大抵原因如下：

毛泽东和朱德一起创建红军、中央苏区有大功，而且是正确军事路线的主要制定者、坚持者，在红军中有很高的声望。但他直到由遵义会议选为政治局常委前，从未进入党中央领导核心。加上他在中央苏区肃反问题上犯了错误，个性倔强（有时甚至粗暴），不注意团结身边（尤其是领导层）同志，就很难使大家接受他。况且他此前的兴趣更多地集中在战争上，似无意于此道。遵义会议后，他感叹地对妻子贺子珍说：“办什么事都要有个大多数啊！”就表明他对过去忽视团结大多数的极端重要性的悔悟。此后果然，他更加沉着、练达，思想更加缜密、周到，特别是更善于团结人了”。

周恩来当时在党内的地位和张闻天大致相当，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又是中革军委副主席，还是长征前夕至遵义会议结束前的最高三人团成员之一。他的品德、才干、经验、胆识均早为党内所公认。但是，遵义会议既然否定了此前错误的军事路线、军事指挥，明确了军事领导上严重错误的责任，周恩来就免不了和李德、博古一起承担过错（尽管不负主要责任）。李、博下台，而再让周接替博古上台，也就不合时宜。

三

1935年2月5日，在云、贵、川交界的“鸡鸣三省”之地，张闻天遵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正式取代博古，就任党的总书记。从此，他兢兢业业，尽心尽责，演好这个角色，为党、为中国革命建立了新的功勋。仅在长征途中，他就做了下述几项重要工作。

一是重新建立新的中央领导与中央苏区间的组织联系。

张闻天接任总书记的前一天，中央纵队接获留守中央苏区的项英发给党中央和军委的急电。项英批评后者“自出动以来无指示，无回电，也不对全国布置总方针”；提出“目前行动方针必须确定”，究竟采取什么方针“应早定”。2月5日又以中央分局名义致电中央，提出关于中央苏区“行动方针”的“两个意见”和“对各个苏区的领导”问题，“请立复”。要求中央赶快决策、进行领导的心情之急迫，可想而知。然而，中央却因总书记未变换，无从确定方针以复。2月5日当晚，张闻天即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中央苏区问题，并立即复电项英转中央分局，对他们的两通来电明确答复。复电除要求中央分局立即改变目前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应外，还决定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苏区分会，以项英为主席。这就改变了过去无指示、无领导的状况，并及时传送了遵义会议主要精神。

二是积极组织、领导对遵义会议精神的宣传、贯彻与落实，实现战略转变。

张闻天受命起草遵义会议决议后，即边行军边思谋。他以自己的“反报告”为基础，吸收会上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等同志的发言意见，并根据会后的情况变化和新的决策，写成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这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文献，系统批判了博古、李德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论述了毛泽东为代表的符合国内革命战争规律的战略战术原则。

为使遵义会议决议精神尽快化作红军的实际行动，张闻天在扎西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随即将决议文本印发各支部讨论。在印发决议全文之前，张闻天还赶写出《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

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名义先行发布,以应尽快传达之需。1935年2月10日,他亲自在军委纵队于扎西镇召开的营、科长以上干部会上,作《五次反“围剿”的总结和目前任务》的传达报告。他还专门向做地方工作的同志传达了遵义会议情况,指出要改变地方工作政策,比如打土豪时再不要扫地出门,再不要打烂三缸(米缸、菜缸、水缸)了。随后,他还多次利用各种会议传达遵义会议精神,为全党全军尽早知悉和掌握会议精神作出了贡献。

与此同时,张闻天几度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回兵”、“缩编”决策,对红二、六军团战略方针和军事领导作出决定。所有这些无不表明身为总书记的张闻天,已在及时、有效地担当起了领导全党、全军实现遵义会议决议所规定的伟大战略转变的使命。

三是支持毛泽东的军事指挥,确立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后第二天,常委进行分工,决定“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从此毛泽东重回军队领导岗位,参与对红军的军事指挥。在这件事上,张闻天是积极支持的。1935年3月初,红军二进遵义城。张闻天有感于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原则和军事指挥才能的卓异超群,遂提议成立一个前敌司令部,请毛泽东到前方担任前敌总指挥。3月4日,中革军委一纸命令委托朱德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为前敌政治委员(亦即习惯上所称前敌总指挥)。3月11日,毛泽东因攻打打鼓新场的一场争论,险些去职后,向张闻天提议: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成员为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很赞成”毛的提议,第二天便在苟坝附近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上,将成立“三人团”的提议交付讨论,获准实行。至此,遵义会议变换领导的重要决策遂告完成,毛泽东进入了当时最重要的军事领导机构。

从1935年3月中旬起,毛泽东指挥红军三渡、四渡赤水,南渡乌江,于5月初巧渡金沙江,跳出了数十万敌军的包围圈,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实现了遵义会议北上的战略决策。然而,红军中不少指挥员对毛泽东的穿插迂回、大踏步行军作战的战法,仍然有所责怨。

为统一思想,张闻天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于5月12日在会理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张闻天按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商定的报告大纲作了报告;会议结束前,又作了结论。会议严厉批评了反对机动作战、怀疑军事领导的右倾情绪,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并且决定中央红军继续北进,越过天渡河,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从此,毛泽东对军队的领导地位得到完全巩固。

四是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一道,同张国焘分裂主义进行了正确、坚决的斗争。

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在夹金山、达维之间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实现了遵义会议决定的北上过长江、直接与红四方面军配合作战的战略方针。一、四方面军在懋功地区大会师后,战略方针问题又尖锐地摆在中央面前。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确定的方针是北进到川西北建立根据地,再占领川陕甘;张国焘却要西进西康、青海、新疆,到“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区域发展,或是向南,“直取成都,出长江,打到武汉去”。对张国焘的错误方针,张闻天先是与其他中央领导人一起,通过电讯联系同张磋商,交换意见。接着写了《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一文,指出按张国焘的方针行事,“对于红军极不利”(因懋功地区地形上不利于大部队作战,物质给养非常困难,敌人倒正想把红军“封锁”在这一地区,进而压迫至西康与青海草原地带);而“川陕甘三省是一块很广大的地区”,便于红军机动作战,建立根据地。文章还批评了“避免战争”的“逃跑主义倾向”,指出应同这种倾向作坚决斗争。这篇文章为两河口中央政治局会议商决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

1935年6月26日,张闻天主持两河口会议并发言,再次肯定北上的战略方针“是前进的,唯一正确的”,同时坚决否定“西进”的错误方针。他还特别强调在组织上“应统一”。受会议委托张闻天写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申明了北上方针及为实现此方针的措施。

两河口会议上,张国焘表面赞成北上方针,同意打松潘,但行动上却拖延迟滞,贻误战机。并以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加

强红军总司令部等问题为由,向中央讨价还价。为顾全团结北上的大局,中央一面对张国焘的错误提出批评,一面委曲求全,尽量照顾张国焘在“组织问题”上的要求。张闻天甚至主动向毛泽东表示,自愿让出自己担任的党中央总书记职位,来换取张国焘共同北上。

在接下来的芦花会议上,张国焘担任了军委总政治委员。他这才勉强执行军委为补救延误战机而发布的松潘战役第二步计划,率部北上向毛儿盖地区集中。可是,到毛儿盖后,又一次动摇,进行一系列分裂活动。而此时敌胡宗南部已趁机在松潘附近构筑成堡垒线,各路敌军经调集、布防,形成了围困与消灭红军于雪山草地的态势。面对如此险恶处境,张闻天同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从全局出发,为促进张国焘转变和争取四方面军,采取一系列特殊方针,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张闻天主持并为之起草决议的沙窝中央政治局会议,就是此中范例。

沙窝会议后,红一、四方面军分左、右两路继续北上。张闻天带领中共中央机关随毛泽东、周恩来、徐向前率领的右路军行动。右路军按计划到达班佑、巴西地区后,张国焘却不顾朱德的反对,在阿坝附近停止向右路军靠拢,并电令中央和右路军南下。在对张国焘一再劝告无效后,张闻天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举行中央常委紧急会议,果断决定中央和四方面军暂时分离,率右路军中的红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速出甘南。随后,立即开始了秘密脱险行动。张闻天亲自向李维汉布置任务,并交待他绝对保密。1935年9月10日凌晨,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率部离开危险区。张闻天策马前后照应,亲自向干部讲明当时险境,又亲自与彭德怀一起布置三军团部队在山上警戒。当日到阿西,张闻天发布中共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重申“南下是绝路”,“只有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是唯一正确的”;号召左路军广大指战员“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去”。

从上述史实可以看到,张闻天在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危急关头处变不惊,临危不惧,从容以对,同毛泽东、彭德怀等中央和军队的领导同志团结一致,紧密配合,成功地化解了危机,使党和红军又一次摆脱生死攸关的险境,充分表明了

他是个称职的总书记。

在随后主持的俄界中央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上,张闻天作总结发言,深刻阐明了同张国焘斗争的性质,预言了张国焘“组织第二党”的结局,并主张“只要还有一线可能,我们还要争取他”。可惜张国焘一意孤行,果然被张闻天不幸言中。

五是中央红军结束长征,落脚陕北,开创新局面,提出了重要意见。

1935年9月下旬,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等人在甘南小镇哈达铺,看到当年七八月间的天津《大公报》,得悉陕北仍有红军、游击队,大喜过望。张闻天仔细研究了报上的相关材料后,写下一篇题为《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的读报笔记。他敏锐地觉察到红二十六军力量相当强大,控制了大块陕北苏区;红二十五军也取得许多伟大胜利,直逼西安;甘南东部,尤其在毗连陕西、宁夏边区的庆阳一带,也有红军游击队活动。由此得出结论:“红军与赤色游击队在陕甘两省内正在普遍的发展着”,“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之一部,已经开始进入了甘南的重要地区”。9月27日,张闻天在榜罗镇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到陕北去,在陕北巩固、扩大革命根据地,使之成为中国革命新的大本营。这样,困扰红军多时的落脚何处的问题,终于得到妥善解决。在中央红军结束长征,落脚陕北的决策过程中,张闻天提出的上述意见,以及他在10月18日铁边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发言,无疑对决策有重要意义。

此后,从中央红军落脚陕北,到红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的一年中,作为党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在领导全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由国内革命战争到全民族抗日战争的转变;不断做争取张国焘的工作促进内部团结,为三大红军胜利会师创造条件等重大事件中,进一步展现出一位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战略眼光和政治品德,以及娴熟的斗争技巧、踏实的工作作风、忘我的革命精神。与此同时,他“不争权”、讲民主、勇于任事、仁至义尽、虚怀若谷、淡泊宁静的领导作风与生活作风,也使人们在仰慕他的总书记角色的同时,想到他的书生本色。

(责任编辑 吴 思)

回顾县史悼李宜

● 任知时

李宜是河南省巩县的一位人民教师,已逝世多年,最近几位老同学相约要为李宜(克中)同志出版《诗集》,约我写篇纪念文章。我认为纪念李宜要从他一生遭遇中吸取些历史教训,才有实际意义。

李宜是我在高中一年级的老同学,因为相处时间很短暂,早已记不起他那少年英俊的模样。倒是他负伤后,尤其是被错划右派以后,那面容憔悴、削瘦嶙峋,拄一根长棍,瘸一条伤腿的悲惨形象,还历历在目。

李宜是1948年秋,开封二次解放随校南下逃亡的学生。他在流浪京、沪期间,目睹国民党腐败无能,祸国殃民,民不聊生,已是穷途末路。活生生的社会现实教育了他,只有共产党才是民族的希望;只有跟着共产党走,国家和个人才有光明前途。于是,他毅然参加了人民解放军,旋即转战江南。不幸在解放海南岛战役中,腿部中弹负了重伤,成为二等荣誉(残疾)军人。但他身残志不残,伤愈后,拄着单拐回到巩县,走上人民教师的岗位。

1957年末,他积极响应共产党的号召,诚心诚意帮助党整风。当他见到报上登有“右派”攻击共产党在镇反运动中杀人过多的言论时,就写了反驳的大字报。不料却遭到“左派”积极分子的曲解,把他文章掐头去尾、无限上纲,反而把他错划为“右派”,受到开除公职,回乡监督劳动的处分,把他打入阶级敌人的行列。虽然当时有“右派属敌我矛盾,应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指示,在那宁左勿右、阶级斗争步步升级的年代,是贯彻不到基层的。于是李宜在那政治运动频繁年代,成为村里逢运动必“挨斗”、“绰号为‘运动员’的‘右派’分子。在那长达21年的岁月中,一直抬不起头来。充当阶级敌人,承受群众专

政”那动辄得咎,备受人身凌辱的个中滋味,真是一言难尽。同时在经济上也陷入绝境。光荣负伤使他丧失体力劳动的能力,错划“右派”又使他丧失脑力劳动的机会。仅凭他每半年十几元钱的荣军补助费,实难养活他老少五口之家。

1958年,巩县党委号召干部教师们“交白心(错误思想)换红心(与党一致思想)”,抓住把柄,又划“交心右派”和“漏网右派”221人。巩县共划正式在册的右派890人;若加上在巩县划右,不统计在巩县的省、市营厂矿右派99人;加上因右派问题而戴上其他帽子的反革命分子、坏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流氓分子、不良分子等150人;再加上不应划右而转来的“学生右派”14人,全县遭右派苦难的共有1153人。

从“反右”及“右派改正”历史档案中查得:“右派改正”初期统计全国“右派”有54万人,占全国当时干部总数的5.7%(最后统计为55万人);河南省最多,有7万多人,占全省当时干部总数的15%;省内永城县划右最多,有2423人,占该县当时职工(划右已超出干部教师范围)总数的33%;巩县教师右派496人,占当时教师总数的30.2%,干部总数未查到,估算也应在30%左右;河南省超千名右派的县只有商丘地区四个;巩县划右之多,在全国也应在前列。

1979年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精神,以反右时的原始档案为基础,按原中央划右标准重新衡量,内查外调,最后巩县右派全部得到改正。李宜改正后,又回到教师岗位,积极地发挥他的光和热。

在“右派改正”的《总结报告》中,有几段话值得我们吸取教训。“当时确有一小撮右派分子乘党整风之机,向党进攻,企图推翻无产阶级专

政,反击是必要的。但是不恰当的估计阶级斗争形势,加上思想上的片面性和工作方法上的错误,产生了扩大化。从我县复审改正实践证明,绝大多数属于错划的……”“因为当时反右斗争来势迅猛,工作比较粗糙,有些材料未经核实。加之有‘宁左勿右’的思想作祟,既不允许本人申辩,又不允许了解情况的人发表不同意见。本人申辩是态度不好,罪上加罪;旁人发表不同意见是包庇同情右派,轻则受处分,重者也被划为右派。因此在复查中发现材料是不真实的”。

敢于说“真话”又能知无不言的“右派”们被打倒后,尤其是“言者有罪”后,共产党在执政中堵塞了言路,也失去了患难与共的朋友,重大决策时也失去了民主化、科学化的基础。于是狂热的、非理性的“大跃进”开始了。

首先是大办粮食。当时“左派”积极分子竟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口号,刊登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位置上。在这强大的政治压力下,河南省遂平县出现了小麦亩产7320斤的“好成绩”,获得“卫星上天”的赞誉。巩县在当时的产量会议上都有虚报。早报的亩产有好几百斤(当时绝大多数岭地亩产仅一百多斤),后报的有千斤以上,并依此进行了“高征购”。全国出现了“浮夸风”,造成全国粮食问题已经解决了的假象。紧跟着出现了饿死人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

其次是大办钢铁。也是用“务虚不务实”的政治手段来操作。在一无技术、二无资金、三无资源情况下,采用小(小土炉)、土(土法上马)、群(群众运动)的方法盲目上马。开封专区东三县(开封、兰考、东明)在无资源又无技术人员情况下,利用公社化“大兵团”作战的优势,由三个县委副书记挂帅,调配三县43900个青壮劳动力,浩浩荡荡开到巩县矿山上去大办钢铁了。巩县更不甘落后,竟放弃占公社大食堂半年粮的红薯不去收储,抢先赶上“大跃进”的高潮。导致红薯霉烂在地里、水囤子里,形成1959年秋巩县丰产没有丰收的事故。巩县共动员了12万人的“大兵团”(注:当时全县人口434540人),吃住在矿山上,挖矿石、砌小高炉、砍树木、烧木炭(代替焦炭),仅巩县就建5636个小土炉(投入使用的2183座)。炼出的明明不是铁,是未烧透

的矿石渣,把它称为“烧结铁”。创出日产4万吨的高产纪录。向上级报喜后获“卫星上天”的殊荣。

在那疯狂的年代,矿山上白天处处冒青烟,夜间满山是火光,那热气腾腾的景象令人不寒而栗。巩县境内有那十几万人的“大兵团”,还有几千个小土炉在不停的烧炼,不出几个月就把巩县能烧木炭的树木砍个净光。那时公社化后,树权归集体,谁也无权干涉。直到改革开放后“大包干”,树权有主了,植被才恢复起来。产权明晰不明晰也是财产增值的关键。倒是巩县第一炼钢厂,从开专调来一个懂行的“右派”,按科学规范建一个8立方米高炉和六个3立方米高炉(只使用两个);陶瓷厂(制碗)的内行右派陈迹解决了耐火砖问题;巩县钢铁办公室留一个学地质的“右派”刘传三(改革开放后任人大副主任)参加策划;又调拨一些正规焦炭。有了科技基础,在党委领导下才出现日产灰生铁1-2吨的成绩。生产半月后因焦炭不继就停下来了。无怪乎文革中的造反派当权时,讥讽说知识分子是“臭豆腐”,政治上臭,用起来香。“大跃进”运动两大重要内容一个粮食,一个钢铁。不依靠科学,不依靠人才,只依靠政治挂帅,只依靠群众运动,用人海战术,像打仗一样搞建设,终以失败而告终。

真正使人民生活走向灾难的根本原因,还不不仅仅是这些“浮夸风”、“高征购”、“瞎指挥”,关键更在于“共产风”。在于一大二公人民公社大办食堂后,那“干活不要工钱、吃饭不要饭钱”平均主义大锅饭分配制度。它使劳动者不能直接得到自己的劳动成果。成果通过公社统收统支,第二次分配转化为“他”人所得,严重挫伤了劳动积极性。实践证明,该制度实行三年,减产三年,人民群众饿肚子三年。这才是造成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主要原因。按巩县水文记载,这三年两年偏丰,一年偏歉,根本造不成灾害,纯属“人祸”。1958年8月巩县实现食堂化后,人民生活逐年下降,营养不良的浮肿病逐年增加,人们体质严重下降,也造成育龄妇女不孕和非正常死亡人口增加,人口出现了负增长。按当时出生率、死亡率科学计算可达三万人。永城县划右时最左,后来该县非正常死亡达十几万人,牲畜减少60%。全国在那后三年闹浮肿病、饿死人,非正

常死亡人口达数千万人。“左倾教条主义”同样能使千百万人头落地”。不过这是在“革命”的名义下形成的失误,以“交学费”的形式开脱了。时过境迁已近半个世纪了,应该正确吸取教训,告诉后人要力避“左倾”路线。经过“低标准”、“瓜菜代”、“淀粉馍”(注:用植物粗纤维碱化后做的馍)、“百日休养”等一系列措施,这个分配制度实在执行不下去了,终于在1961年冬解散了大食堂。1962年实行“留够自留地”、“借地救灾”(注:从集体土地中拿出1/10的土地借给各户自耕自收)、允许个人开“小片荒”等措施。在土地家庭承包权上开1/10的小口子,一举消灭了“浮肿病”。

李宜在这非常时期又遭“中年丧妻”的不幸。在1960年“瓜菜代”时期,公社社员每日三餐只有七两粮食,又无副食品的情况下,在大食堂打回来的“稀粥菜汤”,可让他贤慧的妻子作了大难。她上要奉养老婆母,下要抚养六岁、二岁的幼子,李宜又是家庭的主要成员还需要稍微照顾一点,就是苦了她自己。时间长了她的“浮肿病”越来越严重,终于弃世而去。普通人家去世的多是老、弱、病、残,她却是正当年轻少壮的年华。诗人李宜终生内疚。14年后的1974年元月16日除夕雪夜,作一首《伤怀》小诗:

面前怯伤慈母心,背后偷泣结发情。

除夕饺子挥泪捏,多少辛酸不成形。

没有切肤之痛,很难作出如此催人泪下,感人肺腑的诗句。

被人民群众呼为救命田的“借地”,在巩县只实行了1962年秋季一个季度就被收回了。这时的分配制度调整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按人、劳比例参加

分配。一般生产队多是(人头)五、(劳力)五。但还提倡人头分的多、劳力分配的少,说是含共产主义成分高。所以也有少部分生产队执行人六劳四的,个别副业多的队也有人八劳二的。这意味着劳动者的成果,至少有一半以上被“人头”分走。实践证明,这种分配制度只解决了“出勤”的积极性。因为人头粮是固定的,分配多少全靠工分多少。于是男女老少都争抢挣工分。只要记工本上记一个劳动日,能参加分配,就达到目的了。至于劳动质量和效能,就不是人们关心的事了。制度决定人的行为,有人想关心也没有用。于是出现了出勤不出力,磨洋工现象十分普遍。“八点敲钟九点到,磨磨蹭蹭盼下工”,一天干不了半天活。这就是落后的生产力难以适应那“先进的生产关系”。“文革”中的造反派认为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肯定是阶级敌人在破坏。于是在推广“学大寨”运动中,把政治表现也作为评工计分的内容,提出“大批促大干”的政治口号。落实到基层变成拉出已斗倒十几年的“老敌人”反复批斗,李宜也在其中。不解决分配上的问题,不与劳动者的利益挂钩,根本解决不了劳动人民的积极性。于是形成越穷越斗、越斗越穷、走上了“穷过渡”的怪圈。“穷则思变”,才引发了出名的小岗村人民冒死创造“大包干”制度。“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实事求是



1957年国庆游行的场面

的新一代领导人把它总结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劳动者的积极性，人民才走向富裕的道路。马克思曾说过：“物质利益是人们从事一切社会活动的基本动因”；列宁批评左派幼稚病，执行新经济政策是有深刻道理的。走了二十几年的冤枉路，又回到原来的基点上，交的“学费”也真够惨重了！

在那按工分吃饭的阶段，李宜家庭只有一个老人，二个幼子、一个残疾人，无论如何挣不来工分。当时有适当照顾的政策，当然轮不到他这“阶级敌人”头上，所分粮食实在糊不了口。为了生存，他拽住六七岁大儿子，抱住二三岁的小儿子，扒上南下的“荒车”（注：当时灾民多，坐空货车、拉煤火车可以不买票）到驻马店信阳地区乞讨。该地区原饿死人较多，灾后重建，政策比较宽松，人民生活相对宽余，便于乞讨。李宜还有“书生”风格，认为乞讨是不劳而食。于是买一把推剪走乡串户，见到头发长的就去替他理发，理后不收费，只要换回几个馍就行。老百姓看他前拽后拉、又理发，也乐于多施舍这位奇特的乞丐。他把好馍留给母亲，次的给儿子吃，最差的自己吃。积攒三五天以后，把小儿子交给大儿子看管，留在候车室内或破庙中，嘱咐千万不能跟别人走。赶快扒上“荒车”回到巩县给老娘送干粮。进门先担一缸水，立即扒车回去找儿子。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就这样断断续续熬到儿子勉强能挣工分，才停止这特困生活。经济上的困难，政治上的歧视，也影响到他两个儿子，小学没有上完整。母亲去世后，形成了一家三口人皆为男性的单性家庭。哪个姑娘愿到他家受这种“洋罪”？老大30多岁，老二29岁都还没有结婚（当时农村青年20岁左右就结婚）。一直到1984年，有老教师提前退休可以安排一个子女接班当工人的政策。李宜抓紧时间赶快离休。小儿子当上了工人，1988年才娶到媳妇成家生子；大儿子又到九中当了清洁工，也娶到媳妇。这才结束他家30年人口只减不增的状况。李宜在改革开放后，近60岁才终止坎坷，安度晚年。最终又逝于

癌症，享年72岁。

过去左派们，以“革命”的名义，好大喜功、急于建成共产主义，不惜剥夺农民的土地、生产工具、甚至房产“归大堆”。违背科学规律，造成人为的“自然灾害”而不自鉴；如今又有干部以“发展”的名义，好大喜功，急于建成小康社会，不惜侵占市民、农民的切身利益“大拆大占”，违背科学发展观而不自觉。其思想根源都是企图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左”倾急性病。小平同志说的对：“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会葬送社会主义”。

（责任编辑 吴 思）

书屋 2004 年第 12 期目录

学界新论	光荣或梦想 郑和下西洋祭	周 宁
说长论短	姓名的困惑 钱基博为人取名及其他	毛 翰 钱之俊
灯下随笔	明亡三百六十年祭 也谈 甲申三百年祭》	狄 马 陈椿年
流年碎影	随心所欲	王开林
其人其事	雍正的智慧 从丰泽园到御花园	牧 石 小 朋
史海钩沉	胡政之与 1916~1920 年的《大公报》 胡适为何屈就东方图书馆馆长	付 阳 王 瑾 范 泓
经典回眸	《长恨歌》，何恨？	朱迪光
艺术长廊	物哀叙事 哥特式教堂之美	林子明 刘金祥
编读往来	谁人为解绿丝绦？ ——谈徐继 及《瀛寰志略》 苏格拉底的“鸡”	铁建晓 张家俊
书屋品茗	心灵史的展示 ——读《从“女兵”到教授——谢冰莹传》	吕汉东 张 翔
专栏集萃	动物笔记（七）	
《书屋》2004 年总目录		
来稿摘登	不俗的丁玲 说“禁忌”	石潇纯 陈 荟
封 面	雪窗客话图（局部·缩小）	（宋）夏 圭
封 二	金牧师语录	黄永厚 画
封 三	《华君武漫画册页》赘语	华君武 画 韩 羽 文
封 底	真趣	李 立 篆刻）

邮发代号 42-150 月刊 每月 6 日出版 定价 5.00 元
地 址：长沙市韶山北路 643 号《书屋》杂志社 邮编 410007
电 话 0731-5791300 5790951 传真 0731-5790197
E-mail: nlh5314@263.net 或 nlh5314@public.cs.hn.cn

我的母亲刘清扬

● 刘方清



1973年秋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中央专案组通知,让我去探视在监内的母亲。自1968年2月母亲在“文革”期间被抓走,我们已经六年没有见面了。母亲出了什么事?病了?还是……?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赶到专案组指定的地点(复兴医院东侧的一个小楼),好不容易才等到探视时间。一辆小车推着一个白发苍苍、双腿瘫软、面庞浮肿、目光呆滞的老人。啊,这就是多年杳无音信的母亲?六年的铁窗生活,竟把往日精神抖擞、步履刚健的一个人变成了这个样子!我们互相凝视了片刻,一向十分健谈的母亲这时竟说不出话来。还是我强忍悲痛,打破了这尴尬的沉默,询问她的健康并报告家里的情况。不料母亲对这一切反应漠然,却冲破“禁律”(探监是不许谈政治的),迫不及待地探问周总理的情况和邓小平同志的“出山”。因为从审案人的问话中,她敏锐地感到有人还在处心积虑地整总理,对此她忧心忡忡;而对于邓小平同志的复出,则表现异常兴奋,充满希望。最后她严肃又郑重地对我说:“方清,你记住,我的一生是忠于革命、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祖国的。”这句话她反复说了好几遍,看来这话在她心里已埋藏多年了。她多么想向党,向自己为之奋斗一生的祖国倾述自己的衷肠啊!

甲午风云中诞生 战斗烽火里成长

1894年2月15日(农历正月初九),母亲刘清扬出生于天津一个回族小家庭。当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天津,烧杀劫掠我平民百姓的时候,她的家也濒于破产。1905年冬,她将满12岁时,进入天津严氏(严范孙氏)女学读书,受到老师的爱国主义启蒙教育。

1906

年,天津爱国人民为了建立海军以巩固国防,发起

一场群众性的爱国储金运动。在一次募捐大会上,讲演人的慷慨陈词,群众的踊跃捐献,激发了少年刘清扬的爱国热忱。她当场把身上的零花钱都捐了出来,还觉得没有尽到自己的爱国心力,又毅然摘下自己心爱的金戒指捐给大会。“十三岁的女学生捐出一个金戒指”的故事从此宣扬开来,传为佳话。会后,她还和同学们挨门逐户进行劝储,并动员家里人把部分早餐费省下来支援爱国储金运动。这次的爱国行动,揭开了她革命生涯的序幕。

有一天,刘清扬的大哥刘孟扬拿着一张身穿和服、手持短刀、英姿飒爽的年轻女子的照片给她看,并对她说,这就是秋瑾烈士,一位留日学生。她是因参加推翻满清政府的革命而死的,是值得我们大家尊敬的巾帼英雄。刘孟扬向她介绍了秋瑾的生平和革命事迹,使她很受感动。她暗下决心,要做一个秋瑾式的爱国女英雄。后来刘清扬回忆说:“秋瑾烈士实是给我指导的第一人。”

1911年辛亥革命时,刘清扬就读于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简称“女师”),并参加了中国同盟会在天津的秘密组织——天津共和会。共和会的任务就是发动滦州起义,然后进攻北京。共和会会员们向群众进行革命宣传,油印反清宣传品,探听军情,募集军费,积极参与策动滦州起义。女师地理教员白雅雨先生是共和会会长,担任起义参谋长。白雅雨在赴滦州策划起义之前,

交给刘清扬两项任务,一是为白雅雨等十人去滦州筹措经费;二是起义成功、截夺军火后,由女同学掩护把军火秘密运往北京,准备在京发动起义。刘清扬积极承担并及时完成了第一项任务。当时她的哥哥刘孟扬等在天津报界颇有名气,同戏剧界联系密切。他们每年都要举办冬赈义演。刘清扬就请哥哥从冬赈义演的捐款中拨出一部分钱,赞助了白雅雨等人。但起义因叛徒告密而惨遭镇压,白雅雨等义士也壮烈牺牲。

五四大潮露头角 津门女界一英豪

1919年,北京学生点燃了“五四”运动的革命火炬,天津学生闻风而动,立即组织起来。刘清扬和直隶女师的同学邓颖超、郭隆真等发起成立了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她本人当选为会长。她们上街游行,高呼“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等口号。她们在大街小巷宣讲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的道理。她们打破男女界限,和天津学联并肩战斗、相互支援,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和示威游行。刘清扬在斗争中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热情和较强的组织才能,尤其她那激昂慷慨的演说,更是振奋人心,铿锵有力。她先后被选为天津各界联合会常务理事、抵制日货委办会常务委员以及全国各界联合会常务理事,并两次代表天津各界赴京请愿。

1919年6月下旬,因《凡尔赛和约》签字日期迫近,天津各界联合会于26日开会决定派刘清扬等十位代表进京,会同山东、北京代表请愿,要求政府拒绝在和约上签字。27日晨他们乘火车赴京。当他们来到新华门总统府递交请愿书时,总统徐世昌拒不接见请愿代表。他们不顾烈日炎炎,在总统府前坚持斗争,受到北京学生和市民群众的热情支持。直到28日晚,徐世昌才被迫接见学生代表。面对徐世昌总统,刘清扬义正词严地指出:“拒签巴黎和约并取消二十一条卖国密约,这是四万万人民的呼声。今请总统立即致电巴黎我国代表,拒绝签字,并取消二十一条及一切不平等条约。这次请愿我们既受人民重托,决不空手回去。”在各界请愿代表的强烈要求和全国人民的压力下,中国代表团终于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1919年9月16日,刘清扬同周恩来、马骏、郭隆真、邓颖超等二十位男女青年,在草厂庵天津学联办公室举行会议,在会上成立了天津青年进步团体“觉悟社”。觉悟社本着“革心”、“革新”的精神,以“自觉”、“自决”为宗旨,出版刊物《觉悟》,研讨世界新思潮,领导天津学生运动。

1919年11月16日,福州学生焚烧日货时,日本帝国主义者竟开枪打死我爱国学生和巡警,制造了轰动全国的“福州惨案”。为了抗议“福州惨案”,加强抵制日货运动,在觉悟社领导下,天津各界人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集会和示威游行。天津反动当局镇压群众的爱国行动,继逮捕各界请愿代表马千里、马骏等二十四人后,又于1920年1月29日用武力镇压请愿学生,拘捕了周恩来、郭隆真等四名请愿代表,酿成震惊全国的“一·二九惨案”。事件发生后,刘清扬于第二天清晨就化装成天主教修女,沿津浦路南下,呼吁全国各界营救被捕代表。她到达南京,向南京学联控诉了天津反动当局的罪行,南京学联立即动员万余学生示威游行。随后她又来到上海,向全国学联作了控诉。全国学联在上海跑马厅举行了三万多人的集会,刘清扬在会上痛述了天津爱国运动惨遭镇压的经过。大会强烈要求天津当局释放被捕代表,并决议通电全国一致声援。同年2月,全国学联推派刘清扬和张国焘两名代表出访南洋,向海外侨胞宣传国内的爱国民主运动,呼吁侨胞的同情和支援。他们于4月初先抵达香港,在香港各校学生大会上发表了演说,然后出访了新加坡、马来亚和槟榔屿三岛。尽管殖民当局进行种种阻挠,在爱国侨胞大力协助和巧妙安排下,他们举行报告会,开展募捐活动,掀起广大侨胞的爱国热潮,并得到陈嘉庚、彭泽民、吴有胜等华侨领袖的大力支援。由于刘清扬等人的奔走呼号,激起全国各界的广泛声援,斗争持续达半年之久,被捕代表终于于7月中旬全部获释。

1920年8月16日,刘清扬和周恩来、邓颖超等十一名觉悟社社员来到北京,邀请“少年中国学会”、“曙光社”、“人道社”、“青年工读互助团”等四团体在北京陶然亭举行座谈会,共谋社会的改造。刘清扬被推选为会议主持人。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和北京大学讲师张申府都出

席了会议并作了发言。他们见到周恩来同志,十分投合,互相倾慕。9月底,刘清扬再次来到北京,张申府和李大钊在北大图书馆主任室找她谈话,希望她加入共产党。她出于对党的认真态度,表示对党的认识还很不够,没有立刻同意。

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切听从党安排

当时华法教育会正倡议中国学生赴法勤工俭学,许多有志青年因不满国内军阀混战,寻求中国的发展道路,纷纷踊跃报名参加。1920年底,“觉悟社”决定派周恩来、刘清扬等人赴法。11月7日周恩来先行,半个月后,11月23日刘清扬也出国。她与被聘赴巴黎里昂大学中国学院任教的张申府同船。一个多月的海上航行,使船上的十几位爱国同胞增进了友谊与了解。途中,张申府向刘清扬介绍俄国十月革命,讲述共产主义理论以及共产党的性质,使刘清扬对党的组织有了更多的认识。到了巴黎,他们又与周恩来会合。1921年初,经张申府介绍,刘清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二三月间,张申府又和刘清扬一起介绍周恩来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中共党员赵世炎、陈公培也相继到了法国。他们五人在巴黎成立了中国共产主义小组,在旅法青年中起到了核心和指导作用。1922年2月,刘清扬又和张申府、周恩来到了德国柏林。一个月后,刘、张、周和张伯简四人成立了中共旅德小组。在巴黎期间,刘清扬与志同道合的张申府结婚,成为一对革命伴侣。

1923年冬,刘清扬和张申府一道从德国路经苏联回国。回国后,刘清扬先到天津,参加了邓颖超等人领导的天津妇女进步团体“女星社”。在刘清扬的倡议下,1924年1月1日出版了《妇女日报》,由她担任《妇女日报》总经理。在该报上,她发表了一系列宣传妇女解放的文章,提出了只有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妇女解放问题才能得到彻底解决,讲求优生、限制生育等思想,并提出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的主张。在上一世纪的20年代能提出这样的论点是难能可贵的。

1923年,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确定了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根据“三大”的

方针,中共北方区委决定刘清扬加入国民党,作为跨党党员,参加大革命的斗争。1924年春,刘清扬由党组织派往广州,参加廖仲恺夫人何香凝领导的国民党中央妇女部的工作。同年5月,随李大钊同志到苏联参加第三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在会上作了发言,介绍中国妇女运动的发展情况。

1924年冬,刘清扬又被党中央调回上海,参与筹备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作为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的代表,1925年春,到北京出席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全国国民会议促成会常务委员。

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后,为了加强左派在国民党北京市党部的领导,建立了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刘清扬当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并任妇女部部长。任职期间,她在团结各界妇女、发展进步力量、宣传中共的主张、发动群众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1926年北京发生震惊全国的“三一八”惨案,段祺瑞政府开始大肆逮捕爱国人士,3月26



左起:张申府、刘清扬、周恩来、赵光宸 1923年于德国柏林)

日发布通缉国共两党 48 人名单，第一名是李大钊，第二名就是刘清扬。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刘清扬和李大钊以及国共两党的机关，只得搬进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的兵营里。不久，奉系军阀张作霖入关，进一步加紧镇压革命党人，北京全城陷入白色恐怖之中。尽管苏联大使馆受到敌人的严密监视，在李大钊同志领导下，刘清扬等人从未间断工作。她们通过地下活动方式与外界保持联系，继续坚持斗争近一年之久。

1927 年 1 月，刘清扬接到中共中央妇女部通知，调她到武汉工作。当时，刘清扬要想离开苏联大使馆，时刻都有被捕杀头的危险。但为了执行党的指示，她决定冒险出去。这时，恰好国民党中央派康新之来京找李大钊商议工作。康新之表示愿意掩护刘离京南下。一天晚上，刘清扬乔装打扮，由康新之的夫人和妹妹陪同乘坐小轿车从大使馆东门冲了出去，由她们伴送她到天津，随后踏上南下的轮船，转道上海奔赴武汉。

到武汉后，刘清扬先后任何香凝领导的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妇女训练股股长、宋庆龄主办的国民党中央妇女高级干部训练班主任、汉口市国民党妇女部部长等职。

1927 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7 月 15 日汪精卫又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至此，蒋汪合流，共同反共，导致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彻底破裂。革命转入低潮，刘清扬退出国民党。这时她正怀孕（此前，由于到处奔波，不止一次流产），在白色恐怖万分严重的复杂情况下，不久也脱离了共产党。

倭寇悍然侵我土 巾帼岂能不动容

30 年代初，张申府在北平清华大学哲学系任教，刘清扬已经有了我和姐姐（张立丽，后改名刘方明）两个女儿。我们住在清华园，本来可以过比较平静的生活。但“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不但强占我东北三省，又步步进逼我华北等地。刘清扬耐不住心头怒火，重新踏上政治舞台，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1933 年初，日军进攻山海关。长城各口守军奋起阻击，重创日军。刘清扬团结各界妇女成立北平妇女抗日救护慰劳队，开展抗日救援工作。她在清华大学教授夫人和家属

中开展募捐活动，并组织她们缝制棉被、棉袜送往前线，使正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将士深受鼓舞。1935 年日本侵略者策划“华北五省自治”，妄图进一步吞并华北。为了抵制这一阴谋，北平大中学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1936 年 1 月 4 日，清华大学参加南下宣传团的同学在操场集合，整装待发。刘清扬冒着严寒赶来，和同学们一一握手，满怀激情地说：“现在是到了我们该干事情的时候了。”

1936 年 1 月 12 日，在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召开了北平妇女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刘清扬主持大会并被推选为妇救会主席。

那时我和姐姐，一个六七岁，一个八九岁。母亲过于繁忙，无暇顾及我们的冷暖和学习，但是一有机会，就向我们讲述日本强占东三省、妄图亡我中华的野心，灌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她不止一次带我们去女青年会和妇救会的朋友们一起为前方士兵制作卫生药包。有一次她带我们到中山公园中山堂参加一个文化界座谈会，会间她把我抱到一把椅子上，让我向大家高声说：“我长大以后一定要坐飞机去打日本！”就这样通过一个孩童之口表达了全国老弱妇孺一致抗日的决心。母亲在一天忙碌之余，有时晚饭后坐在清华园宿舍前的广场上，教我们唱抗日救亡歌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这感人的曲调至今还常常缭绕在我的耳边。在这动人心弦的歌曲中，浸透了母亲对祖国的爱并把这爱国的种子播进我们幼小的心田。1937 年 3 月 8 日，母亲带我们姐妹俩到女青年会礼堂参加“三八”国际妇女节纪念大会，在会上让我们和另一个名叫程酃欣的女孩登台合唱了救亡歌曲。这个场面在第二天的《北晨画刊》上就登了出来。这份画刊我一直珍藏着，作为母亲对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宝贵纪念。

国民党当局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继 1935 年“一二·九”、“一二·一六”大举镇压抗日救亡的学生运动之后，于 1936 年初，又开始对广大知识分子狠下毒手。2 月 29 日清晨，军警突然包围清华大学，抓捕爱国学生和进步教授。两个全副武装的宪警闯入我们家，把我们两个孩子和一个保姆堵到厨房里，在屋子里乱搜一通。当时我父母都不在家，他们扑了空。后来他们

在城里先逮捕了我父亲张申府,接着又窜到我们城里的家。母亲刘清扬傍晚回来,一进门就发现家里有便衣侦探。她机警地说:“我是来找人的。”便衣冷笑道:“你四处活动,我们还能不认识你!等你大半天了,跟我们走吧。”刘清扬厉声质问:“我抗日救国,犯的什么罪?你们也是中国人,就不该爱国吗?”便衣显得有些狼狈,就转了口气说:“我们已经把张先生带进西城侦缉队了,现在只要你去跟他对证几句话,完了就放你回来。”刘清扬不理他们,回身向家里人说:“别信他们,我是不会很快回来的,你们不必怕,我们为了爱国被捕,又不犯法,迟早是要放我们的。”刘清扬先被押到侦缉队,后来又转到京师警察厅拘留所,最后被关到陆军监狱。在从拘留所转到监狱的前一天,一个姓邓的把刘清扬叫到他的办公室,对她说:“我是你哥哥的朋友,你有什么家务、财产要嘱托的,我可以帮助料理。”刘清扬泰然地说:“家里财产是张家的,我无所求。我只有两个女儿,张家也还有人,可以照顾。如果他们的父母因救国有罪而死,也会有爱国朋友把他们抚养成人,继承他们父母遗志的。”听了刘清扬的话,邓掩面落泪。

刘清扬被关进陆军监狱时,监狱的院子里,男女“犯人”都被砸上脚镣。当她吃力地走入女牢,难友们表现出同情和悲愤的神色。刘清扬反而风趣地说:“男人能带脚镣,为什么女人就不能带?没关系嘛。在这里倒实现了男女平等哩!”在监狱里,她不断地鼓励难友们要临危不惧,威武不屈,和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她还为我们姊妹俩做了两个书包,在书包的两面,分别绣上了“丽儿”、“玳儿”(我们乳名的昵称);狱中的母亲作。一针一线浸透了母亲对女儿的思念之情。刘清扬、张申府等爱国人士被捕后,党领导广大群众展开紧张的营救活动。当时年仅十九岁的大姐张亚丽自告奋勇,只身到南京请冯玉祥出面主持公道。冯玉祥即派邓哲熙到北平任陆军部军法处长审理此案。邓哲熙对刘清扬说:“有人告发你是共产党,你只要讲出来你受谁的指使,保证以后不再鼓动妇女运动就没事了。”刘清扬理直气壮地说:“爱国之心人皆有之,我受良心的指使,誓死不当亡国奴。我干的是爱国运动,如果法律判定爱国有罪,那就听便,如果爱国无罪,那就放

我,我出去照样干爱国运动。放不放在你,我是无罪可认的。如果我为爱国而死,也是我的光荣。”

刘清扬在监狱里关了近三个月,经过多方营救,于1936年5月22日出狱。她回到家里匆忙安顿了一下家务,便立刻赶赴上海参加5月31日开幕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并当选为联合会常务委员。7月初,又回到北平,继续参加北平的抗日救亡运动。

根据抗战形势发展的需要,在平津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基础上,1937年2月,在北平成立了包括七省在内的“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联合会由杨秀峰、张友渔、邢西萍(徐冰)、张申府、刘清扬等五人负责,刘清扬分管组织工作;主要干部有肖敏颂、刘文哲、王春裕等。联合会的任务不仅是做抗日宣传,还要深入农村,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游击队。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各界救国联合会联络更多的人民团体,成立了北平各界抗敌后援会,支援当时对敌作战的二十九军。石驸马大街的红十字会成了妇女救护慰劳队的集中地。北平妇女救国会一方面派出妇女救护队到永定门抢救伤员,一方面协同北大学生组织担架队,并在北大三院大礼堂设立了临时伤兵医疗站。当时刘清扬的家(西城学院胡同甲二号),则作了同二十九军保持联系、互通情报、分派工作的联络中枢。直到28日夜,刘清扬还守在电话旁等待消息,并给各方工作队准备第二天的任务。午夜两点钟,突然电话铃响了,二十九军张参谋长在电话中说:“刘先生,不必准备了,二十九军已经开始撤退了。”这阴沉的声音好似一桶冷水浇到刘清扬的头上。她痛楚地感到,国破家亡的危险已近在眼前。这是她有生以来感受到的最大的震动和打击。这天夜里,她辗转沉思,最后毅然决定远离亲人,到抗战大后方去参加救亡运动。

八年抗战备敌后 为国难顾儿女情

“七·七”事变后,北平许多爱国人士经天津纷纷南下,刘清扬、杨秀峰、张致祥、王春裕(董毓华)等人暂时留在天津,继续完成组织华北游击队的工作。在地下党领导下,他们一方面秘密筹



抗战时期在汉口过江时到武昌为伤兵服务 左起：邓颖超、刘清扬、王汝琪）

建华北抗日游击队，派王春裕深入冀东各地进行游击队的组织工作；一方面印发传单，出版油印小报，进行抗日宣传。记得母亲常常带大姐和我们较小的三姐妹到公园去，以看着我们玩为掩护，偷偷在树上和长椅上贴传单，往草地和花坛上扔传单，甚至向过往行人散发传单。他们还于晚间，挨门逐户地把传单投进大门的信箱里。有时客人来我们家以打麻将作幌子同母亲商议事情，我们就到门口或楼道一边玩一边放哨，见到可疑的人就进屋报信。1937年11月5日，在我们家以庆贺乔迁之喜举行家宴为名，召开了五路游击军区代表会议，正式成立了“华北人民抗日军政委员会”，并通过了军政委员会的组织大纲、宣言、告华北同胞书及政治纲领决议案。会议推选刘清扬和王春裕二人携带文件到武汉，向国民政府军委会备案，以取得共产党对华北抗日武装的合法领导权，并为冀东游击队募集资金。11月上旬，刘清扬惜别了年迈的母亲和年幼的女儿，离开天津。当她到达南京时，南京也已告急。三日，她乘最后一列撤退专车到达武汉。

当时的武汉是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中心。在抗日热潮中，年已四十三岁的刘清扬，以她特有的激昂慷慨的演说，宣传团结奋斗，抗日救国，使青年们热血沸腾。她讲述华北人民抗日的生动事迹，为华北游击队募捐，得到文艺界人士和海南岛同胞的支持。她和李德全、曹孟君、杜君慧、安

娥等人组织战时儿童保育会，并被推选为保育会理事兼输送委员会副主任。她和邓颖超、史良、沈兹九等妇女代表人物五十人，参加了宋美龄召集的庐山妇女谈话会。会议的结果是把宋美龄的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加以扩大和改组，使之成为妇女界联合抗日的统一战线组织。宋美龄让刘清扬担任妇女指导委员会训练组组长。刘清扬说：“我担任组长，就要训练为群众服务、为祖国献身的干部。那样做，别人会说我是共产党，训练出来的也是共产党干部。到那时，你不为难

吗？”宋美龄说：“你说的一点也不错，陈立夫就对我说过你是共产党，不能让你来训练干部。可是我相信你不是共产党。你做你的好了。”刘清扬心里有了底，便利用自己暂时没有党的关系的身份，积极主持妇女指导委员会训练组的工作。她把中共党员郭见恩（郭建）、夏英、李植春、张润芝安排为助手和骨干，使训练组成为一块红色基地，与史良任组长的联络组、沈兹九任组长的文化事业组并列为妇女指导委员会内左派掌权的三个单位。由于这三个组的存在，妇女指导委员会得以保持统一战线的性质。

1938年7月，训练组举办第一期妇女干部训练班，学员六十名，教师有邓颖超、阎宝航、邵力子、戴伯韬、张爱萍等；课程有“民众教育方法”、“妇女组训”、“农村服务方法”等。训练期满后，刘清扬、郭见恩等亲自带领学员分赴湖北四县，进行乡村服务，作为结业实习。宋美龄听到群众赞扬“蒋夫人的女学生”，十分高兴。不久，战火蔓延到武汉，有几个训练班毕业的学员正在衡山做战地服务工作，不幸被敌机炸死。刘清扬爱生心切，不怕艰危，在战火纷飞的荒野中，护送死难者的棺木安葬。她还在敌机狂轰滥炸之下到医院看望和安置伤病员。

1939年4月，刘清扬到达重庆。正值5月3日、4日敌机的大轰炸，城区受难居民纷纷往城外疏散。刘清扬亲自带领妇女指导委员会的工作

人员,在通往城外的磁器口路上,沿途设茶水站,一连三四天,直到难民疏散完毕。这又一次为宋美龄领导的妇女指导委员会博得了声誉。

刘清扬在妇女指导委员会训练组工作的两年时间里,训练了抗日妇女干部近千名,其中绝大多数以训练班为起点,踏上了革命的道路。这是刘清扬对革命事业的一项突出贡献。

1941年“皖南事变”后,重庆陷入白色恐怖。刘清扬按照中共南方局领导同志周恩来、邓颖超的指示,以去沦陷区接孩子为名,离开重庆,暂避风险,实际是转到桂林、香港继续参加抗日活动。在侨胞的协助下,刘清扬在香港九龙创办了中华女子学校。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她又于1942年撤离香港,路经广东东江解放区,在地方党组织协助下,跋山涉水回到重庆。到重庆后,多半时间是参加救国会的活动,同时继续做战时儿童保育会理事的工作。

1943年春,在重庆的周恩来、徐冰等同志为刘清扬庆贺五十寿辰,周恩来同志还亲自下厨,做了炸酱面。这次聚会使刘清扬非常高兴。郭沫若赠诗一首。诗云:

慷慨幽燕姐,犹然十五余。
登台三寸舌,下笔万言书。
意识跨前进,须眉愧不如。
行途刚半百,努力莫踌躇。

1943年秋,张澜到达重庆,决定进一步扩大民盟组织。刘清扬经张澜介绍,于1944年在重庆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45年10月,她出席了民盟在重庆特园召开的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兼民盟中央妇女委员会主任。

1945年7月,在重庆成立了中国妇女联谊会。李德全任会长,刘清扬任理事兼秘书长。抗战胜利后,1946年5月25日刘清扬从重庆回到北平,和浦洁修等同志筹备成立了中国妇女联谊会北平分会(1947年正式定名为“北平妇女联谊会”),并参加妇女联谊会的领导工作,直到最后。

喜迎全国解放日 两次进入解放区

刘清扬回到北平后,即和军调部中共党代表取得联系,参加民盟华北总支部和北平市支部临

工会的工作。1946年7月下旬,军调部中共代表办事处接连收到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来电,邀请刘清扬到解放区去。党代表助手徐冰同志担心路上不安全,劝她不要去。刘清扬说,杨主席打电报要我去,肯定有重要事情,坚持要去。这时正好我三姐张向丽从天津来到北平。她是天津地下党领导学运的领袖之一,由于受到特务追捕,不能继续公开活动,正准备去解放区。刘清扬给向丽改名为刘方美(意思是方向美丽。“方美”后改为“方眉”),二人扮成母女回乡探亲。她们于7月底乘平汉路火车出发,在火车上就碰到一伙持枪弄刀、穷凶极恶的“还乡团”。由于她们沉着机警,一路上平安通过关卡,终于到达邢台,即党的北方大学所在地,受到范文澜校长的热情接待。几天后,刘方眉留在北方大学继续学医,刘清扬便赶赴边区政府会见杨秀峰主席。杨秀峰说,为了开展工作,解放区急需革命知识分子,请刘清扬回北平后,介绍和输送进步青年到解放区来。他们商定了联络暗号,以后凡是刘清扬送来的人,接关系时就说“冯伟”介绍来的。“冯伟”是刘清扬到解放区后为了保密使用的假名。谈完这项任务,刘清扬还为民盟出版的《民主》月刊向杨主席募了捐,得到边区政府的大力支援。

回到北平后,刘清扬来往于平津之间,除参加民盟工作外,还和一些学生领导人密切联系,到北大、师大、天津南大等院校进行讲演,热情支持学生的反饥饿、反内战等反蒋反美运动,并输送进步青年到解放区去。

第二次去解放区是1948年10月。这时解放战争已取得决定性胜利,为了迎接新中国的成立,党中央邀请进步人士和民主党派代表到解放区参加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与此同时,国民党反动派加紧迫害民主人士和进步学生。刘清扬的革命活动早已受到严密监视,警察甚至在半夜闯进家里进行搜查。在这种形势下,北平地下党同志便动员刘清扬再次进解放区。

大约11月20日,刘清扬和其他民主人士一起被接到平山县李庄中央统战部所在地。在那里,他们学习讨论了即将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年底,他们被接到党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受到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新年。不久,北

平和平解放的消息传来,他们连夜乘卡车赶回北平。1949年2月2日,刘清扬等登上正阳门城楼,观看了人民解放军的入城大典。

中华昂首新国立 耄耋犹奔最前锋

1949年3月,刘清扬出席了在怀仁堂举行的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在会上成立了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刘清扬当选为全国民主妇联执行委员。同年9月,她作为全国民主妇联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会上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新中国成立后,她被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民盟中央常委;历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河北省人民政府委员、河北省政协副主席、全国妇联妇女干部学校校长、北京市妇女联谊会主席、全国妇联副主席、全国红十字总会副会长等职。

刘清扬非常珍惜她的政治生命。早在抗战初期,她就向周恩来同志提出,希望恢复她的党组织关系。周恩来同志劝她,暂时留在党外,便于作统战工作。解放后,她又多次申请入党。1961年,刘清扬终于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更加意气风发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而工作。

1963年2月,刘清扬七十岁生日时,她回忆起二十年前过五十岁生日与周恩来等同志聚会时的情景,感慨万千,提笔写了一首诗:

韶光易逝又念年,七旬初度犹壮年。

踏遍坎坷不平路,改造河山更向前。

身临逆境志无改 革命一生贯始终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中华民族遭遇了一场空前的灾难。多少无产阶级革命家、多少党的好干部,惨遭迫害,蒙冤受难,刘清扬自然也未能幸免。1968年1月下旬的一天,中央统战部的红卫兵战斗队(或是专案组)来了。他们搜查了一通,审讯了母亲,就把她带走了。过了些天,一个阴冷的晚上,突然有人敲我们房间的后门。声音紧迫而轻微,让人毛骨悚然。我过去开门,两个孩子吓得抄起了火通条。啊,原来是母亲趁着

看守不备,偷偷跑了回来。七十四岁的老人,发着高烧,跌跌撞撞地从统战部跑了四五十分钟的路。她冲进屋里,倒在床上。疲惫、惊恐和发烧,使她全身颤抖。我急忙给她盖上被子,喝了热水和感冒药,老人才慢慢安静下来。专案组当然不会就此罢休。他们一次次来审问,不断加重“罪名”,无中生有地扣上“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大帽子。大约半个月后,他们又来了,从病床上掀起虚弱的老人,不容分说地又把她带走了,这次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后来才知道,她被关进了北京卫戍区的看守所。在监禁中,她受到了难以言状的非人待遇。由于她行走无力,一个看守竟然用柳条像赶牲口一样地抽打她。一次次的逼供,不但硬给她扣上“叛徒”的帽子,还强制她承认是美国特务。这样的诬陷和屈辱,使为革命奋斗一生的老人实在难以承受,身体日趋衰弱,以至于在一次审讯时心脏病突然发作,趴在桌子上。

母亲被关在单人牢房,完全与世隔绝,周围没有任何有生气的东西,陪伴她消磨时间的就是那四卷《毛泽东选集》和每月一期的《红旗》杂志。六年后,直到1973年10月,才允许我去探视。

1974年,我偷偷地给老人带去一本小日历。老人如获至宝,把它珍藏起来,并在小本的背面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从1973年7月23日,由卫戍区转进复兴医院。一位警卫员的协助转告上级,我在病中想念儿女。居然于10月31日,方清突然来探视“病中之母”,这使我出乎意料的欣慰!

74年4月19日,小平(刘的外孙)生日这天,方清又来了。专案组某人陪同方清前来说明党中央指示编译局党领导,要方清于每星期来探视。我很感谢党中央的关怀,但无须方清每星期来,只要两星期来一次,以免多误党的工作。照此约定进行,直至1975年2月底(方清)去江西劳动。这是方清来时给我买的小日历,使我在痛苦中得知日月季节,因此我很爱惜这一本小书,特此记载,永留纪念。

“病中之母”记

这是七年多来母亲在狱中写下的唯一的一篇日记,也是她留给我们的珍贵的纪念。从这短短的一段话中,不但多少反映了狱中的生活,也可以看出她在逆境中仍然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

无论是抗日救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刘清扬总是孜孜不倦地为党工作,从不停息。而今身陷囹圄,终年面壁,她内心充满痛苦。在我去探监时,她对我说,哪怕是让我到大田里拾麦穗,为社会主义建设出点力也好嘛。就在这含冤受难的日子里,老人家还惦记着社会主义建设呢!

实在难以想象,没有钟表,没有日历,看不到日月星辰,这两千多个日日夜夜是怎么熬过来的呀!

刘清扬被关押了七年半,直到1975年5月31日才解除“监护”,背着受审查的身份回到家里。

1975年底,刘清扬近八十二岁高龄,在蒙冤受难中写了下面一首诗:

忆昔当年风云涌,战略纵横胜群凶。
而今身心忍痛苦,壮志未酬愧退休。
沉思远眺望东风,三山已倒雪犹封。
寒流难消心头火,自信有为灭妖风。
世界大乱形势好,但我终怀无限忧。
身离战场整八载,遥望曙光靠群英。
离合悲欢都历史,真理均在实践中。
功过是非人心亮,野心篡改势难逞。

这首诗反映了她一生革命、被迫离退的悲愤,表达了她对林彪、“四人帮”的仇恨和对未来胜利的信心。遗憾的是,她虽然看到了林彪、“四人帮”的垮台,却未能看到自己的不白之冤得到昭雪。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噩耗很快传到刘清扬的耳边。对于从“五四”时代就并肩战斗的周恩来同志,刘清扬一直怀着无比爱戴和崇敬的心情,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好似晴天霹雳,使体弱多病的八旬老人猛然惊呆了,一阵昏厥,心脏几乎停止跳动。刘清扬瘫倒在床上,欲哭无泪,半天才发出一丝微弱的哀叹,喃喃地叨念道:“恩来同志啊,我的老战友,你怎么就这样离开了我们!现在国家怎么能没有你啊!”老人辗转在床上,桩桩往事浮现眼前,就这样似睡非睡地挨到了次日天明。在这举国哀悼的时刻,她多么希望能最后再看一眼自己敬爱的老战友啊!但是她这样的身份,哪有资格参加什么悼念活动。一个八十二岁高龄的老人,以惊人的毅力拖着病



刘清扬怀念亲密战友周恩来

弱的身体爬下楼梯,迈过三四条坎坷不平的土路,找到一个可以打公用电话的地方。她用颤抖的手拨动话机,找到在中央编译局工作的女婿王家华(当时我在江西下放劳动),用沙哑的哭声说:“如果你有机会参加总理的遗体告别仪式,一定代表我向总理告别,替我多看总理一眼,向他表示我最最沉痛的哀悼。”说到这里,老人已泣不成声。

周恩来同志是最关心、最了解她的人。周总理的逝世,使她受到极大打击,从此身体更加衰弱。1977年7月19日,母亲含冤去世,终年84岁。当母亲的灵车驶过天安门广场时,我禁不住泪流满面,感慨万端。从“五四”起就在这天安门城楼前,为了反抗列强的欺辱,争取祖国的独立富强,母亲发表过多少次激动人心的讲演,而今她却凄凉地离开了这战斗过的地方。

两年后,1979年8月3日,党中央为刘清扬恢复名誉,平反昭雪,举行追悼会。邓小平、宋庆龄、邓颖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送了花圈。追悼会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刘澜涛主持,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宣读悼词,康克清同志满怀深情地郑重宣告:“刘清扬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

亲爱的母亲,您可以含笑于九泉了吧。

(责任编辑 吴思)

邓小平的恩师汪云松

● 贾昭衡

当年，是谁帮助年轻的邓小平迈出了赴法勤工俭学的关键一步？邓小平之女毛毛所著《我的父亲邓小平》和大型文献电视片《邓小平》，都满怀敬意地提到了邓小平的老师汪云松。“四川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倡导人公推吴玉章先生，而重庆留法勤工俭学的功臣，当属重庆商会会长汪云松先生。”

“当时我就觉得，希贤这娃娃将来定有出息！”

汪云松，字德薰，1874年生于一个商人家庭。汪云松从小就喜欢读书，青年时考选上贡生，入北京国子监深造，由此有机会与京师的皇亲国戚交往，不仅获得了包括乾隆、康熙皇帝御书在内的大量珍贵古玩字画，而且还与末代皇帝溥仪的哥哥、古乐大师溥雪斋有金兰之交，曾换帖结拜为兄弟。1905年，他携眷属到江苏出任知县，其妻汪廖氏常以廉正爱民相勉，因此颇有政绩与口碑，不久就保升道台，奏调吉林先后任省官银号总办、电灯总局总办、五常府知府等职。尽管当时盛行“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之说，但辛亥革命成功后，汪云松携眷返回重庆时，除了带回一些古玩字画和在吉林十分便宜的皮衣外，再没有其它财产。幸亏其父经商尚有不少收入，一家人回渝后的生活才无后顾之忧。此后，他见重庆城缺医情况十分严重，便与巴县乡贤刘焕彩、李晴湘、朱叔痴、王凤鸣等人筹办起了巴县医学堂，后改名重庆官立医学校、重庆商办医学校、重庆存仁医学校等，并一直担任董事。这所学校，为重庆培养了不少医学人才。此间，汪云松除了协助父亲、弟弟经营济兴隆商号外，还于1919年与孙仲山、何鼎臣等人创办

了大中银行，亲任总经理。该行资本曾达到100万元，并在成都、武汉、上海等地设有分行。鉴于他的名望与人品，当时被推为重庆总商会会长、重庆市参议会议长。

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和1919年中国的“五四”运动之后，苦苦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中国知识分子兴起了颇有规模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旨在学习西方先进思想和技术。在四川，在吴玉章的倡导下，成都于1918年率先成立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当这批学生途经重庆，在朝天门码头意气风发地登上轮船沿长江出大海向欧洲进发时，时任重庆总商会会长的汪云松亲眼目睹了这一场面，并深受感染。当年在清朝为官时，他就赞成康、梁的维新主张，还珍藏着康有为手书的横幅。但变法维新以失败告终后，他的思想遂倾向革命。轰轰烈烈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又使崇尚实业救国的他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之后，他多方奔走，向杨希仲、朱芾煌、黄复生等工商界人士和社会名流集资数万元，并经当时的教育局长温少鹤同意，于1919年8月28日正式成立了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汪云松亲任校长，校舍设在重庆夫子祠内。

汪云松筹备留法预备学校时，邓小平的父亲邓绍昌正在重庆。闻知这一消息，具有开明思想的邓绍昌立即请人带话到家乡广安县，让长子邓希贤中止在广安县中学的学习，到重庆来读留法预备学校。于是，同年9月初，预备学校已经开学了，15岁的邓小平才风尘仆仆从偏僻的广安县赶来了，作为自费生参加学习。这批学生共有110人，分为公费生和自费生。公费生由学校提供300元旅费，自费生由学校提供100元，自己筹集200元，毕业经考试合格后即可成行。

经过近一年的紧张学习,通过毕业考试、体格检查和法国驻重庆领事馆的口试,有83名学生合格,邓小平是其中年龄最小的一名。正当学生们忙碌地进行着奔赴异国他乡的准备工作时,从学校筹划、集资、选址、聘请教员、考试到最后办理签证都极尽热心、亲自奔走的汪云松,把邓小平找到一边,从自己的积蓄中拿出300元送给他,并热情地勉励一番。汪云松为何给邓小平如此优待呢?与汪云松关系一向亲密的外侄孙杨钟岷(现为重庆老新闻工作者协会会长、当时任重庆《新民报》记者)接受笔者采访时解开了这个谜:“解放战争时期,当刘邓大军挺进中原、威震四方时,舅公就带着几分自豪地对我说:这个邓小平原名叫邓希贤,曾是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里我特别喜欢的两个学生之一。希贤这娃娃,有两点我最喜欢:一是稳而灵活,干啥子事情都很有主见;二是爱国有正义感。当时我就觉得,希贤这娃娃将来定有出息!”这是云松先生在近一年时间里,从邓小平话语不多但学习刻苦认真、在抵制日货斗争中的表现中认识到的。

1920年8月27日下午三时,汪云松将邓小平等83名川东子弟送上了“吉庆”轮。

获得汪云松帮助的不仅仅是邓小平。

留法勤工俭学高潮时,由于资金和名额所限,川东一些青年只得直接自费去法国。1919年底,江津县的聂荣臻和十余名青年每人自筹300元,来到重庆。但他们与法国领事馆不熟,于是找到在重庆《商务日报》当编辑的熟人刘颖彬。刘颖彬便找到与法国领事馆十分熟悉的汪云松,委托他为聂荣臻等代办护照。汪云松自然热心应允,几经奔走,终于使聂荣臻一行于12月19日顺利地朝朝天门码头启程。1922年春,担任云南省警察厅长的朱德因避祸途经重庆,准备到欧洲寻找共产党。那天晚上,曾与朱德共事的川军将领杨森宴请朱德后,决定送朱德一万元旅费。可经办人员去银行办理时,银行已经关门。然而,汇票又必须当晚汇出。无奈

之际,经办人员找到了担任大中银行总经理的汪云松,汪云松当下就爽快地把事情办妥。据汪家一位亲戚回忆,20年代初,当陈毅等留法学生被迫回国时,经济极度困难。汪云松闻知,又想法筹集了一大笔经费汇去,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

他不喜欢讲排场,却酷爱古玩字画

汪云松的声望与人品,使得他与重庆市的各界名流和后来迁到重庆的国民政府的要人多有交往,并多次被聘任为重庆市政府顾问,担任过三届重庆商会会长,四次连任重庆市参议会主席。从20年代到40年代末,汪云松尽力为重庆的建设和发展做了不少有益的事情。

20年代,四川军阀割据,混战不休,殃及百姓。汪云松深感痛心,多次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及与各方的关系,冒着危险从中斡旋,以减轻百姓损失,稳定商业市场。1922年10月,他与工商学界一些知名人士发起成立了重庆裁兵促进会,并组织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敦促重庆军方实行裁兵,以稳定社会,减轻各方负担。此举虽然未能抑止军阀野心,但代表民意发出了正义的呼声,因此深得民心。1925年,他与巴县议会副议长李奎安等倡议筹办重庆大学,到1929年重庆大学正式筹办时,他被聘为筹委会常委,并从经济上给予赞助。1929年,汪云松发起并参予重庆自来水公司创建工作,由市政府任命为筹备处长,尽心操劳,

使山城市民喝上了洁净的自来水。抗战前夕,他又和温少鹤等人筹建起了巴县汽车公司,集资修建了重庆到璧山、重庆到北碚两条公路。同时,购买了一批汽车,开辟了市区七星岗到磁器口的公交线路,方便了市民。1940年,当日军飞机对陪都重庆狂轰滥炸时,汪云松受命参加了重庆防空委员会,积极为重庆防空事业筹集到了40万元资金,购置了大批防空设备。之后,他和温少鹤、康心如等9人获得了政府颁发的金色奖章;除此之外,汪云松还与一些商界人士先后创



汪云松

办了重庆孤儿院和平民教养工厂……鉴于他在公益事业上的贡献,国民政府曾颁授他嘉禾、文虎勋章。

二三十年代,汪家在重庆声名显赫,汪云松之父汪在椿年年都要举办生日庆典,登门祝贺的多是名流政要。1929年农历冬月22日,是汪在椿的82寿辰,也恰逢他与妻子张氏结婚60周年,传统习俗谓之重谐花烛之庆,西方则称钻石婚。于是,汪家在其住所中营街(今八一路)67号大办“重谐花烛”盛宴。那一个月里,汪家公馆的两个大院里,总是笙歌缭绕,高朋满座,甚至许多名流要人也带着家中多病难养的孩子前来“赶寿”,讨个吉利。

和汪老先生不同,汪云松却不大喜欢讲排场,这或许和他的文人秉性有关。1944年11月,是汪云松的70大寿。可是,当后人们来和汪云松商量筹办70大寿宴会时,他却连连摆手道:“现在正是抗战时期,日子过得艰难,一切都应从俭,生日宴会就免了吧。为向亲友表明自己心系抗战先忧后乐的情怀,他自撰对联一副:‘我亦古稀年,生逢赤马劫尘,遑云四豆;天如早灭日,直到黄龙痛饮,再补一杯。’”

汪云松生活节俭,却酷爱收藏古玩字画。和名流政要交往,也为他收集古玩字画提供了便利。重庆城里的古董商们都知道他这一嗜好,只要店里来了什么好东西,都要跑来告诉他。只要看中的,他总是不惜重金收买,哪怕这段时间家里日子过得正紧。天长日久,他专用书房的一排排橱柜里,摆满了他从各处收集来的古玩、字画、扇面。一有空,他就躲在书房里细细地把玩、欣赏。30年代中期,他曾到大中银行上海分行忙了一段时间。“八·一三”抗战后,他才回到重庆。见日机不断到重庆骚扰,他预料日后可能会不断升级,便将自己多年收集的古玩字画转移到了北碚乡下一亲戚家。果然,1939年5月3日、4日,日本飞机对重庆城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大轰炸。数千无辜百姓倒在血泊中,大片大片的房屋被炸成一片废墟。这一回,汪家也损失惨重,汪公馆两个大院子的几十间房子全被炸塌,汪云松的四子汪曰福也被炸得头破血流。幸亏云松夫妇带着那些珍贵的古玩字画早已转移乡下,否则不知会有什么后果。事后,汪云松来到废墟前,眼前惨景使他胸中怒火熊熊,对

日本侵略更增添了几分仇恨。之后,他多次在《新民报》上发表自己的诗作或文章,谴责日军的罪行,用的笔名便是“五四难民”。此后,汪云松夫妇便带着大儿子汪曰贤一家一直寄居在绣壁街(今解放西路)一亲戚家里。

“小平就最认我这个老师!”

1949年11月,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直逼大西南。

面对飞速变化的时局,汪云松一时有些举棋不定:尽管自己曾帮助过朱德、邓小平、陈毅等共产党人,可也曾听人说共产党人六亲不认,是不讲人情的。况且,这二三十年来,自己与国民党的军政要人来往密切,担任过国民党市政府的几届顾问,又是重庆名噪一时的大资本家,尽管没干过什么坏事,但眼下与国民党水火不容的共产党能放过自己吗?然而,要跑能跑到什么地方去呢?跑到成都,解放军照样会追过来;跑到台湾,自己已是耄耋之年,国民党也不会给什么关照的;跑到香港,自己在那里没一点根基,又能干什么呢?那段时间,他真有点如坐针毡,便私下里找到一些与共产党有所接触的亲友,其中也有自己的外侄孙、思想一向进步的杨钟岫,从侧面探听共产党的政策。

杨钟岫老人给笔者讲了当时的情景。那天,汪云松讲了自己的种种担忧之后,当了多年记者的杨钟岫安慰他说:“舅公,我看你不必那么紧张。邓小平既然是你的学生,到时你完全可以向他说明自己的情况嘛。据我所知,共产党是把民族资本家当作团结对象的,对于没有血债的士绅,是讲联合的……”

听了杨钟岫等人的安慰,汪云松放心了一些。可是,11月30日,解放军要进城了,重庆地下党组织了城内一些开明绅士到南岸海棠溪去欢迎解放军,却没有邀请汪云松(或许是考虑他年事已高行动不便),汪云松心里又产生了一些疑虑。12月8日,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和政委邓小平率机关进入重庆城。那几天,汪云松天天把杨钟岫叫到家里,了解市面上的情况,询问共产党的政策。杨钟岫见状,总是竭力安慰,并借适当的机会将汪云松的情况向重庆市军管会人事处长田伯平和新华社西南分社副社长邵子南作了反映。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汪云松在绣壁街的住所前突然来了三名着解放军军装的人，向人打听汪云松先生是不是住在这里。汪云松在屋里听到了，想起这几天城里正在抓反动分子，不知是凶是吉，忙叫大儿子汪曰贤出去应付。见到解放军，汪曰贤谎称父亲有事外出。等那三人一走，汪云松立即出门赶到杨钟岫家，讲了刚才的事，疑虑重重地说：“他们来找我，不知是什么意思？”杨钟岫问：“他们的态度怎么样？”汪云松说：“听曰贤讲，他们态度还是很和蔼的，并说过两天还要来，叫我一定在家等着。”杨钟岫肯定地说：“如果是来抓人，肯定不会这样的态度。依我看，也许找你是好事。下次他们再来，你无论如何也要亲自接待。”

过了一天，这几个人果然又来了，并带来了一辆军用吉普车。见到汪云松，他们说邓小政委特意安排来请他去的。于是，汪云松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跟着他们上了车。到了邓小平的住地，邓小平一见到他，格外亲热，久久拉着汪云松的手问长问短，汪云松的一颗心怦然落地。邓小平夫妇请汪云松吃饭，吃的是大食堂里的大馒头，但菜却加了鱼肉。席间，这对分别近30年的师生坐在一起，谈笑风生，各自讲起了这30来年的经历。此时虽是冬日，但师生间的谈笑，却使屋子里荡漾着不尽的暖意。饭后，邓小平又派车将老师送回了家中。一到家，汪云松笑眉舒展，仿佛换了一个人似的。给许多亲友讲了与邓小平会面的经过后，他感慨万分地说：“谁说共产党不讲人情？我现在才晓得，共产党确是最讲人情不忘故旧的，小平就最认我这个老师！”

周总理夸汪云松：你为我们国家培养了两个副总理

从此，汪云松对新中国对共产党充满了信心。由于邓小平的关心和亲自提名，1950年1月，汪云松被推选为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特邀代表，不久便担任了西南军政委员会监察委员，接着又应邀赴北京列席了全国政协会议。

在重庆市档案馆，记者在浩繁的档案中，查到了汪云松在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上一段发言的原始记录：“我以76岁的老汉来参加，觉得这实在是70多年没有见到过的。记得幼年时

读过两句书：‘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蒋介石统治时代弄得民不聊生，叫做天下无道。今天毛主席、朱总司令扭转时局，解放了全中国，从此天下无道变为天下有道了。……还希望各位代表提有关国计民生的提案，一件一件地提交政府，又把大会的决议件件实行了，这样我们庶人就不再议了。”

在北京出席全国政协会议时，那天怀仁堂举行宴会，邓小平把汪云松介绍给了毛主席。大概毛主席对他早有所闻，当下便笑容满面地说：汪老对重庆是有贡献的，创办了自来水公司，还办了个汽车运输公司。宴会上，毛主席坐在第一桌，第二桌是邓小平、陈毅和汪云松等，这样的安排无疑是考虑到三人之间的交往。席间，邓小平半开玩笑说：陈老总我们两个分一下工，请客由我负责，完了你负责把汪老先生送回住地。陈老总当然满口答应，宴会一散，便用自己的小车把汪云松送回了住所。云松先生的大孙女汪毓秀接受采访时还告诉笔者：爷爷回渝后曾谈到，政协会议结束在怀仁堂和中央领导人合影时，他拿到照相站队的号票一看，不由心头一热，这号数恰好和他的年龄一样，便猜测可能是邓小平的有意安排，于是感叹：“只有小平才知道我的确切岁数，共产党做工作真是细致得很！”不知此事真如云松先生的猜测，还是只是一个巧合，但这事足可看出云松先生对共产党已经是钦佩之至了。

担任了一系列社会职务之后，汪云松时常出面参加社会活动。1952年春天，成渝铁路即将完工时，邓小平又特意邀请汪云松坐着铁路工务车到工地上视察。见到工地上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云松先生心潮难平，回想旧中国几代人未办到的事情，共产党一来就很快办到了，更对共产党多了几分敬意。

采访中，重庆文史馆年近古稀的退休干部陈联合给笔者谈到这样一件事，这件事曾令云松先生感动不已。当年，曾任二野敌工部长的杨松青担任重庆市委统战部长后，了解到汪云松和邓政委的那段历史，更注意从多方面关照这位曾帮助过共产党的老人，时常主动登门向汪老征询意见，商谈有关事宜。有一天傍晚，杨松青带着统战部工作人员陈联合去汪云松家，途经群林市场里的拍卖行时，碰巧见到汪云松的一个家人正拿着从家里

悄悄拿出来的几幅扇面在卖,才一元钱一把。杨松青知道这是汪老十分珍爱的东西,当下便自己掏出钱来买了两把。到了汪家,杨松青说:“汪老,你家××把你恁个贵重的扇面拿出去贱卖,正好被我们碰到了。你看,我给你买回两把。”汪云松接过扇面,脸上充满感激之情,连声说:“你看,你们还是供给制,怎么好意思让你来花钱呢?”这虽是一件小事,但汪云松却从中看到共产党团结、关心民主人士是真心实意的。

鉴于几年来的一系列感受,汪云松决心要向共产党表示一点儿心意。1953年11月23日,汪云松致函重庆市政府,准备将自己珍藏多年的一件宝物——清代乾隆御窑古月轩所产的宝石浆胎东方红天球尊(原名“美人齐”宝石料瓶)作为1954年的元旦献礼捐赠给党中央,并希望市政府代为转送。该天球尊状似花瓶,长颈巨腹,双层结构,全高36.1厘米,颈长21.5厘米,腹围55.5厘米,它凝聚了清御窑能工巧匠们的高度智慧与诸多心血,价值不菲。

老先生的美意岂可辜负,重庆市政府即于当年11月27日致函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请示“是否即需将该天球尊呈送中央”。据有关同志回忆:当时,中央有关部门接函后,起初有些为难,因为按照我党的规矩,不允许给中央送礼。可小平同志知道了这件事后,立即对有关同志说:“别人的礼不能收,汪老先生的这份礼无论如何都要收下。你们要了解汪云松,不要伤了他的心。于是中央办公厅当即将函转给文化部办理。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经过一番研究,于12月24日致函重庆市政府:“该瓶寄京途中恐有损坏,可请西南博物馆鉴定,并由你府代为接收,并希照一相片,连同鉴定意见一并寄与我局。”1954年元月8日,重庆市政府代为接收了汪云松所赠宝物,之后致函西南博物院,要求派员前来鉴定。不久,西南博物院派出了古董专家潘必琼前往鉴定,并写出了鉴定结论:“此类料器在西南甚为少见,我院亦无此收藏。”做完这些工作,重庆市政府即将鉴定结果和所拍照片、草图一并函寄中央文化部。

1954年6月,在慰问人民解放军的热潮中,全国人民慰问解放军代表团第三总分团(其中第一分团由重庆市市长曹荻秋等41位重庆各界代表组成)带着天球尊来到了北京,将这一珍贵的

礼物献给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和他们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

1957年1月,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副总理访问亚洲6国后,从昆明乘飞机到了重庆。2月10日傍晚,周总理等来到市工商联二楼学习室,会见工商界代表。当介绍到汪云松时,得知他有清代知府头衔时,周总理笑着问他:“你是候补还是实授?”汪云松回答:“实授吉林五常府。”周总理称赞说:“汪老先生你真不错嘛,为我们国家培养了两个副总理(注:指邓小平和聂荣臻)!”

1952年,筹备成立重庆文史研究馆时,邓小平提名让汪云松担任该馆副馆长(暂未设馆长)。1953年6月1日,重庆文史研究馆正式成立,不久,汪云松走马上任,便尽心尽力地开展工作。文史馆员不少是前清举人、秀才,曾目睹了世纪风云,熟悉历史。汪云松将他们组织起来,先着手编撰重庆市志。尽管他已80高龄,但每次讨论稿子都亲自主持逐字逐句地修改,定稿后又组织老先生们用毛笔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写。当两本《重庆市志略》抄好后,除了馆藏一本,另一本送市委办公厅存档。接着,应市委书记任白戈之邀,他又组织老先生们整理传统川剧唱词,为川剧改革做出了贡献。

1957年底,云松先生体内发现了胃癌。他知道自己日子不多了,一再叮嘱家人,一定要把家中珍藏的全部古玩字画捐给国家。1958年2月8日,云松先生与世长辞,享年84岁。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由邓小平的弟弟、当时任重庆市副市长的邓垦主持并致悼词。悼词中充分肯定、热情赞颂了云松先生一生中为国家和人民所做的好事。据他的后人回忆,云松先生患病后,邓小平曾打电话请他到北京治疗,他逝世后邓小平也曾打来电话表示哀悼。

云松先生去世不久,他的亲属何佩华和汪平叔便将保存多年的377件古玩字画整理出来,上交给了国家,由重庆市文化局具体接收。笔者手中拿到了一份抄录下来的交接清单:“唐邛窑碟1件;宋川东窑香炉1件(带金);蜀窑瓶1件;康熙御书1件;乾隆缙丝中堂1件;康有为横幅1件;张大千山水画卷1件……”这些珍品的价值,已根本无法估量。云松先生对国家的一片痴情,于此可见一斑。

(责任编辑 吴 思)

八路军的“电讯大王”王士光

● 江 文

“你们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这是毛泽东同志1941年为我军通信兵的题词。在战斗岁月里，无数优秀儿女运用各种科技手段，为民族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王士光同志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虽于2003年6月不幸去世，但我军通信事业建立的卓著功勋，将永载史册。

五台山麓的“助理教授”

1943年秋，我由冀中军区无线电中队政委调任晋察冀军区司令部三科科长兼无线电大队政委。当我赶到军区司令部所在的阜平县城南庄报到时，聂荣臻司令员高兴地向我介绍说，他请了两个洋教授，正在无线电大队开办无线电机务高级研究班（当时简称高研班）。叫我赶紧去看看，叮嘱我一定要把高研班继续办好。

第二天下午，我从城南庄出发，向南走了七八公里山路，到达高研班所在的中白叉村，首先看到两个黄头发高鼻梁的人，正在指手画脚地和一群学员热烈交谈。一个身材高大、面庞清瘦的八路军不时地用英语作着翻译。经介绍，大高个是王士光，两位洋人就是聂司令员说的洋教授，都是英国人。老一点的叫班威廉，原任北平燕京大学物理系主任。年轻一点的叫林迈可，是燕京大学经济系讲师，无线电技术的爱好者。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们几经辗转到达晋察冀根据地，这使一向珍视人才的聂荣臻司令员如获至宝，劝说他们留在阜平帮助办大学班。1941年春，王士光同志奉命由冀察热辽军区无线电中队机务主任调八路军前方总部（简称前总）工作，路过晋察冀军区时，也被聂司令员截留下来，专电请示延安同意后，任命他为军区三科教育股长，主要

负责高研班工作，为两位洋教授当助手和翻译。这天下午，王士光同志兴致勃勃地向我汇报了两年来高研班的教学进展，还介绍了他带领高研班学员改装电台发信机的情况，谈得很投机。从那天起，我们成了好战友、好朋友。

王士光是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四哥。1934年，19岁的王士光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平燕京大学物理系，翌年，又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学习无线电工程。受进步书刊和进步学生的影响，王士光参加了著名的“一二·九”爱国运动，1936年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是王家参加革命第一人，成为兄弟姐妹的学习楷模。王光美受其影响，后来奔赴延安，三个妹妹也相继参加革命。1938年7月，根据党组织的安排，王士光与王新假扮夫妻，在天津秘密组建电台，在日寇的眼皮底下，一次次完成地下党组织交给的联络任务，爱情之花也在这曲折惊险的地下斗争中悄然开放。

在高研班，王士光是主要负责人。高研班的学制为两年，学员大都具有高中或初中文化程度，有的是作战一线的报务主任、电台队长或机务骨干，有的是各军分区挑选的基层干部，还有几个是大学毕业生。所学课程分必修和选修，必修课为高等数学、高等物理、电工原理、无线电工程等四门，选修课有高等微积分、高等电磁学、光学、量子论、相对论、天线理论等。教材是美国斯坦福大学课本和班威廉编写的讲义。由于基础不同，高研班分甲、乙两组。英语基础好的编为甲组，直接听两位老师讲课；基础差的分在乙组，由王士光整理笔记，译成中文，再刻印成讲义给大家阅读。当时只有26岁的王士光，既当领导又当助手，既当学生又当“先生”，既做翻译又当编

辑,忙得不亦乐乎,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助理教授”。

为了更好地满足八路军前线抗日作战通信联络的需要,王士光除了做好高研班的组织之外,还开动脑筋,将课上讲的发信机原理绘制成图,编成实习教材发给大家学习;同时潜心钻研,创造性地研制出了电子交连式(即电子耦合式)发信机,使发射功率更加稳定,并节省了一个电子管。这种改进后的发信机,抗战乃至解放战争时期,在晋察冀和晋冀鲁豫军区成为最抢手的电台。

在高研班工作期间,王士光还发明了一套简便的方法,能帮助学员很快掌握电子交连式发信机计算公式的推导、性能参数的确定以及调线路的制定等,这在当时是个了不起的创举。这套方法在军区推广后,有效地提高了大家的业务水平。从1942年“五一”反“扫荡”到1944年初,在晋察冀根据地环境最残酷、战斗最频繁、敌我斗争最激烈的时期,高研班竟然奇迹般地坚持下来,与王士光的殚精竭虑是密不可分的。高研班学员毕业后分配到各地抗战前线,大大加强了我军的通信力量。曾在燕京大学任教10余年的班威廉教授感慨地说:“这么好的学生和人才怎么都到八路军里来了!我在国民党统治区教学很久,这是我遇到的最好的学生。”回国后他写了一本《新西行漫记》,书中赞扬高研班学生的水准,“与任何第一流大学的学生相比毫不逊色”。聂荣臻元帅在回忆录中指出:“这一时期培训的无线电技术人才,不但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不少还成为新中国的电讯骨干。”

林迈可于1944年4月离开晋察冀转道回国,新中国成立后,曾多次来访。1992年我和王士光一起去宾馆看望他时,谈起当年的高研班,他依然对王士光赞不绝口。

太行山上的“电讯大王”

“我们在太行山上/我们在太行山上/山高林又密/兵强马又壮!”每当听到这熟悉的歌声,我就会想起王士光在太行山区为我军通信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

1944年初,因为生病,组织上决定我到延安治疗休养。虽然和王士光分开了,彼此的情况却一直相互关注着。1944年春,王士光调到八路军前总通信科材料股任股长。他把在高研班学到的知识和自己研制总结的方法运用到材料股的各项工作中,使八路军前总通信器材工作发生了很大变化。时任前总电台报务员的徐继泉在《赤胆金钟战太行》一书中写道:“王士光同志的到来,使我们的工作很快有了起色,可以说,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

1944年下半年,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为了迎接大反攻,适应部队大发展的需要,八路军前总首长要求尽快生产一批电台,满足前线急需。王士光同志受领任务后,立即因地制宜地进行设计,他采用主振放大式线路设计发信机,采用超外差式线路设计收信机,不分昼夜地绘制出16部收发信机图纸。接着因陋就简地展开装配。没有机壳,就用核桃木做机箱和面板底板。没有支架,就用飞机的残骸铝浇铸。没有电池炭包,就和大家一道抡起大锤一锤锤地打成。材料备齐后,他带一名通信员,到安平县彭家营村一个堡垒户家中进行装机。为了赶时间,每天几乎工作15小时以上。由于长时间在炭火盆边烧烙铁焊元件,几次造成一氧化碳中毒。一次上厕所时,他晕倒撞在墙上,鲜血直流,醒后只用炭灰抹抹伤口,又继续装机。经过一个半月的突击,终于完成了16部电台的研制装配任务,迅速下发部队,受到八路军前总首长的表扬。

为了研制出更多更好的无线电台,王士光带领全股30多名同志反复研究试验,确定以改进后的电子交连式线路组装电台发信机。在装机过程中,他们不断改进工艺,提高技术质量,1945年上半年小批量生产后定型,成为当年八路军自制的高性能无线电台。它的体积只有枕头包大小,重量只有7公斤,功率达到15瓦,比当时的日式、美式电台还实用。解放战争中,从上党战役到平汉战役,从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到决战淮海,从解放南京到进军大西南,这种电子交连式电台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电子交连式电台小批量生产成功后,王士光组织大家扩大生产,相继生产近百部,为解放战争初期的防御作战提供了良好的通信装备,受到刘伯承司令员的高度赞扬。

1947年3月6日,时为华北局机关报的《人民日报》第二版,以《人民的电机工程师——模范电讯技术员王士光》为题,作了特别报道。文章的开头这样写道:“一提大王,在电讯人员里都是熟悉的,而且大家都存在着对他的佩服和亲热。这个称呼的来源,由于他是个高大的个子,加上他的稳重与和蔼,如果我们一语双关地说他是这个区域的‘电机工程大王’大概是不过分的。”此后,人们在“大王”的称呼之前,又加上了“电讯”二字,“电讯大王”的名声越来越大,在太行山区越传越广。

晋冀鲁豫的有名英雄

人们大都知道,通信兵是无名英雄。当年的王士光是个例外,因为做出了特殊贡献,他成为有名英雄。

1945年12月,为加强对国统区和解放区的语音宣传,晋冀鲁豫军区滕代远副司令员请示刘伯承、邓小平后决定,将当时缴获的两部美造中长波飞机导航电台改装成中波和短波广播电台,由军区通信联络分局局长兼政委林伟组织,机务工程主任王士光具体负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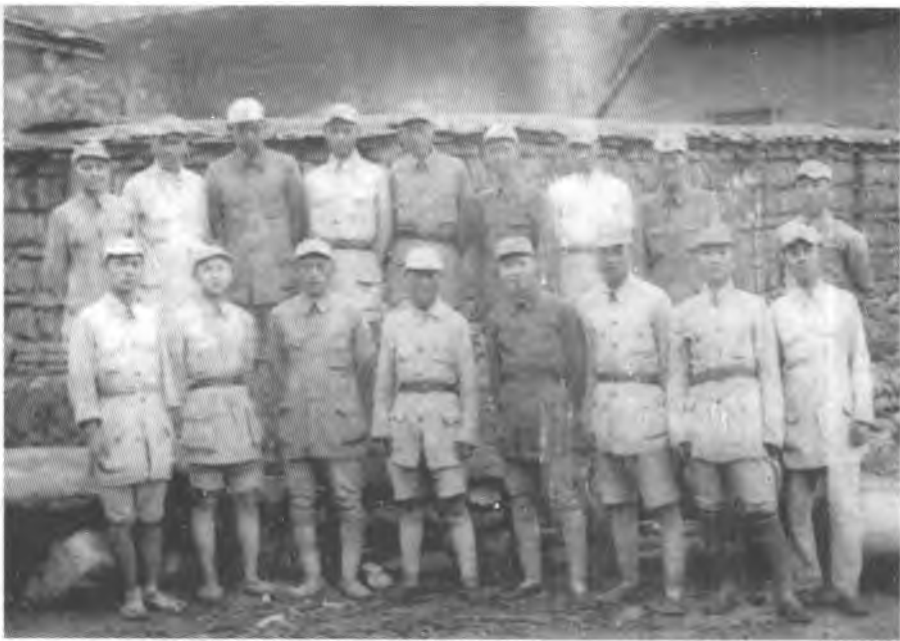
接受任务后,王士光首先对导航台进行了认真详细的分析,查阅了大量资料,搜集了一切可以利用的器材,做好了设计改装的准备工作。从1946年2月开始,他和战友们在河北省涉县的沙河村,开始了夜以继日的改装工作。盛夏季节,骄阳似火,炎热而又潮湿的气候使机器零件性能不稳,电路经常发生故障。在调试最紧张的时候,王士光病倒了,痢疾和疟疾两种病魔同时侵入他的肌体,一病就是两个多月,茶饭难进。一米八的大高个,病得弱不禁风,走不动、站不稳。同志们劝他回去休息,他却笑笑说:“这没什么,

如果身体有病就停止工作,那算什么革命!”就这样,王士光躺在一张小床上,始终坚持在现场指挥调试。

1946年9月1日,邯郸广播电台正式开播。人们奔走相告,激动异常。王士光用他不太标准的国语,播完了第一条新闻。霎时,红色电波飞遍中华上空,真理之声响彻神州大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发来祝贺的电讯,前线将士传回激动的电文,国统区民众寄来热情的信件……一时间,邯郸广播电台成为全国的“热门话题”。

1946年11月,国民党强行召开一手包办的“伪国大”,彻底关上和谈大门。12月,晋冀鲁豫军区接到中央指示,要求一旦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撤退,要邯郸台做好接替。受领任务后,王士光通宵达旦地工作,先用两天两夜完成了原邯郸短波台的调整,做好了随时接替延安台的准备。随后又连续奋战20多天,将邯郸中波台改装为短波台,既准备接替延安台后邯郸台还可同时播音,又准备接替延安的电台一旦发生故障,可以迅速改用邯郸台代替。

1947年3月,国民党集结25万大军,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19日,党中央撤离延安。20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改称“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用预先设置在陕北瓦窑堡的备用台接替播音。在这段时间里,王士光和他的战友们每晚7点坚持



1942年春,晋察冀军区电台台长和机务人员合影,后排左3为王士光

收听陕北台的播音动态。3月29日晚7时整,陕北台没有出现,怎么办?当时既未接到上级指示,又没收到陕北台的稿件。如果等待中央的指示或收到稿件后再播,就会导致党中央的声音中断。“决不能让党中央的声音中断!”新任军区通信联络分局副局长的王士光果断地指挥开机,机智地反复播音:“陕北新华广播电台,XNCR,由于机器发生故障,暂停播音,明天再见。”30日晚7时整,在王士光的精心保障下,邯郸台正式接替陕北台。正当胡宗南在延安向蒋介石邀功请赏的时候,广播里又传来了“兄妹开荒”的前奏曲,“陕北新华广播电台,XNCR,现在开始播音……”接着是新闻,随后是其他节目。这使蒋介石大为恼火,也使胡宗南摸不着头脑。从此,“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在沙河村一直播音到1948年5月23日。它以铿锵有力的声调向世人昭示,一个崭新的中国即将诞生。

1947年8月,为表彰邯郸台成功接替延安台这一特殊贡献,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晋冀鲁豫中央局和军区政治部作出一项特殊决定:为王士光记特等功一次,授予“特等功臣”“锦旗一面”“人民功臣”银质奖章一枚。

电信工业的开路先锋

王士光同志一生都在跟电子器件打交道,那些林林总总、五颜六色的“小东西”,别人看来不起眼,但在他的眼里,却是心爱之宝。很多元器

件及其性能,他都烂熟于胸,如数家珍。在长期的实践中,他创造了一套独特的装配电台方法,被大家称为“士光装机法”。按照这一独具特色的方法,在新中国诞生前后,他组织生产了大批无线电台,成为新中国电信工业的开路先锋。

1948年5月,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军区合并组成华北军区,王士光担任军区司令部通信处副处长,仍然分管通信装备器材工作。这时,王士光手下已经“兵强马壮”,既有电讯器材厂、电讯设备装配厂,还有电讯技术实验室、电讯专科机务班。1948年秋,军委三局王诤局长来到华北军区检查通信工作。王士光在河北省平山县白沙镇第一次见到了被毛泽东主席誉为我军通信兵“开山鼻祖”的王诤同志,两人多次促膝长谈。王诤局长临走前交待王士光说,军委三局正准备接管天津的电信局和几个工厂,要他抓紧生产一批15瓦电台后赶往天津,参与接管各电信工厂,组织恢复生产,着手建立自己的电子管厂和元件厂,为发展新中国的电信工业奠定基础。为完成王诤局长的嘱托,王士光从此将主要精力转移到电子元器件和无线电通信装备的生产上面。巧合的是,后来王诤担任电子工业部(即四机部)部长时,王士光则担任副部长,两人心心相印,肝胆相照,成为新中国电子工业的开拓者与创始人。

从1948年秋到1949年春,王士光组织指导有关电信工厂,相继生产两百余部电台和干电池,源源不断地送往参加战略决战的前线部队。通过这些自制通信装备,一道道命令和一个个捷报,穿梭于西柏坡和各大战场之间,奏响了新中国的开国乐章。同年8月6日,王士光参加中央军委在北平召开的华北电信会议时,受到朱德总司令的亲切接见。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我在东北军区司令部任通信处长,以主要精力支援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通信兵使用了数以万计的电台、电话机、交换机、发电机、被覆线等通信装备器材。其中,有从国内其他部队抽调来的,有从国民党军队和美军、日军手里缴获的,有从苏联买来的,还有我国自行研制生产的。据志愿军通信官兵反映,最好用的还是国产电台。体积小,重量轻,



1948年春,晋冀鲁豫通信联络分局副局长王士光和妻子女儿在阳泉留影

功率大,非常受作战部队的欢迎。当时我们都知道,这些性能优良的国产通信装备,大都是当时受军委通信部领导的电信工业局组织生产的。1951年初即担任电信工业局副局长的王士光,在其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1949年下半年,王士光赶到天津,先后参与接管了国民党官僚资本开办的12个电信企业。按照王诤局长的指示,迅速恢复生产。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后,部队需要大批通信装备和器材。当时,苏联为我们提供了几种通信装备,但频率范围窄、笨重,使用的电池需要用汽油发电机充电,不符合我军作战需要。王士光坚决主张走“自力更生”的道路,与王诤局长不谋而合。随后,经中央军委同意,根据国情和部队的需求,开始自主研制通信装备。在王士光等同志的组织指导下,12个电信企业的4000多名职工,不分昼夜地研制生产,用心血和汗水浇灌着新中国电子工业的“幼苗”。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先后出厂多批国产通信装备。其中有天津无线电厂生产的81型15瓦报话机、702型超短波步谈机、七管直流收音机、50瓦发信机;南京无线电厂生产的150瓦发信机、12管收音机、71型两瓦报话机;南京有线电厂生产的野战用电话机和交换机;重庆无线电厂生产的轻便手摇发电机;汉口电池厂和电工厂生产的干电池、组合电池;天津电缆厂生产的被覆线等。与此同时,王士光等同志还组织各电信工厂整修出几千部(台)战场上缴获的通信装备,及时运往前线,满足了部队的急需。

特别是71型两瓦报话机,由于体积小、重量轻、功率大、使用方便,深受前线部队的欢迎。电影《英雄儿女》中的王成,就是使用这种报话机,喊出了“向我开炮”这一震撼人心的豪言壮语。为了使前线将士早日用上71型两瓦报话机,南京无线电厂做出了突出贡献。王士光在回忆文章中说:“南京无线电厂的全体同志在志愿军的英勇事迹感召下,为了早日将71型两瓦报话机送到前线,克服了种种困难,仅用3个多月时间就研制出样机。为按时交货,装配车间工人和技术人员连续工作36小时不肯休息,保质保量地完成了任务。战后,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同志专程到南京无线电厂看望全体职工,表扬他们制造的71型两瓦报话机在朝鲜战场上立了大功。”



1948年10月,军委三局领导和华北军区通信处领导在河北平山县白沙镇留影:左起旷全吉、王子纲、王诤、钟夫翔、王士光

为解决部队的通信装备,王士光同志就像改装邯郸广播电台那样,总是拼命地工作。记得在我担任总参通信部主任期间,针对当时81型电台存在的问题,叶剑英同志在中央军委办公会上特别指示:作为我军主要通信装备的半导体81型15瓦电台,因烧管子问题严重影响战备,要通过会战解决这个问题。通信部应会同四机部共同研究解决。当时四机部分工王士光负责这项工作,他立即带领17个单位的55名技术人员,赶到陕西宝鸡组织会战,一住就是半年,终于使问题彻底解决。

新中国的电子工业是从通信装备起步发展起来的。从15瓦短波电台到通信卫星发射成功,从电子工业迅速发展到通信装备不断更新,无不倾注着王士光的心血。王士光后来虽然转到地方工作,但他始终竭尽全力为军队建设服务。他的崇高品质和重大贡献,将永远铭刻在中华民族彻底解放和国防现代化的丰碑之上!

(作者系原总参谋部顾问、总参通讯部主任)

(撰稿人:靳军民、赵志辉、魏天柱)

(责任编辑:赵友慈)

李正文 陈蕙瑛夫妇 的情报工作生涯

● 伊 里

在我做党史人物研究工作之前，很早就认识了这两位慈祥的长辈。李正文同志朴实儒雅，和蔼可亲；陈蕙瑛同志开朗直率，待人真诚。这对党内高级知识分子老夫妇，无论是住在原来段祺瑞执政政府旧址里的老楼，还是搬到高教部大院的小单元，都是乐呵呵地过着极其普通的生活，让人怎么也猜不到他们曾经是我们党内功勋卓著的秘密情报人员。我带着疑惑去问李正文同志，他笑着回答说：“要是你们都看出来了，那不早叫敌人抓起来了吗！”

一、苏联的座上宾与阶下囚

李正文，1908年8月31日，出生在山东潍县张庄村的一个贫农家庭。1916年，全家逃荒到东北四平街，靠亲戚资助和学业优异读完了小学、中学，考入东北大学经济系。国弱民穷、备受欺侮的现实及进步书刊的影响，使李正文萌发了爱国反帝的思想，积极投身于学生运动。“九·一八”事变后他流亡关内，就读于清华大学经济系。国家的危难使李正文热血沸腾，他于1932年1月毅然参加了中共领导的左翼作家联盟，很快担任了北平左联执委会理论部部长。1933年8月，李正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4年11月，国民党蒋孝先的宪兵三团在北平大肆搜捕进步人士，环境恶化，李正文被派往苏联学习。

1935年1月，李正文进入莫斯科近郊国防部无线电学校的情报工作研究班，他的苏联名字叫瓦夏。班上学员待遇优厚，主要课程有俄语、英语、马列主义理论，照相、无线电收发和修理、电报密码的规律，情报工作的组织、内容和方法，逃避敌

人追踪的技术，以及识别日本的军种、兵种和使用各种武器的知识。李正文大出意外，坚决要求只学原先讲好的政治理论，他不想搞情报工作，时刻盼望早日回到中国党内从事理论研究。

1936年夏，李正文调到马拉霍夫卡，继续在特别政治训练班学习。这时，苏联开始了血腥的肃反扩大化时期。同住的中国学员索尼不断诬告李正文：“每天在家看书，很少到城里去，这是不愿看见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光看共产国际1935年大会的报告，不看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这是不愿学习列宁主义的表现；逢年过节，谁劝也不喝酒，这是不要庆祝苏联成功；购买苏联公债和对西班牙捐款比别人多几倍，这是掩饰自己反动面目的假招子；”还造谣说：“瓦夏的母亲是日本人，又懂日文，一定是来破坏的日本间谍！……”

1937年11月下旬，李正文被送进关押重犯的鲁别克监狱。5个月后，苏联法院特别会议判他为“日本侦探嫌疑犯”，刑期5年。从布德里斯克监狱到靠近北极圈的齐必由劳改营，一年多的时间里，李正文写了60多封信寄给斯大林。他利用精通俄语和理论的优势，故意在信中引用斯大林说过的话：“托洛斯基认贼作父，糊涂蛋认友为敌（这句是他加的），只有布尔什维克才能分清敌友！”理直气壮地要求平反。他的执著终于有了结果，1939年9月，苏联当局正式宣布撤销对李正文的原判，无罪释放。

1940年5月，李正文出狱后被遣返回国，他历尽坎坷，好不容易于1941年元旦到达重庆。虽然他渴望回到中共党内工作，但还是服从了组织安排，担任共产国际东方部的情报员。

1941年6月中旬,阎宝航从孙科那里获得德国将于6月22日进攻苏联的重要情报后,亲手交给李正文,李正文立即报告了周恩来同志,同时转交苏联驻华武官罗申。这个关系到苏联和世界前途命运的情报,通过中共中央直接送到斯大林的手中。

随后,李正文被派往上海,专门负责收集宁沪杭地区日伪的军政情报。

二. 双重情报工作关系

李正文于1941年7月由重庆飞往香港,带着香港文化供应社上海分店经理的头衔,乘船进入日寇占领下的申城。他按上级指示,与自己的领导人尼克莱·伊万诺维奇接上了关系。这个干练的苏联特工开门见山地说:“首先,要搞好掩护职业,否则不仅站不住脚,活动也会受到限制。其次,要千方百计去找可以利用的社会关系,尽量去搞第一手情报。除了直接情报外,还要从大量日伪报刊中寻找有用的信息。给你半年时间,把工作网建立起来。”

他规定每月五号、十五号、二十五号是接头的日子,晚上7点在法租界某条马路上会面。如有特殊情况,可临时再约。分手时又严厉地警告李正文:“这里情况十分复杂,日本、国民党、汪伪政权及各大国势力都在互相角逐,一定要非常小心谨慎,避免暴露。不可以看进步报刊,特别是苏联社会科学书籍;不要搞武器、财物,更不要策动伪军起义;尤其不允许同其他组织发生横的联系。”

在尼克莱的领导下,李正文开始了他从未做过的危险工作。为了搞好掩护,他先后担任暨南大学附属补习学校和上海慈幼教养院的日文教员,还应聘去给原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外籍人士教日语,同时考入申报馆去做日文翻译。这些职业为他开展情报工作提供了保护和便利条件。

李正文发挥老黄牛埋头苦干的韧劲,到处寻找有用的关系。不久,通过辅仁中学的英语教员裘

维琳,发现了一个重量级人物——嵇显庭。他是汪伪政府立法院院长陈公博的大舅兄,有了如此的裙带背景,嵇显庭很快被提升为南京日汪大头目协调会议的秘书科长。每周五召开的日伪高层首脑决策会议,他担任记录和整理文件事宜。据裘维琳介绍,此人良心尚存,对日伪的前途不太乐观,一心只想借妹夫的势力多捞钞票。李正文立即向尼克莱汇报,尼克莱非常兴奋,痛快地拿出一大笔钱,指示李正文赶快钓上这条大鱼。

裘维琳按照李正文的策略说服了嵇显庭,他同意每周向他们提供情报。周末,李正文与裘维琳一起从上海乘火车到南京。为了避免暴露,李正文坐在不惹人注目的小茶馆里悠闲地喝茶,由裘维琳去找嵇显庭接头。第一次嵇显庭十分紧张,他匆匆把几张打印纸塞给裘维琳说:“本来会议记录我只印三份,一份送给日军司令部,一份送交秘书长,还有一份存档。这是我多打的。”裘维琳把一大包钞票留给他,嵇显庭顿时安下心来,表示愿意继续效劳。

由于车站检查严格,李正文决定亲自带情报回上海。火车站口,日本宪兵森严壁垒,拉着吐出鲜红舌头的大洋狗,对过往的中国旅客虎视眈眈。李正文把文件卷在当天的《大公报》里很随便地拿在手中,坦然地走向检票处。“站住,举起手来!”几个凶恶的宪兵围了上来。李正文顺从地抬起手臂,报纸几乎触到了日本兵的鼻子。宪兵从头到脚仔细搜查,还让李正文把鞋袜也脱了,唯独没有注意那张报纸。李正文顺利地回到上海,把情报



李正文和陈蕙瑛年轻时的合影

交给尼克莱。

经过几次往返，李正文发现车站有一条日本人的专用通道，一般不会检查。于是，他穿上讲究的西服，戴着金丝眼镜，冒充日本人走向那个特殊入口，还用日语跟守卫打招呼。卫兵以为他是哪个部门的长官，立即持枪敬礼，毫不阻挡。这样一来，日伪方面对华的军事行动、经济掠夺、文化侵略等计划，事先就被李正文掌握了。他不但在半年内完成了建立情报工作网的任务，还立下了特殊的功勋，受到莫斯科总部的嘉奖。

嵇显庭提供情报干得顺手，又能获取大量的金钱，积极性越来越高。除了日伪高层会议记录外，还把他得到的日寇扫荡苏北新四军、日伪联合行动对付根据地的计划，日伪顽的勾结内幕等其他情报，源源不断地送到李正文手中。看到这些对中国共产党和新四军关系重大的消息，李正文决定违反尼克莱的禁令，想办法与中共地下组织联系。他千方百计找到了苏北根据地的秘密通讯处，将情报寄到某县粮站，及时传递给新四军领导。从此，日伪的行动屡屡失败，敌人非常恼火，却找不出原因，只能大骂新四军“狡猾，狡猾的！”而陈毅却十分高兴，后来多次表扬了李正文。

李正文还是汪精卫参谋长唐莽家里的常客，唐莽把李正文当作不问政治的大知识分子，一个可心的听众，常常向他吹嘘自己消息灵通。李正文从唐莽和其他敌伪上层人物的谈话中，不断筛选出有用的情报。有一次，唐莽向他透露，某国府要人的姨太太正在为蒋介石、汪精卫牵线搭桥。尼克莱听到这个消息认为很重要，它说明日、汪、蒋有合流的可能。尼克莱对李正文说：“我们将检举此事，斩断这条黑线。”果然，以后再没有听说姨太太从重庆跑到上海了。

李正文还争取了日本友人德田恒夫，中央税警总队副队长李次白（队长是周佛海），顾祝同的驻沪专员张大同等人，或者向他提供日伪方面和国民党的重要政治、军事情报，或者准备率部投诚。尼克莱除了遗憾李正文本人没能打入敌伪高层外，对他的工作非常赞赏。

三.爱人——战友

李正文和陈蕙瑛是真正的爱人加战友，他们

的感情在一次次生死搏斗中不断地深化。2000年10月18日，陈蕙瑛不幸因病去世后，李正文非常伤心，不久也病倒了。在最后的这段时间里，李正文经常深情地说起与妻子共同战斗的经历。

上海东亚书社是知识分子喜欢光顾的地方，李正文也常去那里为香港文化供应社购书。很快，他注意到一位清丽脱俗的姑娘，看见她经常翻阅进步书刊，便主动上前与她攀谈。李正文儒雅的风度，渊博的学识给姑娘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她是上海震旦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二年级学生，叫陈蕙瑛。得知李正文通晓英、俄、日三国文字，陈蕙瑛便请求他当自己的俄语老师。通过频繁的交往，李正文发现陈蕙瑛不但思想激进，而且性格开朗，敢做敢为，很有点巾帼英雄的豪气，是很好的培养对象。在他的帮助下，陈蕙瑛进步很快。1942年初，开始为李正文传递情报，参加了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工作。他们之间的爱情也成熟了，于1942年夏天结为夫妇。

陈蕙瑛是浙江宁波人，1919年8月8日出生在汉口。她在武汉上完了小学、中学，喜欢阅读进步书刊，崇拜那些不怕牺牲的革命者，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非常痛恨，积极参加了“一二·九”运动。1940年9月，陈蕙瑛与几个女同学乘船一起到上海念大学。没想到船上的日本浪人想欺侮她们，陈蕙瑛情急生智，利用熟识的法国神甫解了围。类似的事情发生了好几回，陈蕙瑛都想办法化险为夷，于是同学们戏称她为“小诸葛”，把她当成了主心骨。

参加革命后，陈蕙瑛不但给李正文当交通员，同时以各种身份帮助作目标的工作。她机警灵活，落落大方，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还介绍李正文担任女子文理学院的日语教授，使他又多了一层有利的掩护身份，很快成为李正文的得力助手。

1944年以后，形势急转直下，伪政权风雨飘摇。中国实业银行的总经理刘景灏（上海滩的首富之一），除了向李正文提供敌伪情报外，还一再表示愿意为新四军捐献大量日寇控制的军需物资。几支伪军也准备投向解放区。李正文觉得自己返回中国党内的时机到了（共产国际已于1943年6月解散），就派陈蕙瑛到苏北根据地与组织联系。

当时日伪方面对新四军占领区封锁仍很严

密,到处都有军警、宪兵和便衣。陈蕙瑛假作回乡探亲,徒步从上海走到苏北。她克服了种种危险艰难,带着满脚水泡,终于找到了中共华中局城工部部长刘长胜,详细汇报了李正文的历史情况和工作,表达了希望回到中国党内的强烈愿望。刘长胜答应了李正文夫妇的请求,表示将派人到上海与他们联系。1945年9月,上海地下党领导张执一会见了李正文,代表组织亲切地对他说:“从现在起,你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了!”游子终于回到了母亲的怀抱,李正文激动万分。

随着国民党军事、政治形势不断恶化,更加紧了对国统区进步人士的镇压,不断传来我们的同志被捕、牺牲的消息。1949年春天,李正文因有重要情报,准备亲自送至上海局和中央联系的秘密电台。临出门时,陈蕙瑛拦住他关切地说:“老李,现在外面情况很糟糕,还是我先去看看吧!”李正文犹豫了,“放心,我的目标小,不会有事的。”陈蕙瑛打扮成太太模样,走出家门。

细心的陈蕙瑛发现电台二楼窗口的信号花盆有点倾斜,显然是有人重新放上去的,马上意识到可能出事了,她不动声色地赶回家报信。电台果然已被敌人破获,如果李正文贸然前去,定会陷入险境。现在必须马上把备用电台送到指定地点。长期在危险环境中战斗,他们夫妇早已配合默契,李正文深深望了妻子一眼,转身走出门去。

因为到处都是敌人的检查站,李正文找到国民党淞沪港口副司令、少将段仲宝(1949年初,由李正文发展加入中国共产党),要他帮助把电台送出去。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开车带着装电台的箱子直闯封锁线,终于顺利地到达了目的地。

蒋介石兵败如山倒,一些不甘心为蒋家王朝殉葬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纷纷想方设法为自己找出路。蒋介石嫡系一个军长的侄子,拐弯抹角找到李正文(当时担任中共上海局策反委员会委员),说他已经拉了四个军准备起义,要共产党给他一个名义。李正文敏锐地感到这是个骗子,立刻甩掉了他。不久,此人被特务机关逮捕,马上供出了李正文,还大献殷勤地保证一个星期内抓到李正文!

当时,陈蕙瑛也在策反委员会工作,负责领导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工作的地下党员。她接到在上海保密局工作的王月英的紧急通知,装作她的表姐进入这个阴森的地方。看到悄悄交给她的纸条,

那是打字员(我们的同志)录下的口供。陈蕙瑛马上通知李正文隐蔽起来。朱落红(国民党军长侄儿)又诱骗联系人不断打电话寻找李正文,统统都落了空。

一周过去了,朱落红穷凶极恶地带领特务到处搜捕“白头发老李”,审讯记录很快又落到陈蕙瑛的手中。李正文因为经历坎坷,头发早就花白了,陈蕙瑛帮丈夫染黑了头发,让他躲到相对安全的地方。1949年4月,李正文奉命撤离上海去北平。

四.共同策反老蒋、小蒋的亲信爱将

李正文回到中国共产党内以后,用教授身份作掩护,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领导爱国民主运动。1948年秋,根据形势的需要,中共上海局成立了以张执一为首的策反委员会,李正文担任委员,陈蕙瑛是机关党支部书记。

李正文把策反的目标瞄准了蒋介石的爱宠,国民党伞兵三团。这是一个全部美式装备的现代



老年时的李正文、陈蕙瑛夫妇

化部队,上校团长刘农峻,是蒋介石的亲信爱将。蒋介石早就准备调他们到台湾,充当自己贴身的御林军。在李正文和段伯宇(李正文领导下的中共党员,蒋介石军务局少将高级参谋)的积极工作下,1949年初,刘农峻弃暗投明加入了共产党。他们本来打算等解放军攻打上海时,控制飞机场,活捉蒋介石。可是台湾方面一再催促,虽然借口没有运输工具等不能开拔的理由拖延时间,但是蒋介石疑心很大,再不服从命令,必会生变。

1949年3月中旬,在宝山路的段仲宇公馆的小白楼上,李正文代表策反委员会宣布:“伞兵三团马上准备起义,乘船开赴解放区。现在组成起义临时党支部,书记周其昌(李正文派到伞兵三团的联络员),成员刘农峻、陈家懋(从陈蕙瑛领导的那个系统调来)李贵田(伞兵三团副团长)孟夫。”大家都很激动,立即分头准备。李正文还派航海技术员白力行,原“重庆号”军舰上的海员吴成纪去帮助他们控制轮船。

1949年4月,起义准备就绪。但是解放区连云港没有码头,如果乘军舰将无法靠岸。大家都急坏了,还是段仲宇借口遵照蒋介石的密令,送伞兵三团到台湾,硬从淞沪司令部调拨了一艘3000吨的大型登陆艇给他们。登陆艇载着三团的官兵、大批武器和银元开出了吴淞口,起初向南行驶。一到公海,刘农峻就下令掉头北上,开往连云港。起义非常成功,影响很大。蒋介石在台湾闻讯,气得暴跳如雷。4月18日,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传令嘉奖:“庆祝你们脱离国民党反动集团加入人民解放军的英勇举动,希望你们努力于政治上技术上的学习,为建设中国的新伞兵而奋斗。”

刘农峻后来担任了解放军空军伞兵师副师长,1960年以前历次国庆节阅兵,他都亲率我们的伞兵部队,雄赳赳气昂昂地通过天安门广场。

李正文又把目光对准了蒋经国的第一心腹,南京政府预备干部局代局长(局长蒋经国)预备干部总队队长少将贾亦斌。这个部队是蒋经国嫡系的太子军,而且担负着为新筹建的30个军配备干部的重任,既是小蒋掌握军政大权的基础,也是蒋家王朝赖以继续生存的依靠。所以蒋氏父子非常重视。

贾亦斌是个正直有血性的男子汉,对政府挑起内战、坚持独裁极为不满。这些对南京政府早已

失望的国民党少壮派高级将领,经常聚集在南京干河沿109号贾亦斌的家中,分析形势,讨论出路,最后决定设法寻找共产党的领导。通过段伯宇,贾亦斌和李正文建立了单线联系。

李正文与贾亦斌经常在小白楼碰头,研究部队投诚的问题。贾亦斌对李正文印象很好,真有点相见恨晚的感觉。不久,他就提出了入党申请。1949年2月,组织上批准了他的请求。贾亦斌更加积极地准备起义,由于内部有人告密,蒋经国叫他去浙江溪口向蒋介石述职。此行凶险莫测,可是如果抗命,起义即将流产。贾亦斌与李正文商量后还是毅然去了。由于准备周密,沉着应付,老蒋和小蒋很快放他回来,但却撤销了他预备干部总队队长的职务。

1949年4月5日,浙江嘉兴火车站一家药店门口,李正文与贾亦斌碰了头。他们坐上了南湖揽客的游艇。贾亦斌汇报说:“情况紧急,我的卸职交割不能再拖了。如果现在不起义,就没有机会了。”他热切地向李正文要求:“整个预干总队都发动起来了,除了几个反动军官外,都表示拥护我们,请组织批准我马上起义!”

虽然原来计划等解放军渡江时,贾亦斌里应外合反戈一击。但是现在情况有变,太子军的倒戈,将会极大地动摇国民党内的军心、人心,政治意义重大,所以组织上考虑了提前起事的问题。李正文紧紧握住贾亦斌的手,代表策反委员会同意了他的计划。

4月12日,贾亦斌带领4000王牌太子军,英勇地宣布起义了。南京政府内部一片慌乱,蒋介石咬牙切齿,大骂儿子用人失察,立即调集数十倍的重兵,天上、地下围追堵截,还悬赏50000大洋要买贾亦斌的人头。起义军在贾亦斌等人的率领下拼死奋战,终因寡不敌众被打散了。贾亦斌身负重伤,被当地游击队和群众救回解放区。

李正文这时已去北平,但心里一直牵挂着贾亦斌。听传言说部队被击溃,贾亦斌可能已死,非常悲痛。当他随南下大军回到上海,在小白楼意外地看见贾亦斌时,两个生死战友激动地拥抱在一起。

为了获取国民党绝密的江防计划,李正文给策反过来的海军部少将办公厅主任金声打电话。金声非常欣喜:“我可盼到你来了!”李正文坦然

地走进戒备森严的海军部，金声对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真是胆大包天！这儿你也敢来！”又向李正文介绍了海军部长桂永清的机要秘书游侠。听了李正文的要求，两人都笑了，金声说：“你算找对人了！”他们同意把国民党的军事布置画成地图交给李正文，帮助我军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国。当天，他们就给了李正文一些重要的书面情报。怕路上遇到意外，双方约定每周在上海海军宿舍碰头。

李正文拿到这些绝密的军事情报，立刻交给张执一。张执一非常兴奋地说：“这些情报太宝贵了，是万两黄金也买不到的！”解放后，张执一见到李正文，又说：“解放军之所以能顺利渡过长江，金声和游侠是有很大功劳的！”

为了减少解放上海的阻碍，李正文从副市长那里搞到了上海城防图。可是，城里到处戒严，满街的警察、宪兵、特务和军队，怎么送出去呢？陈蕙瑛对丈夫说：“这好办，就交给我吧！”她提着皮箱坐车出城去了。路过关卡，警卫见陈蕙瑛像个老实巴交的家庭妇女，这样的人每天来来往来的很多，她又有通行证，就不太注意了。偶有检查，见箱子面上不过是小孩儿披风等旧衣物，更没有了兴趣。陈蕙瑛顺利地进入解放区，从披风底下拿出上海城防图交给了组织。

李正文夫妇还策反了蒋介石装备最精良的重型工兵第四团上校团长王海峤，驻防浦口的陆军少将师长李西开，江苏省保安总队少将总队长齐国，国民党少将参谋长宋健人，淞沪警备司令部作战科长刘泉溪等国民党将领。同时，把中国海关副总税务司丁贵堂，资源委员会秘书长杨志信，《大公报》负责人王芸生，国民党立法委员、上海中国建设服务公司理事长王良仲，国民党中央委员、复旦大学校长章益等在社会各界有影响的人物也争取过来，为中国共产党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五.叶利钦颁发的奖章

1995年11月1日，北京俄罗斯大使馆内喜气洋洋，正在举行隆重的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的酒会。俄罗斯驻华大使罗高寿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祝酒词，高度评价了这场拯救世界

和人类的正义之战。还郑重宣布受总统叶利钦的委托，授予阎宝航和他在抗战期间领导的地下工作者阎明诗、李正文同志“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奖章，表彰他们为国际反法西斯斗争所作的杰出贡献。场内爆发出热烈的掌声，阎宝航的子女阎明复、阎大新扶着激动不已的李正文，接受了这份殊荣。

当年斯大林及时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两条渠道，获得了德国即将进攻苏联的信息。虽然将信将疑，他还是下令做了一些准备。1941年6月22日清晨，德军190个师团突然对苏联发动“闪电战”时，这些防御性工作减少了苏方的损失。日本投降前夕，李正文把日寇的政治打算、军事布置、经济状况，特别是关东军的动向，源源不断地向苏联情报部门报告，为苏军进入东北对日作战，彻底战胜日本法西斯，立下了汗马功劳。

1995年11月3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叶利钦总统授予阎宝航、李正文等中国同志“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奖章的消息，还说“罗高寿大使认为，这两件事提前向苏联通报德军进攻苏联的准确日期，在苏军对日作战前，提供了关东军在东北的详细军事情报”将载入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史册。”

李正文、陈蕙瑛解放后都在教育系统担任领导工作，为改革旧的教育方法和制度，建立、发展新中国的教育事业，殚精竭虑，做出了优异的成绩。可是，就因为他们曾经是党的情报工作者，在反右斗争和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了“身份复杂”、“外国特务”等不实之词的诬陷、打击。

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李正文和陈蕙瑛重新焕发了青春。李正文担任了教育部政治思想教育司的负责人，陈蕙瑛承担了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的主要领导工作。

党和国家没有忘记他们的功绩，1997年9月，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主管中央组织部的胡锦涛批示教育部，说李正文是有功的老同志，要很好地对待他。

李正文于2002年2月20日在北京逝世，胡锦涛同志的秘书打电话代表胡锦涛向他的家人表示深切的哀悼。上海安全局所赠的书法条幅：“疾风劲草，青史英豪”，正是他们夫妇一生的真实写照。

（责任编辑 叶方）

《辞海》编纂先驱舒新城

● 黄飞英

中国著名教育家、出版家、辞书编纂家舒新城（1893—1960），原名维周，湖南省溆浦县人，出身于佃农家庭。自幼聪慧过人，读书过目不忘，一生刻苦自励，自学成才，1912年曾进入常德师训班免费学习；1914年，因他没有上过中学，于是就借用族兄舒建勋的中学毕业文凭，以优异成绩考入岳麓高师，即湖南省高等师范学校。入学后不久，有人揭发舒新城冒名报考事，幸亏著名教育家、校长符定一慧眼识英才，当他得知这个穿着简朴的学者型的年轻人舒新城因家境贫困没有念中学，而是靠他勤奋自学、博览群



舒新城

书完成中学全部学业并超过当时中学毕业生的学历水平时，倍加赞赏，不但让其继续上学，而且还特别准许他恢复本名“舒新城”。果然不负众望，舒新城在湖南省高等师范学校以优异成绩毕业。

舒新城毕业后曾任中国公学中学主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对道尔顿的教学制度有较深的研究，并著有《道尔顿制研究集》。1925年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宣传部长兼《中国青年》杂志主编恽代英介绍，投身于出版界，在中华书局从事著译工作，1928年起负责主编《辞海》。1930年任上海中华书局编辑所所长兼任中华书局图书馆馆长。

舒新城在主持《辞海》（1936年版）编纂工作时对编辑人员要求十分严格，因为这是关系

到百年大计、造福子孙后代的繁重浩翰工程。他把搜集新词列为工作重点，要求每个编辑人员要尽可能地遍阅新书报，与国民政府出版检查官们巧作周旋。1936年有人提出涉及政治条目应尽力求简，而且不收“九一八”、“上海事变”、“塘沽协定”等条目，以不得罪日本人为“上策”。为此，舒新城严加驳斥：“敌人强加我之事实，竟默然不提，未免太不近人情！”他始终坚持热爱祖国、忠于人民、忠于史实，以“春秋笔法”对有关涉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条目，一一如实作了叙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舒新城任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主任、辞海编辑委员会第一任主编，主持对《辞海》（1936年版）的修订工作。1959年舒新城提出重订《辞海》与影印《申报》，曾获得毛泽东等领导同志的赞许，并由他担任辞海编辑委员会主任委员。舒新城先后被选为政协上海市委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舒新城主要著作有《中华百科辞典》、《近代中国教育史》、《道尔顿制研究集》等四十余种。

舒新城主编《辞海》，默默耕耘三十四个春秋，毕生的精力与心血全部倾注在这部巨著里，造福于后代，真可谓是“功德无量”。一直到临终前，他还在病床上逐条审读《辞海》试写稿，并写下了几十条书面意见，为宏篇巨著《辞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责任编辑 吴思）

胡适四次营救陈独秀



胡适

赵映林

由于政治主张相悖，陈独秀、胡适分道扬镳，但这并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的友谊。陈独秀一生遭绑架一次，四次被捕。遭绑架那时他与胡适还不相识。后来的四次被捕，胡适均不遗余力地积极营救他。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因散发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北京市民宣言》被捕。胡适利用在京的安徽名人与时任警察厅长的皖人吴炳湘的同乡关系，去打通关节。他给张东荪主编的《时事新报》写文披露陈独秀在狱中受到的非人道待遇。在《每周评论》发表《威权》一诗，抨击北洋政府无视人权的专制统治。在强大舆论压力之下，北洋政府不得不释放陈独秀。

1921年10月4日，陈独秀在上海法租界被租界当局逮捕。胡适知道后请蔡元培向法国驻华使馆交涉，设法救出陈独秀。那天，胡适越想越气，在日记中写道：“法国人真不要脸！”随后胡适与蔡元培领衔，知名学者、教授签名，给上海法国领事馆发电报，要求立即释放陈独秀。经各方人士合力多方奔走，法租界最终以“罚洋100元，销毁查抄书籍”结案，陈独秀获释。

胡适第二次营救陈独秀时，陈已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同胡适在政治上已是“道不同，不相与谋”了，可胡适只以友谊为重。

1922年8月9日陈独秀又在上海法租界被巡捕房逮捕。胡适在陈被捕的第二天晚上得到消息，便找到李大钊商量营救的办法，又找在外交部任职的顾维钧，请他无论如何要为陈案出点力。胡适还软中带硬地暗示法国公使不要惹出思想界的“排法”情绪。胡适声明：“我不是为独秀一个人的事乞援，他曾三次入狱，不是怕坐监的人；不过一来为言论自由计，二来为中法两国国民间的感情计，不得不请他（指法国公使）出点力。”顾维钧不敢怠慢，即派刘秘书到法国公使馆疏通。19日，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罚陈独秀400银洋了结。

陈独秀于1929年被中共开除出党以后，仍坚持反国民党政府的立场，以致国民党当局不惜悬赏万金缉拿他。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公共租界被工部局逮捕后，就被移交给国民党政府。国民党开动所有的官方宣传机器，竭力主张“迅予处决”。胡适不顾压力，一方面联合好友翁文灏、丁文江、傅斯年、任鸿隽等学者名流联名向国民党当局请求将陈独秀一案由军事法庭移交民政司法审判，好使案子公开化，请律师申辩。另一方面，他请私交笃契，时任外交部长的罗文干与国民党上层人士沟通联络，并与蔡元培、段锡朋（国民党中央执委，胡、陈在北大的学生）等磋商请有名望的律师为陈出庭辩护。

胡适为了扩大陈案在社会上的影响，引起公众的关注，给国民党造成压力，他利用讲学之机，四处宣传陈独秀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贡献，大讲特讲民主与法治，唤醒国人监督政府，保障人权。他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成立大会上致辞时，强调说，我们成立此会的目的有三：（1）帮助个人；（2）监督政府；（3）彼此了解法律习惯的应用。在会上他大声疾呼，这次当局要杀陈独秀，我们定要营救他。

1937年8月，胡适在赴美前夕，给当时的行政院长汪精卫去信，请汪出面同蒋介石商谈，释放陈独

秀。8月19日,汪精卫给胡适回信表示请司法院设法开释陈独秀。4天后,陈独秀获释出狱。陈在狱中时,胡适多次前去探视。陈感动地说:“此次累及许多老友奔走焦虑,甚为歉然。”胡适对陈独秀的友谊,使陈颇有鲁迅说的“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的感叹。

晚年,陈独秀避难四川江津,贫病交加,胡适曾联络安排陈、独秀去美,因陈不肯而作罢。

胡、陈之间的关系,说到底既有胡适重友谊的一面,更有陈独秀政治思想回归趋于与胡适一致的一面。胡适在给陈独秀的一封信中说:“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上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为老朋友者,正因为你我脑子背后多少总还有一点容忍异己的态度。”陈独秀晚年政治思想向早期回归。胡适不满无产阶级专政,不赞成马克思的阶级斗



陈独秀

争学说,一生鼓吹民主、自由,容忍异己。陈独秀出党后,思想大变,承认“民主主义乃是人类社会进步之一种动力”。他说,那种把“民主主义看做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是一种“最浅薄的见解”。在《无产阶级与民主主义》一文中,陈独秀批评道:“许多浅薄的老布尔什维克党人总是拿无产阶级独裁来和民主主义对抗”,“斯大林不懂这一点,抛弃了民主主义,代之以官僚主义”,批评苏联是官僚国家。陈晚年对民主的认识与胡适无有大区别,

其对苏联非民主经验的认识是非常深刻的。陈说:“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斯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斯大林倒了,会有无数斯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联系邓小平的相关讲话,今天读来仍不失其现实意义。

(责任编辑 吴思)

按需出版 征稿

各位作者:

我公司——中国版协国际合作出版促进会下属北京文苑文化发展公司在本刊前一期发出“按需出版”征稿广告后,得到大家广泛的热烈反响,纷纷来电话询问有关问题。为便于各位了解,更好地把自己的作品流传于世,现将有关问题集中答复如下:

1,按需出版作为一种新的出版形式,主要解决印数在1000册以下的图书出版困难,一般超过1000册的图书还是应该走传统出版的路子(我公司也可为作者寻找其他出版社以传统出版方式出版著述。比如为企业、各级机关政府部门及负责人在新华出版社等出版专著)。

2,按需出版主要内容适合于:

- 专业性强、市场无法大量销售的图书;
- 各类论文;● 影视剧本;● 丛书、少量印制的宣传画;
- 个人自传、家庭、家族需要保存、传世的专辑、画册;
- 单位自用,由于量少而用传统印刷无法解决的图书;
- 任何小量出版的图书。● 旧的断版图书作者再按照需要的印数少量重印。

3,按需出版采用的资金投入是自费解决的。费用收取标

准:32开内文每一面黑白页0.125元,彩色页2元;封面彩色每个5元,黑白每个1.5元(均包括纸张)。装订费:胶订一本10元,骑马订一本2.5元。

4,按需出版的稿件内容文责自负,但不符合我国现行法规的不能出版。可以分为有书号和没有书号两种,没有书号的不能作为销售。也就没有定价。可以作为留世或赠送。有书号的比没有书号的在费用上增加6000元(一次性,包括CIP数据和编辑、三审费等)。费用的文字基数是20万字,每增加一万字加收100元编辑费。

5,按需出版的用纸:黑白页是70或80克胶版纸,彩色页是128克铜版纸,封面平装是157克铜版纸,精装另计。其印制质量是上乘的,完全可以放心。

6,出版周期:没有书号的图书15天左右,有书号的图书2~3个月。有书号的图书需要签订出版合同。

7,按需出版需要作者提供齐、清、定的稿样一份和光盘或软盘(包括内文和封面设计,录入排版采用的软件基本没有限制,凡国内现行的均可)。如是手写稿则另外收取录入排版费,一般每一面4元(32开),校对费每千字每校次1元(负责3个校次)。封面设计如委托我方负责,一本书的设计费为800元。

8,按需出版仅解决由于印数少而不能出版的问题,其优点是即需即印,总是新书,零库存。在印数上避免了浪费,资金上可分期投入。

我公司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蓟门里小区北一楼5-203A座,邮编:100088,电话:010-62359410,联系人:张三杰。

张伯苓与张学良的忘年交

● 申泮文

一.一次震撼心灵的讲演

1990年解除幽禁之初，张学良和夫人暂时留住台北寓所休养，是年8月中在寓所接受了日本NHK广播协会记者的专访。采访的详细报道于12月6日发表在日本《产经新闻》上。12月17日我大陆许多日报均有转载，不须赘述。

在采访当中，日本记者突然向张将军提问：“先生在年轻时受谁的影响最大？”张将军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是张伯苓先生！”接着张将军回忆了早在1916年他还是一位年仅16岁翩翩少年的时候，在故乡沈阳聆听了张伯苓先生的一次讲演，张伯苓的讲话十分感人，使他内心受到强烈的震撼。

1916年10月底，天津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应沈阳基督教青年会的邀请，来到沈阳讲学，在沈阳青年会对青年教友作了一次讲演。讲题是“中国之希望”。这时张伯苓年届40，正当壮年，办学有成，他创办南开中学已满12周年，积累了丰富的对青年进行教育的经验。以他口若悬河的天津话和善于鼓动的激情，打开了青年听众的心扉。掌声一次又一次地震撼了讲演大厅。

鬼使神差，谁也不知道在台下听众席中有一位显赫人家的子弟，东北三省督军大帅张作霖的16岁公子张学良。此时的张学良正是一位享受优越生活无所作为的富家纨绔子弟，前来听讲只是由于慕名张伯苓的办学业绩，同为基督教教友，抱着好奇心来猎奇的。但在他当时的二八年华，正是青年人憧憬未来征程，为国家和社会的前途踌躇苦闷、思想多变的时期。张伯苓讲到国民对国家的责任时讲出了一句语惊四座的话：

“中国不亡吾辈在！”在张学良的头脑中引起了震撼。张校长讲道：“每个人都要自强，只要人人有了自我，中国就亡不了。我们必须有这么想的气概，不管人家怎么说，自己要有这种信念！”这几句话对张学良竟然丝丝入扣，震撼心弦，对他起到了拨雾指迷的作用。

张学良听了张伯苓的讲演词，认识到自己不应该继续沉湎于游乐、做父亲和家庭庇护下的公子哥儿，而是男儿当立志，应该能为国家和社会做些有益的事业。张伯苓的声影在张学良的头脑中深深打下了难忘的印记。

二.抗日救国的共同理想

1927年，张学良在奉军中已升任高级军官，人称少帅，受命主持华北政务。为对张伯苓表示尊重，聘请张伯苓出任天津市市长。张伯苓以不愿参与政治为由，婉言谢绝了。

是年9月，张伯苓为警醒国人，揭露日本对我东北地区的侵略意图，亲赴东三省考察，得到张学良的妥善关照和安排。返回天津后，于11月在南开大学建立了“满蒙研究会”，后改名为“东北研究会”。该会建立伊始就得到张学良的大力支持。张伯苓多次致函张学良，介绍办会宗旨和工作进展情况。1928年1月派人持函往见张学良，邀请他担任“东北研究会”名誉董事。张学良欣然接受邀请，并向该会捐助银元500元作为该会研究经费，对该会的活动倍加赞许。

这年4月，张伯苓偕“东北研究会”总干事傅恩龄再次赴东北三省调查研究，月余返校，也都受到张学良和东北官方的诸多优待。张伯苓根据调查所得，依东三省的丰富自然资源、经济、人

文、地理等方面,积累了许多资料,发表了许多调研报告并且编著了一部《东北地理》,在南开中学开班授课,教育学生认识广大东北地区对祖国建设事业的重要性和日本的侵略所造成的危机。这些工作后来都引发了日本侵略者的忌恨。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因日本人有杀父亡家之仇,抗日救国的决心强烈,张伯苓担任了天津市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主席,也是坚决主张对日抗战的。老张小张的共同抗日救国理念,使他们之间更加互相支持,在他们的忘年交之中增添了诸多传奇色彩。

三.张学良支持张伯苓办南开大学

1928年12月,张伯苓赴欧美考查教育,取道沈阳去欧洲。由于张学良对张伯苓改变自己人生观的那番讲演,一直怀念有加,对南开大学的办学时有关怀。对张伯苓的到来深表欢迎,曾两次邀请张伯苓“欢谈”,对张伯苓“以半百之身,远涉重洋,努力于教育之发展”,表示十分钦佩,并决定向南开大学捐助银元20万元,作为学校发展基金。张伯苓此次欧美之行,尽历英、法、意、瑞士、美、日等国,对各国之教育进行了考察,次年9月回国。

1930年,张学良30岁,被蒋介石提升为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显赫一时。这年秋天,受张学良东北军控制的天津警备司令部将小站营地约千亩稻田划归南开大学经租,租金作为南开学校办学经费。

12月10日张学良偕夫人于凤至和随从人员,分乘8辆小汽车,浩浩荡荡,开到天津八里台南开园,对南开大学进行一次视察访问。张伯苓校长在文科楼秀山堂的礼堂内,召集全校师生,为张学良一行举行了盛大欢迎仪式。据媒体报道,张学良对全校师生发表了“情词恳切的训词”,受到热烈欢迎。他在发言中再一次提起14年前张伯苓的讲演,情绪激动地说:“予之有今日,张校长一言之力也”,又说:“我之所以有今日,实亦南开之赐!”

四.张伯苓帮助张学良办东北大学

张伯苓对张学良的热心于教育事业和体育事业也全力给予帮助。张学良在沈阳创办了东北大学,自己兼任校长,但缺少执行经常校务的得力助手。南开大学第二班毕业生宁恩承,是张校长得意门生,从英国留学归来,正好也是东北人。张伯苓遂推荐宁恩承到东北大学出任秘书长,执行校长职务。谆谆嘱咐宁恩承说:“汉卿有求于人的困难,咱们应该帮助他解决这个困难。”全力支持宁恩承在东北大学大胆工作,迎难而上,革故鼎新,整顿校务,取得了成绩。与此同时,张伯苓本人接受张学良聘请,兼任东北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多次应邀赴沈阳指导工作,帮助改革和制定建设方案。又曾派遣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和体育课主任章辑五等人先后去东北大学帮助工作。此外,张伯苓还割爱把自己的校务得力助手南开四校事务主任孟琴襄借调给东北大学一年,帮助东北大学整顿后勤工作。孟琴襄是张伯苓办学的四大金刚之一,是校务管理的行家里手,到东北大学担任事务部主任,带领员工辛勤工作,不久,校园就大变样:校园电灯亮了,马路平整了,下水通畅了,教工宿舍不再怨声载道了,工作一年下来,给东大节约了后勤经费20万元,誉满沈阳。由于东北大学多方面学习南开大学办学经验和校务管理经验,成效显著,所以沈阳传媒报道说:“南开精神已由白河之滨移来辽河之滨了!”

五.张伯苓精神左右西安事变

待到1935年,张学良受南京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及蒋介石的命令,驱师大西北,督率东北军和西北军,参加“剿匪”战争,在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口号驱使下大打内战。张学良出于良知,一向主张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同时也制约于部下东北军将领和士兵“打回老家去”的强烈要求,决心一试停止内战的努力。通过东北军内中共地下工作人员的联系,于4月9日毅然独自驾驶飞机飞抵陕北肤施,力图与中共代表接触,会谈抗日救国大计。当日傍晚,在一座天主教堂里,与中共代表周恩来会见了。

张周二入刚一见面握手,张首先对周说:“我和你同师,咱们可以说都是南开的人。”周恩

来一愣,说:“张校长怎么成了你的老师了呢?”张学良随即谈起如何受张伯苓启发,精神振奋,改变人生志趣的过程,然后爽朗地说:“我很感激张伯苓先生,我对他总是以师礼事之。”

历史总是会出现一些扑朔迷离的玄机巧运,谁能想到“张伯苓”这三个字竟会成为一次伟大变革的催化剂,给仍在春寒之夜凭空增添了许多温馨,给周张会谈增添了轻松和融洽,催生了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对张学良来说,从人生观转变、到促成全国团结抗日,可以说无不与张伯苓有某种联系。

会谈持续到次日清晨4时,双方取得了共识,周张握别时,张学良以私人款项2万银元相赠,回西安后又向红军馈赠了法币20万元充实红军粮饷。

酝酿中的变革终于以暴力的形式爆发了: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的军事领导人张学良和杨虎城以兵谏的形式扣留了蒋介石,通电全国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整个形势震惊世界,南京政府内部混乱了,分裂成两派。一派是以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为首的主战派,主张重兵进攻潼关、进犯临潼、西安。另一派是以宋美龄、宋子文和国民党元老为主的主和派,主张谈判调解,和平解决矛盾,解救蒋介石。

南京政府方面夙知张伯苓对张学良有影响,所以在诸多调解活动中,紧急电召张伯苓晋京,共商国是。张来京后,宋美龄和宋子文就央求张伯苓亲笔写信给张学良,这封信的内容未见外传,但可知不外乎是要求张学良以大局为重,悬崖勒马,释放蒋介石,和平解决危机。这封信派由国民政府行政院美籍顾问端纳飞西安面交张学良。端纳曾经做过张学良的顾问。随后两宋也联袂飞往西安,直接与张学良进行面对面的斡旋。

西安事变危机的真正解决,众所周知,是张学良邀请了中共代表周恩来到西安,与囚禁中的蒋介石会谈,为国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达成某种妥协之后才得以和平解决的。张、杨宣布释放蒋介石,中国渡过了一次难关。遗憾的是,张学良为表白自身光明磊落、肝胆照人,毫无一己之私,没有听从周恩来的劝阻,毅然跟随蒋介石回南京“认罪”,遭致终身软禁之灾。张学良不愧是一条英雄汉子,但从此从中国政坛上销声匿迹

了。

纵观西安事变的发生与和平解决,张伯苓的两位真假门生周恩来和张学良作用巨大,张伯苓像一条无形丝线,把中国近代史中的两位英雄人物联结到一起了。

六.张学良挥毫缅怀张伯苓 120周年诞辰

张学良于1992年移居美国檀香山,闭门谢客,颐养天年。在美的生活情况,传媒亦偶有报道,不需赘述。过去在东北大学做他的秘书长的宁恩承比张学良大一岁,也在美国做寓公,是汉卿家常来往的门上客,兼代为张汉卿家做一些秘书工作。1996年4月5日是张伯苓老校长诞辰120周年,南开校友总会准备在南开大学举行盛大纪念以缅怀他老人家的伟大教育功绩。校友总会先期致函宁恩承,请他婉求张学良将军为纪念张伯苓校长诞辰120周年题词。宁恩承照办,3月14日宁恩承寄来张将军的亲笔墨宝,端端正正五个大字“桃李满天下”。宁恩承在邮件中附言说:“兹奉上张学良题词,请酌放大装饰,以兹显著。汉公年老眼花,久不执笔,恐怕这是最后的墨宝矣!”

张学良将军于2002年在美国檀香山终老,享年102岁。张伯苓校长于1951年2月在天津病逝,享年75岁。(责任编辑 赵友慈)

敬告读者

因邮寄和装订成本增加《炎黄春秋》合订本的价格作相应调整,自2004年12月1日起调整的价格为:精装本(1999年—2004年)每年一册,每册75元;简装本(1999年—2004年)每年一册,每册70元。2004年合订本于2005年3月制成,价格同上。

敬请读者谅解。

汇款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收款人:炎黄春秋杂志社

邮政编码:100045 电话:010-68532048

我外公陆定一的生死恋

● 荒 坪

相爱于莫斯科

在外公陆定一的记忆中，总有一朵永不泯灭的红霞，一团光华耀眼的火焰。年轻的外婆唐义贞，就是那红霞，就是那火焰。

外公与外婆是在苏联莫斯科相识、相爱并结婚的。那时外公是以瞿秋白为团长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之一、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驻少共国际的代表。外婆则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外婆是来自长江之滨武汉的一位共青团员，于1928年初由党组织派来中山大学学习。

1929年12月的一天，外婆迈着轻盈的步子，走进了“留克斯”旅馆——外公下榻的地方，她的脸上荡漾着兴奋和幸福的神情——这天，是她与外公结为伉俪的日子。

1930年，共产国际提出要“刷新”中共代表团成员，外公回国，外婆则还在“医务训练班”培训。他们婚后第一次分离。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外公于1930年七八月间回到上海。外婆则是在当年9月底结束了在苏联的学习生活，于10月份回国，来到上海。外婆与外公在上海的小



陆定一

住，是他们婚后的所有岁月里相对稳定的一段“家居”生活。外公不无遗憾地告诉我：秘密工作的缘故，他与外婆结婚和婚后连合影也没有拍过一张。所以他拿不出一张他们合影的照片来。这成为外公的一件憾事。

一天下午，他们发现忽然有一个陌生的男人来到他们住地的前楼望了一望，一言不发就走了。他们警惕起来，不一会儿，这个男人又来了，并且带来一个人，一看，原来是周恩来同志。他们虚惊一场，赶忙让周恩来进屋。带周恩来的那位同志又出去了。周恩来坐着不说话，他们也不好问什么，怕隔墙有耳。大约一个多小时后，那位同志回来了，把周恩来引走了。事后才知道，是因为顾顺章叛变，周恩来组织党的机关紧急转移，在转移过程中，暂时没地方去，先到他们住地避一避。顾顺章只知道党的机关地址，不知道团的机关的情况，所以他们的住地倒是较安全些。他们为能掩护周恩来同志感到高兴。

1931年11月，外公与外婆进入中华苏维埃政府所在地——江西瑞金。外公担任苏区团中央局宣传部部长。这时，外婆被任命为药材局局长。一天，外婆突然接到外公从瑞金寄来的一封信。外公在信中告诉她：他又一次遭到王明路线的打击，被撤销了苏区团中央局宣传部部长的

职务,派往上海团中央做组织部干事。这是外公与外婆结婚以后的第三次分别。

一天,王明集团的要员找外婆谈话说:“你知道吗,陆定一逃跑了!”外婆平静地说:“我不相信定一逃跑回家。”后来外公经过一番艰难辗转,果然回到了苏区。这是他们婚后离聚生活中的第三次重逢,是经历了严峻考验后的刻骨铭心的爱的盛会。

断肠的生离

外公与外婆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分别,是在1934年10月。

这时,外公知道了长征的消息。外公的心倏地像铁砣般垂了下去,变得万分沉重:“义贞呀,你的处境将是非常非常困难呀!”而外婆在危难关头却没有一句泄气的话,反倒来安慰外公。

“挥手从兹去”,他们婚后五年中的这第四次分别,竟成了永诀!

大部队走后,外婆将三岁的女儿交给管理员张德万,委托他将孩子带到瑞金以外的乡村找可靠人家寄养。接着擦干眼泪,跟上了留下来的人们组成的队伍。

1935年1月28日,被围困在山坑的外婆和战士们与敌人进行了一场殊死战斗,终因寡不敌众,外婆被敌人逮捕,外婆知道:为革命献身的时候就要到了!

“再见已无期,惟有心相知”

关于25岁的外婆的死,贺怡是这样告诉外公的:“唐义贞生第二个孩子后不久,铲共团把她抓去了。唐义贞同志对敌人破口大骂。铲共团把她的肚子剖开,让她痛死。唐义贞烈士死的时候,满嘴是土,这是毛泽覃告诉我的。”

一份来自福建长汀县党史办康模生等同志对陈六的采访记录则说得更详细。陈六,长



本文作者(右)

汀四都人,1934年末至1935年初,曾经与外婆一起工作生活过,相处了一个半月时间,她是外婆惨烈就义的目击者。

外公当年在延安从贺怡口中知道了外婆牺牲的消息,这迟到的噩耗,使他的心碎了!最坏的事情发生了。我失眠半个多月。从此,不论是大喜事或大悲事,我都流不出眼泪来了。”

1985年,长汀县人民政府为唐义贞烈士立墓。在长汀县城西门罗汉岭瞿秋白烈士纪念碑一侧的山坡上,修建了唐义贞烈士的“衣冠冢”。外公亲笔题写了墓名和碑文。晚年,外公在《关于唐义贞烈士的回忆》中转述了外婆的口信后写道:

这一曲正气歌,表明了唐义贞烈士下定决心对敌宁死不屈,对党对人民赤胆忠心,以革命为重,以夫妻为轻的胸怀。她即使没有党籍,却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她信任和勉励我继续革命,我没有也决不会辜负她的期望……

外公没有忘记外婆的遗言,也没有忘记她的深情和相知。直到晚年,他依然称她是他的“最亲爱的亲人”。

结婚仅五年,分别却四次,

再见已无期,惟有心相知。

这是外公晚年怀念外婆而写下的。这是外公的悼亡诗,外公的《遣悲怀》!

(责任编辑 杜晋)

教育的传统资源

——《沙坪岁月》的启示

● 李冰封

刘鹤守先生主编的《沙坪岁月》一书是抗战时期重庆南开中学的校园回忆录。撰稿者是近两百位当时的老校友。他们的校园回忆录,生动表现了这所抗战时期大后方名校的整体形象,表现这所名校校长如何管,老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当年,作为美国总统罗斯福特使的威尔基,到重庆后,曾专程访问南开中学并发表演说。他回国后,曾写了一本名为《四海一家》(One World)的书,介绍了这所中学,并对张伯苓校长有着很高的评价。威尔基在演说中说:“像南开这么好的学校,你们中国固然很少,我们美国也不多。”六十多年过去了,威尔基这个中肯的评价,在中国,并未过时。那么,当年的重庆南开中学,对当今中国的中等教育,有哪些启示呢?依拙见,有如下九条:

(一)《沙坪岁月》一书显示,中国的中等教育,曾经拥有丰富多彩、内涵深刻的教育资源。现在,这种资源还没有充分发掘、研究和继承。

从19世纪末,中国出现新式的学校起,到上世纪50年代,国内若干名校,在办学过程中就不断积累了不少宝贵的教育资源,南开中学是其中的佼佼者。50多年来,我们的教育工作出现了不少失误,不少有识之士认为:抛弃了我们曾经拥有的资源,是其中较为重要的一种失误。

这种教育资源的核心是什么?我理解,应该是如何培养出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合格人才。这种人才,要既有公心,又有能力(即南开校训中指出的“允公允能”),能尽心尽力并称心如意地服务于社会。说得更具体一些,这种全力服务于社会的各类人才,要有完善的人格,科学的思想,健全的体魄,独立思考的能力和民主法治的素养。南开中学的一切教育活动,都是围绕着上述的培养目标来进行的。为达到上述目标,就必须:

把各科的学业教育和以上的培养目标完整地结合

起来,通过各种活动,有效地进行公民教育,主要教育学生要有独立的精神,民主的思想;注重体育,把体育作为增强学生体质、毅力和具备公平竞争素养的一个重要环节;通过美育,主要用艺术手段培养学生高尚的品性和情操……如此等等。

所有这些教育资源,实在需要我们结合当前实际,分科分目逐项进行深入的研究。

这里且举我国当前中小学语文教学状况为例,来说明研究和继承这种教育资源的必要性。

现在,我国语文教学出现的一系列严重问题,应该说,从上世纪50年代初“学习苏联”、在中学语文教学中搞什么汉语和文学分家时,就已经开始。以后,经过历次的政治运动,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问题就更加突出、严重,乃至实际上用政治课代替了语文课,在教学上采用“烦琐分析法”代替学生字、词、句及作文的布局谋篇等方面的基本功训练,且默认学生可以用抄袭或说谎的办法来学写作文,实际上取消了正常的作文教学,从而使学生语文水平急剧下降。到上世纪70年代末,文化大革命刚刚过后,在吕叔湘等先生领导下《中国语文》杂志曾经发动关于语文教学的讨论,吕叔湘先生、叶圣陶先生以及国内许多著名专家和若干大、中、小学教师,都为此发表了一些有分量的文章,吁请社会及学校注意这件大事。

到上世纪90年代初,陆定一同志感到问题严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重要文章《中学语文教学新体系序》。李慎之同志读了以后,十分兴奋,当天就给陆定一同志写了一封信,其中提到:

“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一直到硕士生、博士生的语文程度越来越低。在内心深处,我一直以为这已是我们民族的一大灾难……而且随着教师学力的下降,水平还在下降”,“现在大学都说要振兴科学技术,要建设

精神文明,但是却很少有人注意,人的思维能力决定于少年时代的语文训练。而语文训练既决定于识字的多寡,也决定于语文所体现的知识和哲理……”“我在社会科学院工作十年了,按我们的体制,这是最高学府,是人才荟萃之地,但实际水平,实在不堪逼视,原因何在?不是资料少,不是交流少,而是因为基础差。基础为什么差?小学中学的语文就没有过关。”从我自己体会出发,我以为您按(指陆定一同志)提出的问题实在是太重要了,是真正关系到我们国家命运的问题。我认为,中国的语文教育所以下降到今天的地步,我们党的工作不能辞其咎。我希望您能继续领导我们来纠正自己的失误。”

现在又是十几年过去了,问题还是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中国过去的许多著名的中学,在国文教学方面,都有可贵的教育资源,为什么我们不去发掘和继承呢?

(二)办好一个中学,首先要有一个好的校长和一个好的领导层。就像重庆南开中学张伯苓校长以及喻传鉴主任所代表的那种好的领导层一样。

这些学校的领导,首先要真正懂得教育的理论和实践。要懂得如何对学校进行有效的管理,要有彻底献身于他所从事的崇高教育事业的决心和精神,要十分爱护学生。同时,还要思想开放,鼓励教师和学生都能自由思考,不使他们的思想封闭在某一个框框内,或束缚在某一根绳子上。还要使教育事业保持绝对的尊严和相对的独立性,不能无条件跟着上级指示打转转。

(三)严格择师,是办好学校的又一关键。进入南开中学的教师,都是经过严格选择的。选择的标准,首先当然要看学识。比如,教英语的老师,进南开中学前,喻传鉴主任就要面试他或她的语音水平,要求语音能够达到标准。其次要看人品,看够不够“为人师表”。有一位老师,刚到校不久,就用各种名义向学生借钱。经考察属实后,就被辞退了。此外,对各科老师都要求有很高的敬业精神,要对学生极端负责。重庆南开中学的国文教员,水平都高,对学生的作文,往往连标点也都注意到了。如,有一位同学作文,开头一句是:“远远的东方太阳正在升起。”陶光老师在作文评讲时说,这句话,可在“的”字的后面加个逗号,变成“远远的,东方太阳正在升起。”这就把整个情景写活了。同学们大为叹服,称陶光老师为“一点师”,以别于古人所谓“一字师”。重庆南开中学不论正科、副科,选择教师都一律要求有高水平,这就更难得。教历史的方慕韩老师,教地理的董心涵老师,教音乐的阮

北英老师,教美术的陈湘燕老师等等,都是当时第一流的各种专业课老师。教化学的郑新亭老师,化学课教得特好,许多同学考大学时,因受郑老师影响,而报考化学系或化工系……如此事例,不胜枚举。

(四)要让学生自由地接触各种思想,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使他们从小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

重庆南开中学每周有周会。周会由学校邀请不同政治派别、不同思潮代表的名人,来校作讲演。这种讲演,对学生了解时代、开阔思想,无疑起了很大作用。被邀的政界名流中,有周恩来、孙科、冯玉祥、何应钦、陈立夫、朱家骅、王世杰、蒋廷黻等,著名学者和新闻出版界名人有:马寅初、胡先、翁文灏、孙本文、卢前、冀野、范存忠、胡政之、王芸生、王云五等,著名作家有:老舍、曹禺、冰心等。总之,他们思想各异,主张有别,但南开中学都邀请他们来校演说,这体现了南开教育自由、开放的一面。

学校中还鼓励学生办各种各样的壁报,在壁报上发表各种各样的意见。且有中文和英文两种文字的。办壁报可以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更重要的,还是锻炼了学生的思维能力,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还举办各种辩论会,大都辩论时事问题,促使学生关心时局,培养学生的观察分析问题的能力和演说的口才。参加辩论会的,有



南开校长张伯苓

许多初中的学生,男生、女生都有。

以上说明,南开中学的办学倾向是主张自由的,是反对思想专制的。这是办学方向的一个根本问题。在办学中,一旦过分强调思想定于一尊,使学生不能在自由的环境中,对各种思潮进行鉴别择取,比较分析,势必造成思想上的僵化。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他们的后代,一旦思想僵化,不能正确地思考如何吸收各种思潮中的有益成分,那就必然极大地危害这个国家、民族的前途。且思想专制,绝对定于一尊,客观上一定反对“兼容并包”,这也最容易形成一种逆反心理,逆反心理形成高潮之时,这个国家、民族也就什么事都办不好了。

(五)南开中学的“公民教育”是德育的基础,德育的主要内容。南开的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这既是人生观,也是方法论。公民教育主要就强调“公”字,教育学生如何做人。而这种公民教育,也是让学生在各种实践中学到的,包括:社团活动,班级活动,创办壁报,举行辩论会,等等。

(六)真正把体育作为整个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目的是使受教育者能有健全的体魄,服务于社会。绝不能把体育作为表现某种虚荣心的手段。

有一种“三点半”精神,是南开教育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每当午后两节课上完,正是下午三点半钟。这时,同学们都要走出教室,进行体育活动。当然,也可以利用这时间,进行其他课外活动,如歌咏活动,排戏,办壁报,等等。不少校友到了老年,还感谢这“三点半”精神,使他们养成了经常运动的习惯,增进了身体健康。

南开的各种运动队都是业余的,队员没有任何特殊化的待遇。对队员功课的要求,也和其他同学一样,不及格的要补考,三门不及格的要留级,绝无例外。这就防止了因提倡体育运动而培养出一批“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扭曲了的所谓“体育明星”。

此外,体育还加强了学生对毅力的锻炼。由于强调要注意体育道德,也就教育学生从小要注意增强道德素养。这就不详说了。

(七)美育及课外活动。这本来是两个范围的事情,但由于有某些联系,就合在一起来了。

美育的教学活动,主要通过下列环节来实现:1、重视音乐课和美术课。不是把音、美作为可有可无的课程来看待,而是把它看作对学生品性和情操熏陶的重要环节来看待。因此,这两门课都有许多具体要求。2、适当增加一些有关美育内容的选读课。如教国文的孟志荪老师,在高二高三班就开了“诗词选读”。使学生能从中得

到情趣上的感染和美的熏陶。据现居台湾的南开中学校友齐邦媛教授回忆:“孟老师这些课程,绝不输于今日大学的课程”。当然,对学生教授这些诗词,并不只限于美学上的价值,更多还着眼于文学,着眼于如何理解一些古代诗词作品的艺术和社会价值。3、训练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养成爱美的习惯。要求教室和宿舍都要整洁,在学生宿舍中,要“考美”,等等。

美育还和许多课外活动紧密结合起来。如,组织歌咏队,排练大合唱,演话剧,唱京戏,组织欣赏古典西洋音乐会,等等。这都是在实践中体现美育。张伯苓校长有句名言:“不会玩儿的是傻孩子。”用“公”能“目标培养出来的人才,当然要有生活情趣,要爱玩儿,而且要玩儿得好,玩儿得痛快。在学生时代,这样的玩儿,不但不会影响学习,而且促进了学习。

如今,“应试教育”往往把我们一些学生,教育成既不会尽情玩耍,也不会认真思考,而只会死记硬背的“书呆子”。这些“书呆子”往往“高分低能”。

(八)允许并鼓励学生在思想上独立思考,鼓励学生思想上的自由,绝不排斥学校对学生的生活等方面的严格管理。其中包括了升、留级制度和考试制度的严格执行。

(九)最后,重庆南开中学成功的重要秘诀还在于:整个学校上下左右,都充盈着爱心。张校长、喻主任都全心全意爱护同学,所有授课老师也爱他们教过的学生。这样,学生们当然也爱他们的校长、主任和老师。同学和同学之间,更胜似兄弟姐妹,互相关爱。这是一个真正温暖的大家庭。经过了几十年的风雨沧桑,师生、同学之间的爱心依旧不变,这很不容易做到,但南开的校友们做到了。台湾大学的齐邦媛教授,是1943年重庆南开中学的毕业生,1994年写了一篇散文《寄英茂》(英茂是她的同窗好友),主要回忆她们当年的校园生活。文中提到:1968年,她到纽约讲学,想起要去看看相别二十多年、她敬畏的王文田老师。在王老师公寓的通道里,师生执手,一往情深,竟是泪眼相看。齐教授在文中还怀念已逝世多年的教国文的孟志荪老师。她写道:“不知他晚年生活如何?葬于何处?祭拜之心,常在念中。”齐教授提到,学生们对老师的这种感情,实际源于当年校长、老师对他们的关怀,源于“允公允能、日新月异”校训的启示,源于校长要用办教育的方式,实现强国富民的理想。

今日,仍然是这种爱心,把当年南开的校友们与母校及老师、同学拧在一起。这个现实,也启示我们思考一些办教育的根本问题。(责任编辑 吴思)

华盛顿拒绝王袍加身

● 付 阳

列克星敦打响了美国独立战争的第一枪。1775年6月15日,在各州代表参与的第二届大陆会议上,由华盛顿担任大陆军总司令的提名获全票通过。第二天,大会正式向他本人宣布了这一历史性的任命。在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44岁的他诚恳地说:“虽然我深知此项任命给了我崇高的荣誉,但我仍深感不安,因为我的能力和军事经验恐怕难以胜任这一要职。鉴于会议的要求,我将承担这一重任,并愿竭尽所能为这一神圣的事业效劳。”但他拒绝了大陆会议批准给他个人每月500美元的薪饷,他表示“对金钱的考虑是不能促使我牺牲家庭的舒适与幸福来接受这一艰巨的任务的”。5天后,他一接到大陆会议正式颁发的委任状就动身奔赴疆场了。他深知生命无常,甚至想到了战死沙场的可能,所以在出发之前他给亲人留下了遗嘱。

在6月18日写给夫人的告别信中,他无比真挚地说:“亲爱的帕齐,请你相信,这一职位并不是我自己去谋求的。我曾竭尽全力摆脱,不仅是由于我不愿离开你和我们全家,而且由于我也自知,就我的能力而言,的确难以胜任。我在家中同你在一起度过的一月,那种真正的幸福要远远胜过我在异地他乡若干年后始能盼到的遥远的希望。”在6月19日给朋友的信里,他再次谈到“自己既无能力又无经验,很难担当如此重大的职责”。他能够保证的只是三点:“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忠于职守;廉洁奉公。”透过这些私人信件,我们可以看出他的谦逊决不是虚伪造作。

华盛顿所统率的部队衣衫褴褛、装备简陋,大部分都是临时招募的,缺乏基本的军事训练,而他的对手却是号称“日不落帝国”的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

1776年圣诞夜的特伦堡一战,华盛顿出其不意,打了一个大胜仗,被誉为“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大陆会议做出一个重大决定:把军事指挥权全权授予华盛顿将军。面对这一巨大的荣誉和权力,他体会更多的是责任,在写给大陆会议的信中,他虔诚地说:“大陆会议把军事职责方面的最高的和几乎无限的权力授予我,我感到无上荣幸。但我决不认为,大陆会议如此信任我,我就可以不履行公民的义务。我时刻牢记一个道理:刀剑是维护我们自由的不得已的手段,一旦自由权利得以确立,就应把它们弃之一旁。”

大陆会议一度还曾授予他为期60天的非常权力,包括任命准将以下的军官,征用一切军需品,运走或埋藏可能落入敌手并对敌人有用的物资等。华盛顿从来没有被权力冲昏头脑,他始终坚信“刀剑是维护我们自由的不得已的手段”,显示了他人格中最纯洁无私的一面。

二

在胜利即将来临的时刻,华盛顿回首征程,双眼模糊,为了赢得这场战争,他在长达6年的漫长岁月里,从未回过自己的家,即使过家门也不入。为了赢得这场战争,他不仅早生了满头白发,眼睛也几乎看不见了。为了赢得这场战争,无数战友在他的身边倒下去了……

1781年,胜利已成定局,经过多年战争的洗礼,大陆军已成为新生的美国的中流砥柱,一支最有组织性和富有战斗力的力量,作为总司令的华盛顿战功赫赫,有着世界性的声望,更是美国众望所归的人物,在每一次军内外面临危机的关头,他都能发挥出巨大个人力量,顺利地化解危机。那是18世纪80年代初,震撼世界的法国大革命还没有发生,英国光荣革命之后长



华盛顿

期推行的君主立宪制度给古老的英国带来了繁荣、稳定和自由。美国新大陆上涌动着一股要求君主制的思潮,在失去了世袭制纽带、由移民组成的新大陆上,谁能成为新的君主?手握重兵、打赢了独立战争、拥有巨大威望的华盛顿自然是首选的人物,“打江山、坐江山”何其顺理成章!

率先提出这一建议的就是华盛顿的部将、曾任米夫林堡守备司令的刘易斯·尼古拉上校。1782年5月,他致信华盛顿,列举军队遭受的种种不公,并把这一切归咎于共和政体,他说:“那种把我们从难以想象的困难中引向胜利的才能,那些得到军队普遍尊重和崇敬的品格,定能引导和指导我们在和平的道路上前进。有的人把专制与君主政体混为一谈,觉得很难把它们分开。因此,我所建议的政体的首脑有一个显然较为温和的称号,但是一旦其他问题都得到解决,我认为很有理由采纳国王的称号。”

在当时的美国,这并不是刘易斯·尼古拉上校一个

人的看法,不少将士都有这样的思想。王袍加身呼之欲出,华盛顿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抉择。但他立即就作出了决定,写了一封措辞严厉、毫不含糊、不留任何余地的回信:

我非常意外和吃惊地阅读了你要我深思的意见,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战争中发生的任何变故都没有像你说的军队中存在的那种想法使我更痛苦。我不得不怀着憎恶的心情看待这种想法,并给予严厉的斥责。

我想不出我有哪些举动会鼓励你写这样一封信,我认为这封信包含着可能降到我国头上的更大的危害。如果我还有点自知之明的话,你不可能找到一个比我更讨厌你的计划的人了。……如果你还重视你的国家,关心你自己和子孙后代,或者尊重我的话,你应该从头脑里清除这些想法,并决不要让你或任何其他他人传播类似性质的想法。

在那个关键的历史时刻,华盛顿坚定拒绝对他的王袍加身。他的态度对美国消除君主制的威胁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既然美国最有威望和实力的人物公开反对君主制,严词拒绝国王的头衔,谁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接受加冕呢?正是他的这一选择为美国成为民主制国家开辟了道路。

三

1783年9月3日,英、美和约签订,英国正式承认美国独立,经过8年的浴血奋战之后,美国最终赢得了独立、自由和尊严。11月2日是星期天,在普林斯顿附近的洛基希尔,华盛顿向追随他征战多年的将士发表了饱含深情的告别演说:“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为长时期的分手向他们亲切告别。”他说:“你们在部队中曾是不屈不挠和百战百胜的战士;在社会上,也将不愧为道德高尚和有用的公民。”“平民生活的俭朴、谨慎和勤劳的个人美德与战场上更为壮丽的奋勇、不屈和进取精神同样可贵。”最后他公开表达了自己即将退役、过平民生活的热切愿望:“分离的帘幕不久就要拉下,他将永远退出历史舞台了。”

两天后,当华盛顿乘船离开纽约港时,岸边送别的人流如潮水一般,他眼含热泪,不停地挥动手中的帽子,与8年炮火硝烟中曾经生死与共的战友依依惜别。

12月23日,在安纳波利斯,华盛顿向大陆会议辞去一切公职,亲手交回了大陆军总司令的委任状,正式解甲归田。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匆匆起程,沿着熟悉的

波托马克河马不停蹄返回他日夜思念的故乡——弗农山庄。

“戏已经演完了。我不再肩负公职,有如释重负之感。我希望能在余生中为善良的人们做一点事情并专心修身养性。”对华盛顿来说,动荡的戎马生涯已经结束,新的生活开始了。已过知天命之年的他决心在乡村田园度过他的后半生,他给远在法国的战友拉法耶特写信,充满了对乡居生活的赞美与自足:

亲爱的侯爵,我终于成了波托马克河畔一个普通的百姓,在自己的葡萄架和无花果树下休闲纳凉,看不到军营的喧闹和公务的繁忙。我此时所享受的这种宁静幸福是那些贪婪地追逐功名的军人们,那些日夜图谋策划、不惜灭亡他国以谋私利的政客们,那些时时察言观色以博君王一笑的弄臣们所无法理解的。我企盼能独自漫步,心满意足地走完我的人生旅途,我将知足常乐。

从将军到公民,在他而言再平常不过了,就像当初应召为国服务,义不容辞,这是义务,是责任,也是他作为军人的荣誉感,是他做人的基本原则。一旦胜利降临,戏剧落幕,他就坦然地告别这个舞台,没有一丝的犹豫和留恋。在进和退之间,在显赫的权势和淳朴的平民生活之间,他从来都能找到自己最准确的位置。他是战士、是公民,为国服务是天职,是上帝的召唤,是他对这片大地与生俱来的情怀。对于大陆会议和美国人民给予他的崇高荣誉他始终深怀感激。

四

过平静的乡居生活,是华盛顿在独立战争期间梦寐以求的心愿,在严酷的战争中他无时不在渴望着早日赢得自由,解甲归田,回去经营自己的庄园。1784年4月4日,他在给拉法耶特夫人的回信中这样描述:

而今,我已听不到武器的撞击声,看不见营房的繁忙景象。无官一身轻。我现在过着安逸的家庭生活,在自家葡萄架下和无花果树下乘凉。我住在一幢小别墅中,四周放置着农具和羊皮。我只求从容地沿着生命之河顺流而下,直至被葬入我祖先的沉寂的宅第。

他向往田园生活的宁静,不愿炫耀自己的开国功勋,以免背上沽名钓誉的恶名,他甚至谢绝了终生挚友克雷克医生代表一位作者为他立传的请求。他一直认为赞美他个人而不写整个独立战争将使他陷入尴尬和不快。与不惜代价疯狂追逐世俗名利的人截然相反的

是,他追求另一种境界,他更喜欢精神上的淡泊,所以在自家葡萄架和无花果树下的那些日子成了他生命中最美好的记忆;此时,我希望能悄然无声地融入山川大地,了断与尘世的一切纠葛。”正是这样的境界使他断然拒绝了王袍加身的巨大诱惑,有史以来,他是第一个打赢了战争就回家的统帅。

华盛顿的私人秘书托拜厄斯·利尔说:“在弗农山庄居住的那段日子可能是华盛顿先生一生中最快乐幸福和无忧无虑的时光了。”这话也不完全正确,在那段日子里,他非常思念早已离开的少年朋友,并深深怀念已谢世的先人,他的父母、哥哥,心中涌动着难以言说的感情,他梦呓般地写下了:“我亲手栽下的树木迅速成长起来,似乎它们已知道我行将衰老,在我与世人告别之际,要用它们的浓荫为我遮阳蔽日。”

宾夕法尼亚州议会通过代表向大陆会议提出动议,要求对华盛顿的贡献和牺牲给予补偿。他明确表示,绝不接受任何补偿。他家乡所在的弗吉尼亚州议会也将波托马克河与詹姆斯河的股份各赠送他一百五十股,他知道此举显示了国家对他的高度评价、爱护与关怀,他如果拒而不受,可能被看作对国家美意的不敬、蔑视,甚至“被误解为蓄意炫耀自己的无私与美德”,经再三斟酌,他最后将全部赠与捐献给了慈善机构。

如果不是局势的变化,使他再度应召为国服务,这位曾拒绝王袍加身的伟人将在美丽的弗农山庄度过余年。1786年,也就是他回到家乡三年以后,新生的美国邦联面临着一场政治危机,8月1日,他在写给约翰·杰伊的信中表达了自己的忧虑:“短短数年,变化竟如此惊人。据闻,即使德高望重的人物也在无所顾忌地谈论君主政体。言论出自思想,再进一步即往往成为行动。这一步却是无法挽回和重大的一步!”我虽已退出这个世界,但我坦率承认,我不能将自己置于漠不关心的旁观者的地位。”

三年前,他拒绝了王袍加身,三年后,他虽身居乡间,却不容许他的祖国滑向君主制的泥潭,他不相信赢得了独立的美国人民不能自己管理自己,他不相信流血牺牲奋斗得来的建立于平等自由基础上的制度“不过是一种空想和无稽之谈”。作为美国的缔造者之一,他坚决不希望发生这些“深以为忧的结果”。为了他参与选择和创立的这个制度,他再三犹豫之后,还是再次告别了心爱的家园,1787年5月9日早晨,他动身前去费城,参加对美国乃至整个世界影响都极为深远的制宪会议,这一去又是8年。(责任编辑 吴 思)

纪念郑和： 我们应自豪还是自省

● 李一鑫

整整六百年前的 1405 年（明永乐三年），是郑和奉旨“七下西洋”的首航之年。其后，这支大明帝国的庞大舰队平均每四年远航一次，大体两年在海外巡航，两年在国内紧张休整，准备新的远航。这七次（一说八次）距离、规模、耗资三空前的远航，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航海史上一件大事。中国和世界都有理由纪念这个属于人类创纪录壮举之一的事件。

但是，在进入全球化时代的今天，在各国，特别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大国纷纷强调“海权”和“海洋战略”的今天，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和以什么心态纪念中国人做出的这一壮举？它仅仅是一件值得为我们华夏先人自豪的往事吗？

是“创举”，还是“绝唱”

“海洋权利”、“海洋战略”，即英文 sea power 这一概念的提出，大约仅有百年，首先出现于 1902 年曾任美国历史协会主席的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海上力量对历史的影响》一书中。我国早先把这一概念译为“海洋权利”，但 power 的确切意思应是“力量”、“权力”或“实力”。这一概念所涉及的内涵，早已在资本主义国家争夺海洋权力时就成为尖锐的客观事实了，所谓“海洋文明”或“蓝色文明”就是由此所推及的概念之一，而近些年这些概念更加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有论点认为，中国压根儿属于“黄土文明”国家，从来就缺乏“海洋文明”传统，并把这归为中国积弱的原因。这个看法值得商榷之点在于：中国虽然文明中心在中原，总体上是农业国家；但看看清中叶以前多数朝代的历史版图，中国海岸线之长，海域之广，完全可与被称“欧洲文明摇篮”的地中海面积和海岸线总长相伯仲。而且即使在古代，中国沿海人口数量也不少于地

中海沿岸人口，中国先民航海的历史和成就比之希腊、罗马绝不逊色。早在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华民族的祖先已能“剡木为舟，剡木为楫”，揭开了航海的序幕。到秦汉时代，海船大型化特别是用帆御风的技术，使徐福东渡日本和西汉远航印度洋得以成功。由汉代开始，中国曾经有延续了一千五百年的举国开放时期。通过丝绸之路，与中西亚和南亚有了商业、文化往来。隋朝时就能造名曰“五牙”的大船，“上起楼五层，高百余尺……容战士八百人”（《隋书》）。唐代陆上丝绸之路达到极盛已众所周知，而海上丝绸之路也于这时兴盛起来。到宋、元海上贸易已大大超过陆路贸易，泉州、广州、明州（宁波）、合浦等城市已是著名的贸易港。唐、宋开始在广州、泉州等地建立了市舶司，是为世界最早的海关。由于航海的需要，北宋时已懂得利用星图和指南针航海。元末中国已与亚非 120 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海上贸易关系。那时刺桐港（今泉州）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港口”，这个评价恰恰出自两位来自地中海的西方人的著作，一是《马可波罗游记》，一是 1347 年来华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拔图塔的《游记》。

郑和远洋船队规模之大、船舶之巨、航程之远、航技之高，成为当时世界之最。明朝的《自宝船厂开驶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蕃图》记载：郑和所率 200 余艘船只，最大的舰船（称“宝船”）“长度为四十四丈四尺，宽十八丈，张十二帆，可容千人”。而哥伦布船队最大的船，按当时中西度量衡之比，只有郑和宝船 1/8 那么大，整个船队也仅三只船而已。航海技术是足能说明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具有代表性的标志之一。因此，郑和携两万多水兵的七次远航，是 15 世纪初旷世未有的中国综合国力大演示，说明着中国几千年积累的航海知识和科技能量。

这里有必要推荐最近才在中国翻译出版，并已引起广泛关注的美国安格斯·麦迪森的《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系荷兰格罗宁根大学教授、剑桥大学赛尔温学院荣誉院士）。这部书说中西开展海洋贸易之初，“东方的经济规模和利润比欧洲要大得多”。“欧洲人……及其商船仅为中国人及其船只的1/10；而且欧洲人的货物主要不是欧洲产品，而是中国的瓷器和丝绸。”从公元500年到1500年，“在技术方面，西方几乎没有传给东方任何东西，技术的流向是相反的。”而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梦奎就麦迪森这本书所作的引申补充之文《中国经济千年史》所说，中国在公元1000年（宋真宗咸平三年）至1820年（清嘉庆二十五年）的八百多年中，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大体上不断增加，最高时占世界经济总量的32.9%，即世界总和的1/3！其后才逐渐下降，到1950年仅为4.5%，达到最低。

这就可看出，郑和出海时，中国正处在经济上升时期。郑和之旅既然是建筑在中国的总体国力包括传统航海能力领先于世界的基础之上，自然能做到规模空前，很难说是郑和，更难说是厉行禁海政策（即使在郑和出海同时也严禁其他出海活动）的明朝廷骤然横空出世的“创举”，倒应说是历代中国人积累下来水到渠成的勋功伟业。而令人不胜扼腕惋惜的是，中国恰在此时禁海，官方航海活动也以郑和第七次出海后戛然而止，直到清朝后期才在外患逼迫下新建海军。郑和的事业成了一曲五百余年无后续演出的“绝唱”！

而中西航海事业差距以及所有方面差距的拉开，只是从此时埋下伏笔。在郑和下西洋之后87年、92年、114年，欧洲人才有几次堪与郑和比肩的航行，分别是1492年意大利人哥伦布横渡大西洋到达美洲，1497年葡萄牙人达·伽马绕过好望角远航印度，1519年葡萄牙人麦哲伦的环球一周航行，此后西方航海事业一发而不可收，进入了所谓“蓝色文明”。而中国则拱手让出海上领先地位，正式退守“黄色文明”。

是“国事交往”，还是“帝王家事”

郑和的时代恰恰是个有代表性的时代，即中国由汉唐宋元时的较开放社会，断然决然地向古老的封闭社会回归。

明太祖朱元璋即位后，由于他自身和元末造反的各家头领大都是流民出身，所以他深知流民是最不稳定最易拉竿子造反的阶层。而江湖商贩和商人雇用的

农村外流人员，正是流民之渊薮。控制流民的最好方法是将农民束缚在小块土地上，所以朱元璋以农本商末为治国要策，大力抑商，特别是厉行禁海，宣布“片板不准出海”。而正是在“罢市舶严海禁”，正式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三十一年后，郑和却奉旨远赴南海西洋。

那么郑和出海究竟是为了什么？

现在，为纪念郑和首航六百年，举出了若干理由，实际上是猜测：有人说是为了宣扬新朝国威，有人说是为了缔造和平环境，建立邦交。但既然明朝把保守主义国策都镌刻在铁板上挂在皇宫正门内了，那么这些推测好像都站不住。

这就有必要提及明初皇家一段家事。

郑和首次远航的1405年，是明朝第三代皇帝朱棣继承大统的第三年。众所周知：朱元璋登上帝位后，为集权于一身，四次罢相，后来干脆废除古来的宰相制，撤销中书省，并先后把开国将领诛杀殆尽。同时却裂土封藩，把自己的26个儿子封为大小藩王，镇守各地。朱棣是朱元璋第四子，封燕王，驻北平（今北京）。1399年朱元璋病危时，因皇太子朱标已死，下诏传位给皇太孙朱允炆，是为建文帝。朱允炆在位三年多时间中，考虑到朱元璋所封的各地藩王都是自己叔辈，有不少人积有战功，恐日后“尾大不掉”，同时也为了改变祖父朱元璋重武轻文的做法，于是按大臣齐泰、黄子澄的建言，开始改制，实行“新政”。由于涉及削夺藩王权力，这就引起了皇族内部一场血腥斗争。

朱棣在诸藩中最强，战功最著，心计又最多，他先是装疯，“佯狂走呼市中，语多妄乱”，给人以假象，暗地里却充实兵力。1399年7月，以朱允炆“居丧无状，淫纵过于桀纣”为罪状，发起“奉天靖难”之役。经过两年零九个月血流漂杵的内战，在1402年6月攻陷南京。但宫中突然烧起大火，朱允炆却不知所终。整个故事的“扣子”正在这里。《明史》说朱棣“遣中使出帝后尸于火中”，但据中华书局出版的《明史考证》（作者黄云眉），《明史》的纂修者们在朱允炆是否死难的问题上是有争论的，于是在《明史》补本中这一句又改为“遣中使出后尸于火中”，“帝”字不见了。而野史有的记载是“程济奉上（指朱允炆）易僧服去”（《明书·建文皇帝本纪》）；有的说“帝由地道出亡”（《震泽纪闻》），甚至传说有人在云南见过“着僧服”的朱允炆……这段公案一直争论到民国初年。当时的北大教授、史学家孟森则坚持认为朱允炆未被烧死，并举四大理由，其中重要的两条是：朱棣长期羁押审讯一个叫溥洽

的和尚，只因这个和尚涉嫌为据说已出走的朱允炆剃度；另一条是，《明史》胡濙、郑和传中记有朱棣密令胡濙“遍行天下郡县”，寻访朱允炆下落，和“遣郑和浮海下西洋以寻其迹”。孟森问道：“果成祖已确认火中有帝尸，何必海内外分途遍访，历二十余年？”

现在很多史家在谈论郑和七下西洋时，往往津津乐道其壮举的一面，这一段皇族内部的斗争多不涉及，但在追寻郑和出洋动机时，这些帝王家内之事或许是很有讨论价值的。

不过，郑和完成的多次壮举，不是商业行为，也未促进国际贸易。他带出去的大量人员乃是军队，大量物资乃是“赐物”，带回来的除航海日志式的东西（今存几本小册子）外，则是以奇珍异宝为主的“贡物”，那些东西没有进入国内市场，更没有公之天下与民共享，而更多是在皇帝赏玩之余还分给了少数皇族和官僚；其次，明朝并未在郑和出海的同时废除海禁政策，普通商民仍不准出海贸易，违禁的处罚仍十分严厉。

事实很清楚，郑和的远航即使不是纯为帝王家事，也与国家贸易无关。

值得国人“自豪”，还是更值得自省

明朝 1405-1433 年这一过度铺张浪费的大规模连番远航，如果说值得我们纪念，那么我们是该为六百年前这一“绝唱”“自豪”呢？还是应该自省？

从后来发生的历史及其教训看，似乎不那么值得华夏人“自豪”，却大大值得我们自省。

郑和连续多年的远航，扩大了他的眼界胸襟，总结见闻认识，他曾说出一句即使放在今天也是极富远见卓识的话：“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海，危险亦来自海上。”他的这句话应与二千五百年前古希腊学者狄米斯托克利的预言有渊源关系：“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一切。”

他毕竟见识了近半个地球的广大和富饶，甚至耳闻了红海西边正在躁动变化中的欧洲的情况，才知即使以中国之大，如果只是关起门来自唱自乐也仍是一种夜郎意识，甚至是一种隐隐的危机；但他毕竟只是个太监——帝王奴仆，他的认识却改变不了帝王的无知，改变不了整个封建王朝的国策，改变不了以后的明清两朝以海禁和抑商政策对中国发展势头的严重阻滞，改变不了这个曾令人倾慕的“天朝大国”自我斩断发展生机，由盛转衰的历史。

无论是朱元璋的禁海或朱棣时的“七下西洋”，都

不是忽发奇想，而是为了维护已处于中国封建末期的皇权，是为了一家乃至一人之私权私利。六百多年前的抑商禁海，正说明皇家对当时中国渐渐壮大的商人阶层的恐惧。而“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生产的历史前提。”（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 167 页）商业被抑制，商人被盘剥或被收买（像晋商徽商大户那样成为官商、“红顶商人”），新阶级无从产生和壮大。而没有新生产关系新阶级的历史要求，中国那些巨大“夜郎之国”的帝王，除了更加精研专制之术外，是永远不可能产生海洋意识、海洋战略的。归根到底，不是我们这民族偏爱“黄土文明”，而是中国的专制统治阶级特别钟爱“黄土文明”，因为天然的“皇权主义者”、好像“一麻袋马铃薯”（皆马克思语）那样的农民是最容易统治的。

郑和七次浩浩荡荡的航行终成绝响，而在他之后 87 年，哥伦布才率 90 名水手驾三只小得多的帆船完成“发现美洲”之旅；在郑和之后 114 年，麦哲伦才率 265 人驾五只小得多的帆船去执行绕地球一周的航行。然而历史价值的大小不是凭船队规模的大小决定的。马克思恩格斯是怎样评价哥、麦二氏的航行所造成的影响的呢：“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地、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的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共产党宣言》）

中国由一个原本可成为海洋大国的国家，一个原本可为世界历史的发展更早做出伟大贡献的国家，出于今日思来显得异常渺小却又实质上异常深刻的原因，自甘自愿退出 15 世纪开始的人类史上创造全球功业的竞争，郑和的短暂风光迅即黯淡，终于使中国在沉寂四个世纪后的鸦片之役开始，吃尽丧权辱国的苦头，以曾为举世公认的富裕之邦，变成因落后而贫弱不堪的半殖民地！时机既去，噬脐何及！六百年所经所历，不能不成为中国人难以忘怀之痛，足够深深地反思寻味。

如果说有些值得讨论、记取的东西，那么至少可提出三点：

一是守成意识。朱元璋是历史上少有的以农村流民出身参加起义当上皇帝的。农民意识之一就是守成，小富之后必守成，暴得天下更要守成，办法就是以农立

国。他严海禁、撤市舶，建九边、修长城、抑商兴农、以保甲连坐的酷法把农民固定在小块土地上，以及诛杀旧日同胞，大兴文字狱，搞特务统治……无不出于“为子孙谋”的意识。而一个农户守成无非是守住田产，自给自足过日子；国主守成则体现为“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月》），就是无限高度集权，照《皇明祖训》老章程原教旨办事，奉之唯谨，不敢错一步，而不求发展创新。怎奈时代不同了，当时西方已开始迈入生机勃勃的资本主义初期，在竞争的大环境中，不进则退的道理尤其成为绝对法则。无怪乎台湾柏杨先生在《中国人史纲》中把明季说成“绝对专制的大黑暗时代”，“官僚文化的大酱缸”。

二是上层建筑如何适应历史的要求。今天看来，明清两代前期迷于并擅于集权的君王，虽然各有其文治武功，史家甚至多有颂之为“盛世”者。但从本质上说，那样的上层建筑是严重背离经济基础的要求的。中国积数千年的民族智慧和自然经济下发展起来的生产力，使中国一直到清嘉庆时国家财力仍占世界总财力的1/3。马克思说“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生产的历史前提。”（《资本论》第三卷167页）从唐、宋起，中国已出现了相当规模的商业，这才是综合国力较高的原因，仅靠小农经济是不可能出现这样高积累的。如果上层建筑不成为发展障碍，说中国向商品经济社会转变根本没有可能的观点恐怕是武断的。而不断地推进上层建筑的改革，使之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对任何国家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带规律性的课题。封建王朝出于统治者的私利，一般不可能自愿做到这一点。

三是海洋战略眼光。尽管西方在面向海洋走出去的时间比中国要晚，但重要的却是，两者的历史效应迥不相同。历史与阶级的局限性，使农民起义领袖之一的朱元璋不可能有通过商业进而通过商品经济振兴国家的眼光和韬略，而西方却恰恰以商人即早期资产阶级的兴起而得以引领世界风骚。他长于内斗——镇压国内的异己力量，把一同起义的各路农民领袖（包

括其宗教性的领袖偶像小明王）一一除掉；他仇视并惧怕商人，以抗倭为名严禁海商出海，而当时出海经商的海商集团已形成规模，于是明朝与被迫违禁出海贸易的海商形成很长期的斗争，既损伤了海商的发展从而自我斫伤了传统的海上实力，也削弱了明朝自身。他的儿子朱棣也以内斗见长，通过内斗取得了皇位后仍大开杀戒，翦除忠于他亲侄子的大量南京朝廷官吏。他派郑和出海如果确是为追寻朱允炆，那就把内斗延长到了海外。韩非子说，使国民“勇于公战而怯于私斗”是国家强盛的征象之一，而勇于私斗（俗称“窝里斗”），加强对内镇压，在明清两朝则较之以前的封建王朝更加青出于蓝！

这样，中西方之间就首先在治国理念和方略上出现了一个分水岭，中国在13、14世纪即朱明王朝以后，就决定了走下坡路的前景，其后所出现的任何“盛世”景象，放在世界历史坐标上看，都不免有虚幻的、孤芳自赏的一面。而由于先进却终于落后，由于灿烂却终于黯淡，世界的几大文明古国大体都曾进入这样一个历史怪圈。这很值得深思。

不过，平心而论，却不应因此而大大贬损郑和的事迹。郑和34岁（一说30岁）接受率舰队出海任务，历二十八年艰辛，在许多方面创造了此前未有的世界纪



录,最后死在第七次出海的归程上(一说死于镇守南京任上)。无论如何,从人类发展史角度看,以大规模远航征服大洋,使隔绝的东西方有了首次大规模接触,以及它在航海经验和技術上的空前贡献,那次壮举的意义无疑应该在史书中落一重笔。虽然出海动机成为千古之谜,成为有过程而无绩效的一件尽显风流和锋

头之事,但其过不在郑和。他的名字仍会留于史册,他完全有资格成为世界历史名人。

(责任编辑 致 中)

代购代邮

历史是一面镜子。读史可解惑,可益智。本社对读者函询较多的有关图书,开展代购、代邮服务。

《陈独秀风雨人生》 花流水流,陈独秀离开人世已经60多年了。每到春天紫色的蚕豆花开放之际,人们自然会想起因误食此花而病发的陈独秀,想到了当年不能左右自己命运的“老头子”的风雨人生。本书以30万字的篇幅,描述了这位中共领袖的曲折人生道路,并追述恢复其历史本来面目的历史大背景。

《改变那个世纪的人和事》是一套视角独特的丛书。在刚过去的20世纪,那些让人记忆的历史太多太多,但本丛书让亲历者来讲述,就多了一份真实和一份况味。在这里你可以与徐铸成、于光远、蔡元培、陈独秀、朱德、杨振宁、林语堂、蒋梦麟等名家相遇,体味历史,重温记忆。

《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 1944年~1946年间,国共两党关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的争论,是两种对立的国家政体的争论,是争取一个怎么样的抗战结果的争论,因而也是国共两党政治对立全部历史关系的最高表现形态。本书对这一长达两年的政争的发生、发展和终结,进行了全程的跟踪考察,集中论述了国共两党是如何由政争走向战争的。

《食无禁忌》 本书的英文原名是《健康区》,讲的是如何搭配不同食物的比例,以达到激素平衡,从而进入“健康区”。美国斯坦福大学游泳队请本书作者制订菜谱,结果,1992年一举夺得八枚奥运金牌。据作者说,他推荐的食谱以1982年诺贝尔医学奖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对防治心脏病和癌症大有益处。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 编:100045

收款人:炎黄春秋杂志社

(注:代购三本书以上,可按总书价的10%付邮费)

书 名	作者或主编	定 价	邮 费
改变那个世纪的人和事 全套四册		67.20	8.00
之一 我的回忆	孙中山		
之二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蔡元培		
之三 梁漱溟与毛泽东	汪东林		
之四 亲历一九五七	徐铸成		
庐山会议实录	李 锐	18.00	5.00
邓小平年谱	中央文献研究室	76.00	8.00
陈独秀风雨人生	朱 洪	28.00	5.00
扛起地狱的闸门	丁 群	21.00	5.00
问题与主义	秦 晖	25.00	5.00
自由的言说	徐友渔	20.00	5.00
书斋里的革命	朱学勤	25.00	5.00
夹边沟记事	杨显惠	19.80	5.00
皇帝与流氓	刘鹤守	23.80	5.00
审视中学语文教育——世纪末的尴尬	孔庆东	22.80	5.00
梁漱溟问答录	汪东林	25.00	5.00
走出个人崇拜——一个年代的反思	冯建辉	16.50	5.00
苏共亡党十年祭	黄苇町	22.00	5.00
刘少奇蒙难始末	图 们 祝东力	17.00	5.00
人民公社兴亡录	宋海庆	36.00	6.00
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	邓 野	29.80	5.00
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	吴 思	23.80	5.00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戴 煌	28.80	5.00
第二次宣言	王小平	28.00	5.00
知情者眼中的周扬	徐庆全	24.00	5.00
红色第一家族	马社香	30.00	5.00
再生中国——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前前后后	李 艳 熊志勇	44.80	7.00
叶剑英在非常时期	范 硕	36.00	6.00
断桅扬帆——蒙冤25年的公安局长	丁兆甲	26.00	5.00
特别审判——林彪、江青			
反革命集团受审实录	图 们 肖思科	28.00	5.00
25年——1978—2002中国大陆			
四分之一世纪巨变的民间观察	王 安	26.80	5.00
蒋介石评说古今人物	戎向东	29.80	5.00
陋室漫笔——不该忘记的人和事	靳树鹏	21.80	5.00
食无禁忌	(美)巴里·西尔斯 比尔·劳伦	19.00	5.00

本期: 终审 徐 孔

执行主编 吴 思

审校 赵友慈

二十一世纪中华文化世界论坛

第三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澳门举行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澳门大学、澳门基金会、澳门文化局主办、以“中西会通与文化创新”为主题的“21世纪中华文化世界论坛”第三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4年11月25日至27日在澳门举行。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何厚铨、中央人民政府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主任白志健、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第一副会长张文彬、常务顾问李宝光、澳门大学校董会主席谢志伟、校长姚伟彬、澳门基金会主席吴荣恪、澳门特别行政区文化局局长何丽钻等出席了开幕式。何厚铨、姚伟彬和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费孝通(由曲润海常务副会长代读)在开幕式上致词。

来自中国内地、澳门、香港、台湾和美国、英国、澳大利亚、菲律宾、新加坡的

100余位学者出席研讨会，提交论文约百篇。许嘉璐、清华大学教授张岂之、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金冲及、美国纽约大学教授熊玠、北京大学教授汤一介、菲律宾航空公司董事长陈永裁、澳门中华拉丁基金会魏美昌等先后在大会上发言。分组会围绕中西会通与综合创新、中西会通与民族振兴、民族复兴与文化责任、经济全球化时代中西文化交流的新特点与新趋势、澳门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与作用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热烈的讨论与切磋。



开幕式(右起: 李宝光、姚伟彬、张文彬、白志健、何厚铨、许嘉璐、何丽钻、谢志伟、吴荣恪)



部分代表休息时交谈(右起: 熊玠、金冲及、张岂之、许嘉璐、刘伯龙、瞿林东)



闭幕式结束后，部分代表合影(右起: 澳门基金会副主席吴志良、魏美昌、张文彬、冯征、陈永裁、汤一介、李宝光、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前总干事卢恩成、北京大学教授乐黛云、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鲁諝)



全体代表合影

炎黄春秋

2005/1(总第 154 期)

社长(法人代表):杜导正

执行主编:李晨 徐庆全

社长助理兼编辑室主任:赵友慈

社长助理兼办公室主任:胡竞成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管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ISSN1003-1170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 69 号

邮编:100045

电话:(010)68522852(办公室)

(010)68534879(编辑室)

(010)68523512(编辑室)

(010)68532048(发行部)

传真:68532569

印刷: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

国内总发行: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订购处: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 399 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1274M

网络电子版全球总代理:龙源期刊网

网址:www.dragonsource.com

www.qikan.com

本刊电子信箱(E-mail)地址:

Yanhcq@sina.com

出版日期:每月 4 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 0079 号

定价:4.80 元